

获得权威

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
历史经验与启示

朱 华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导 论 / 1

- 一、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 1
- 二、本课题研究的框架与方法 / 2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群众工作 / 5

- 一、建党时期党对群众工作的认识 / 5
- 二、在工人中的早期工作 / 9
 - (一) 创办通俗刊物,向工人进行宣传 / 9
 - (二) 打破“工学界限”,接近工人群众 / 11
 - (三) 从文化教育入手,培养工人骨干 / 14
 - (四) 建立公开的工会组织 / 16
 - (五) 以维护工人切身利益为中心,开展经济斗争 / 18
 - (六)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 / 22
- 三、对公开斗争模式的分析 / 23

第二章 大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在工人中的群众工作 / 26

- 一、历史背景 / 26
 - (一) 上海城市和工人阶级的特点 / 26
 - (二) 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新战略 / 30
 - (三) 上海地下党基层组织的发展 / 32
- 二、群众工作模式的转变 / 39
 - (一) 五卅运动:公开斗争模式的成功与失败 / 39
 - (二) 探索秘密斗争模式 / 55
- 三、基本经验 / 75

第三章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 / 79

一、历史背景 / 79

(一) 工人阶级的基本状况 / 79

(二) 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方针与策略的演变 / 84

(三) 上海地下党的组织演变情况 / 90

二、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 / 93

(一) 赤色工会及其活动 / 93

(二) “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 107

(三) 对群众的宣传工作 / 110

三、基本经验与教训 / 119

(一) 有益的经验 / 120

(二) 沉痛的教训 / 122

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 / 126

一、历史背景 / 126

(一)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抗战时期的政治环境 / 126

(二) 党的白区工作方针转变 / 128

(三) 上海党组织的重建与发展 / 132

二、抗战时期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 / 138

(一) 共产党员的“三化”、“三勤” / 139

(二) 采用各种形式组织群众 / 142

(三) 不拘一格的群众宣传工作 / 147

(四) 机动灵活的群众斗争策略 / 155

三、基本经验：秘密斗争模式 / 163

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 / 170

一、历史背景 / 170

目 录

- (一)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政治环境 / 170
 - (二) 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学生的思想情况 / 171
 - (三) 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 173
 - 二、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基本方针与策略 / 177
 - (一) 利用合法条件组织群众 / 178
 - (二) 合法而有节制的群众斗争 / 183
 - (三) 对群众的政治宣传 / 193
 - 三、基本经验 / 196
-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200
-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城市群众工作的意义 / 200
 - 二、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 / 202
 - (一) 党的纲领路线切实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 202
 - (二) 努力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 / 204
 - (三) 群众组织的有效利用 / 207
 - (四) 共产党员的人格力量 / 210
 - 三、有益的启示 / 213
 - (一) 基层党组织必须善于建立自己的权威 / 213
 - (二) 党员必须切实保持先进性 / 217
 - (三) 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基层党组织最核心的功能 / 219
 - (四) 基层党组织要善于利用民间组织凝聚群众 / 220
-
- ### 后 记 / 222

导 论

一、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基层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善于依靠坚强的基层组织来联系、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以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最有特色的优良传统之一。今天,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更是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性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转型,党的基层组织遇到了许多新情况。许多曾行之有效的工作原则、方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许多基层党组织“处于松松垮垮、软弱涣散、瘫痪半瘫痪状态,在群众中不起任何战斗堡垒作用,不起政治核心作用”。^①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就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完善和相应的社会转型,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环境、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行之有效的经营理念、方法、原则,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经营理念、方法,尚在探索之中。

刘少奇曾经指出:“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末,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②既然目前社会环境的这种变化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那么,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努力变革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思路与工作方法。对于执政党来说,能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04 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16—317 页。

否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因此，如何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争取群众对于党的政治支持，引导群众自觉追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应该是当前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最重要课题。

善于通过基层组织的工作来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以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最有特色的历史传统之一。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白区基层组织在不掌握任何行政权力，且无合法地位的条件下，却能通过有效的工作争取到大量群众，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政治基础。这一历史事实的本质，就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基本体现之一。

上海是党的白区工作的最重要阵地之一。上海地下党在漫长而艰苦的奋斗中，依靠基层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课题的目的，就是根据比较可靠的史料，对上海地下党在工人阶级中开展争取和组织群众的工作进行历史考察，以此为切入点，揭示并概括出地下党团结、争取群众的基本模式和主要经验，以为在当前新的形势和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工作提供新的视角和启迪，并为党史研究进一步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二、 本课题研究的框架与方法

地下党的工作大体分为情报、上层统战和基层群众工作三个部分。情报工作不属于本课题的研究范围；上层统战工作和文化战线的隐蔽斗争虽然也属广义的群众工作，但因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其工作方法与以下层人民为对象的一般基层组织的工作有较大的差别，应另立专题研究。本课题主要研究地下党在基层所开展群众工作，这也是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主体部分。由于近代上海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又历来强调组织和动员工人群众的重大意义，组织和争取工人阶级一直是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主要内容，直到抗战时期，群众工作的范围才有进一步的扩大。因此，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也以党在工人群众中的活动为主。

本课题主要采用史学研究通常的归纳方法，并使用一些政治学的

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大量的个案考察，概括出上海地下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险恶环境下开展以工人为主的基层群众工作、获得权威的基本方式和主要经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课题以历史事实为主要研究对象，但这并不是一项全面的历史过程研究，即不是完整的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史，研究中所涉及的历史内容，仅仅是整个群众工作史中能够说明研究主题的部分典型内容或个案。

由于学术界对民主革命时期上海的群众运动和中共的地下活动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因此，本课题尽可能地吸收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并按照学术规范，注明了引用的情况。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框架是：

第一，对近代上海的社会政治状况进行分析，勾勒出上海地下党活动的环境特点。总体来说，由于外国租界对城市行政权的分割及现代经济、文化事业的发达，上海的社会政治环境与其他城市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具体地指出各个时期的社会环境特点，包括各类群众的特点，有助于对地下党的群众工作方式做出更深入、准确的评析。

第二，揭示各个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定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任务。路线或工作的指导方针正确与否，关系到整个党的事业的成败。在白区工作的群众工作中，这突出地表现为是否能正确地处理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能否提出群众信服的斗争目标、口号和实行正确的策略。

第三，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上海地下党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的基本情况与特点。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状况，对于群众工作的成败得失及工作特点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四，对不同历史时期地下党联系、争取和组织群众的具体方法进行分门别类的归纳，对有关群众工作的策略、原则进行评析。

第五，对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基本模式和主要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抽象出之所以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及现实启示。这也是本课题的最后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较大规模的群众工作开始于国共合作时代。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规模很小，群众工作尚处在各

地分散探索的起步阶段；中共在上海的力量相当有限，群众工作还一度中断。但尽管如此，从整体来看，中共仍在这一时期积累了不少有益的基本经验，并形成了一支优秀的工人运动领导队伍。正是这些经验和干部，为日后上海大规模的群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鉴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对建党时期全党的城市群众工作进行一些集中的考察，以便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群众工作的基本理念、思路、方法的由来、发展和演变。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群众工作

一、建党时期党对群众工作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成立就确定自己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宗旨是“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实行社会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按照列宁的意见，领导群众是先锋队最基本的职责，即“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而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善于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然后通过本阶级而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列宁确信：“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①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担负起发动、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参加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始终同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把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作为自己最基本的工作任务之一。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3、295、78页。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一开始就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把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基本使命。

1920年夏，陈独秀等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共产党人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重要意义。如：“无产阶级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最有力量的分子，没有他们，社会主义就不能实行的”；“无产阶级分子当中，最有力量做社会革命的，就是工场劳动者，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占最重要的位置”。^①“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罗斯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②显然，当时的共产党人确信，工人阶级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中国的无产阶级还不成熟，“大半都是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的人”。由于共产党“是有阶级觉悟的劳工们中间的急进分子组织的”^③，共产党人必须担负起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历史责任，即“要想使他们有自觉、有训练、有组织，就非我们投身工场，与他们亲近不可。我们站在圈子外面来讲劳动运动，是不成功的。我们要干劳动运动，必须我们自己亲身跑到劳动者群里去。”^④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一开始就非常自觉地开展旨在教育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的工人运动。如张国焘所指出的那样：“1920年，各地中共小组成立后，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活动。”^⑤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一大提出和确定了把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方针，部署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中共一大在讨论党的工作时，“决定集中我们的精力组织工厂工人……鉴于我们的党到现在为止几乎完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所以

① 《共产党》月刊第5号，第21、27页。

② 《共产党》月刊第1号，第1页。

③ 《共产党》月刊第2号，第11页。

④ 《共产党》月刊第5号，第27、25页。

⑤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

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他们。”^①大会的第一个决议案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开展工人运动。而决议的大部分内容也正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方法与策略。它具体规定:每个地方,“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②为了和由资产阶级及各种政客把持的“招牌工会”划清界限,决议特别强调“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提醒全党注意,“勿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玩物”,“勿使工会中执行其他政治路线”,以保证工会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向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有力工具。决议还强调对工人进行教育,要求出版面向工人的书籍、报刊,并组织工人学校以“提高工人觉悟,使他们觉得有成立工会的必要”。^③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人运动,决议还决定借鉴国外的经验,设立专门机构研究工人运动史,并强调“必须特别注意中国工人运动问题”的研究。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大会在讨论“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时,对“工人运动的问题讨论得比较详尽,主要的两项是如何组织工会和如何在工人中吸收党员”,决定“各地同志都应到工厂中去从事下层活动,将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俱乐部或其本厂的工会等组织之内”,“工人的入党条件应从宽规定,一个工人只要能热心工会活动,为工人利益斗争,并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可以准其参加进来,不必问他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至于如何使这些工人党员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大会认为那是地方党部的责任,地方党部应特别注意工人党员的教育工作。”^④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次大会专门做出了《关于“工会运动和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45页。

共产党”的议决案》，进一步规定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具体方针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党对群众工作的认识。

《决议案》认为，“中国的劳动运动，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还脱不了旧行会和手艺结合的束缚。同时劳动阶级的奋斗还不过是为某种手艺或某个工厂的特别状况的单独运动，并没有普遍性质的运动。工人的组织也不坚固，组合的人数也不多”。因此，《决议案》规定党必须大力发展工会。因为，工会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其任务就是：“努力做改良工人状况的运动，凡在资本主义之下能够改良的，都要努力去做。同时须使工会很快的向着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就是完全打倒工银奴隶制的资本制度，并照共产主义原则改造社会”；“工会最主要的活动是与资本家和政府奋斗”；“工会不但不要去调和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还要使这种争斗更加紧张，一个争斗接着一个争斗，在两个争斗之间工会的组织愈增强固，预备第二次争斗”。《决议案》并对工会和共产党的关系做出明确的规定，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一定的党纲，是一个以打倒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会是所有工人的组合（不管政治见解怎样），工人们在工会里，去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与共产党向同一目的进行……共产党也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所以共产党无论在何种劳动运动中，他都要是‘先锋’和‘头脑’，决不可不注意任何工会活动，并要能适当的诚实的和勇敢的率领工会运动。”“共产党为实际率领工会和实际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必须在工会中和各个工厂委员会以及一切的劳动团体中组织强有力的团体……”^①

不久，中共重要工运领导人邓中夏又进一步指出，“工人的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主力的地位……中国工人的群众有革命的趋向与可能，而且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有香港海员和京汉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6—82页。

路工人两大罢工可以证明,我们亦应毫无疑问了。所以我们不领导革命则已,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因为工人实际生活之压迫,比任何阶级所受的要惨酷,要深刻;故工人决战的毫不逡巡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些。”^①

由此可见,在党的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工人群众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依靠力量,把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党开始了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组织和动员的实践。

二、在工人中的早期工作

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确立了坚定的信念:“共产党不独是言论家,并且是实行家”,须“言论和实行并行”。^②他们对工人运动、群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来就不曾停留在纸面,而是很快就付诸实践。中共最初的群众工作,主要就是开展工人运动。

早期的共产党人,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对于工人群众的实际情况,了解非常有限;对于如何团结和组织工人,也没有任何的现成经验和途径,但他们依靠自己的献身精神,初步摸索出了一套走向工人群众、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办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一) 创办通俗刊物,向工人进行宣传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就相当重视宣传工作,曾用很大的力气创办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试图直接向工人阶级进行政治宣传,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共产党组织建立前,李大钊等知识分子就已有向工人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的意识与活动。北大学生邓中夏等曾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

^①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

^② 《共产党》月刊第2号,第47页。

利用庙会等场合，向群众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封建文化，进而，“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①各地共产党组织陆续成立后，即开始出版工人小报，向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

上海的早期共产党组织在1920年8月15日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周刊不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斗争实际，深入浅出地对工人群众进行启蒙教育，还试图通过与读者的互动交流，以引起工人群众的兴趣，并建立与群众的直接联系。《劳动界》从第三册起开辟了“读书投稿”专栏，党员李中曾以江南制造局工人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号召工人一面做工，一面联络，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上海电灯厂工人陈文焕写信给陈独秀，说他买了几份《劳动界》，“送给我们同伴的工人，我们的同伴工人多喜欢你们所办的《劳动界》”。湖南的工人量澄读了《劳动界》后受到启迪，来稿提出工人应有“人格底觉悟，待遇上底觉悟，团体上底觉悟”^②。另外，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还帮助工商联谊会创办了面向店员的通俗刊物《上海伙友》。

北京的共产主义者于1920年11月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周刊明确提出：“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是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还只是空谈”，“若空谈只是偷懒，只是自杀。”^③《劳动音》常常用具体事实和典型事件来反映工人的悲惨生活，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其第一期即用很大的篇幅报道了“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以“几分钟内死工人五六百”，“矿局年利八倍于资本，然而工人一命只值60元”为标题，揭露资方对工人压榨、视工人生命为草芥的事实。《劳动音》大力宣扬“劳工神圣”、“工人是未来社会的主人”等观念，强调工人要求解放，必须“组织工会”，以便推翻现存政府，实现社会主义。《劳动音》出版以后，很快就长辛店等处工人中流传开来，到了1920年12月，每期能销售2000份。^④

① 《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15页。

② 《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8页。

③ 《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劳动音》第1期。

④ 《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接着,北京的共产党组织又创办了《工人周刊》,这个刊物除介绍国内外劳动界消息,报导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启发工人的觉悟外,同样大力提倡组织工会,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创刊不久,就成了北方很受欢迎的刊物,“销数骤增”^①,每期销售量在几千份,最多达两万份,工人们争相传阅。《共产党》月刊称赞它“办得很有精神”。^②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周刊》经常配合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反映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压迫下所过的痛苦生活的文章,以触目惊心的事实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控诉,启发工人阶级要结成团体来保护自己。《周刊》在工人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普通工人项德隆(即项英)就是受到该刊的启发,开始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也有工人自己的团体,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③

但是,当时的工人一般文化程度很低,大部分是文盲,刊物所能起到的宣传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中国共产党的经费也很难支持这些刊物长久维持下去。按照邓中夏的说法,这些刊物大都只出了几个月便停版了。^④从这一事实来看,创办面向工人群众的读物,很难起到广泛并且有力的鼓动作用。

(二) 打破“工学界限”,接近工人群众

共产党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工作,是从党员走向底层社会、与工人群众直接交往开始的。

在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对于是否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认识并不统一。北京的共产党人在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求从事工人运动的志愿工作人员时,最初就应者寥寥。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学生去做工人运动既无“出息”,又无“前途”,与己有损,于

① 《工人周刊》第28—30期广告。

② 转引自李新等:《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③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④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事无益。^①实质上是对从事实际的政治斗争缺乏信心。经过反复的辩论，坚信工人将是革命主力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工人群众。

但是，最初工人也不相信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因为在工人的心目中，大学生是金枝玉叶，将来要做官为宦，是统治阶级的候补者，不可能真正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尤其怀疑学生前来活动的动机，也不相信学生所鼓吹的革命有成功的把握。青年团员贺其颖向工人孙云鹏作社会主义革命的宣传时，孙即冷语相加：“小伙子，你们卖的是哪一号膏药？”^②张国焘和罗章龙曾主动前往一发生自发罢工的地方，想给工人以指导，但工人却不相信有人会帮助他们，反而怀疑两人是资方的奸细。同时，工人和学生之间籍贯、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别，也成为沟通两者关系的巨大障碍。

为了打破这根深蒂固的“工学界限”，年轻的共产党人首先对自己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行为道德准则。北方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曾要求自己的工作人遵守这样的公约：“（一）献身革命工人运动，百折不回，誓为实现真诚无欺的民主自由而奋斗。（二）不争夺地位荣誉，万众一心为革命，时时站在最前线。（三）胜则相让，败则相救，牺牲个人利益。（四）廉洁奉公，生活朴素，重视劳动，尊重妇女，不嫖不赌，不捧角，限制谈恋爱，禁绝一切败坏道德的行为。”^③这种类似“清教徒”、“政治童贞”的行为要求，无疑能使任何人肃然起敬。

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尝试利用传统的社会联系纽带来接近群众。

20世纪20年代工人群众的内部维系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各种传统社会的纽带，如基于地域的同乡关系，基于义气的结拜关系，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帮派关系等。如在上海，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来自各地的移民，乡谊很自然地成为他们之间最初的联系纽带。而上海企业普遍实行的包工头制度，即由包工头自行招募工人，又使这种同乡的纽带成为

①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2页。

②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7页。

③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8页。

工人就业的主要依靠,具有实际的经济意义。即“同乡社区不仅是找工作、求保障的依赖,也是新来乍到者在一个陌生环境中得到认同的途径。”^①因此,基于地缘关系的帮口,成为工人最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如包惠僧所说:上海的“各工厂工场中,都有地方性帮口,如广东帮、山东帮、江南帮、湖北帮之类。工人大多在帮。……各工厂、工场、码头、公共场所以及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有青帮、洪帮的组织活动,尤其是青帮,是上海的地头蛇,大而言之如公司企业工厂工场,小而言之如里弄摊贩,如果没有青帮的关系,必然是动辄得咎,一事无成”。^②在北方,也有类似情况。如开封、徐州的铁路工人,大都有老君会的组织。而开封的铁路工人,多为湖北人,当地老君会的会长就是湖北人魏荣珊。^③

这种帮会或帮口都标榜内部成员利益均沾和有敌同仇的原则,似乎可以为成员提供一定的利益保障,但实际上,其最大特点,却是成员对于首领明确的人身依附关系,即成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效忠、服从首领,而没有任何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民主色彩。而这些首领,往往就是一些封建恶霸或包工头,他们实际上处在压迫、剥削其内部成员的地位上,许多人与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还会演变成某种犯罪组织,或成为统治阶级、资方的打手与工具。同时,基于地缘或义气的联系,也严重地妨碍着工人阶级整体的内部团结。无疑,帮会或帮口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工人组织形式。但在当时工人的心目中,却是维护自己利益的可靠方式。

为了打开工人运动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普遍采取了利用帮会关系的策略,以取得广泛联系工人群众的条件和机会。劳动组合书记部认为,对于这种封建社会形成的恶劣势力,只有钻进去,先接近它、利用它,然后再争取它。具体的办法是:对各帮派的领袖进行朴素的阶级教育,用“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道理来说服他们。同时,派人参加青帮或洪帮,即“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洪帮里做小兄弟”。

①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②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③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59页。

上海的李启汉在沪西工人区活动时，就通过认识的一个纺织女工的引荐，拜其师父为老头子，加入了青帮。也正是通过这层关系，李启汉获得了一批工人的认可，同沪西的纱厂乃至浦东的烟草工厂，都发生了联系，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①李启汉、杨殷等还采用过拜把子、结兄弟的方法来与工人建立友谊，如在神像前歃血为盟，发誓：“一人有事，众人帮忙，一人丧命，大家报仇”。^②李立三在湖南的安源煤矿开展工人运动，也非常注意利用帮会关系。1922年秋，罢工即将开始时，为了防止当地洪帮的破坏，李即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主动上门拜访矿上的洪帮首领，与之喝表示歃盟的鸡血酒，用义气激励此人帮助罢工，结果顺利达到了目的。

洁身自好的个人作风，平民化的待人接物态度，使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工人群众中具有不同寻常的人格魅力，这为他们接近和组织群众除掉了最大的障碍。

（三）从文化教育入手，培养工人骨干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平民教育”的口号。而当时的政府，也允许建立各类民间学校。不少早期的共产党人参加过这一平民教育运动，因而很自然地把举办工人学校、开展文化教育作为组织工人的首选途径。

1920年秋，共产党人李启汉来到纱厂林立的上海沪西小沙渡地区，创办了第一所工人半日学校，结交了一批工人朋友，迈出了走向工人、组织群众的第一步。当然，这也是非常艰难的第一步。

最初，来半日学校报名的工人很少。李启汉遂改进方法，把半日学校改称为工人游艺会，以文体活动来吸引工人，如购置了留声机，播放唱片；提供足球，让大家到外面荒地上去踢球。李启汉虽身穿长衫，却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亲自给工人倒茶送水，和工人交谈。李启汉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终于逐步取得了工人的信任。1921年春，工人学校重新开学，称“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报名上学的工人比初办时增加

^①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7页。

^②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7页。

不少。这以后,李启汉一面教文化,一面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工人与工人是阶级兄弟,要团结起来向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斗争,才能改善生活待遇,才能获得最后的解放。如当时上海社会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工人不出头,出头便入土”,而教员在给工人上课时,对“工人”两字做出了新的解释,说:“工人两字合起来,是一个天字,所以工人就是天。”^①增强了工人的自信心,使他们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强大。在此基础上,李启汉进一步帮助工人筹组工会,并推荐学习最认真、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工人孙良惠为负责人,从而影响和带动更多的群众。

1921年1月,北京的共产党人邓中夏、张国焘等也以“平民教育”的名义,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之所以在长辛店组织劳动补习学校,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三千余人的车辆厂,工人比较集中。邓中夏等以前在此做过宣传工作,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为了打开局面,这个学校发起时,还“拉拢了几个有力工头”。这所学校“经费是由募捐来的。教员都是用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去的。先只常驻教员一人,即吴雨铭。后来教务发达,增加教员数名,也任用非党同志。这个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工人子弟,夜班是工人”。^②学校除了学习语文外,还有常识课。教员从“天为什么下雨,为什么打雷”,一直讲到现实的社会,工人的斗争。针对当时工人的知识水平普遍低的情况,教职员用通俗的生动的事例来说明当时社会的不合理,指出:“只要大伙心齐,结结实实抱成团儿,什么事情都能办到,就有法子不受压迫了。”^③在课后,他们经常到工人家里去拜访,交朋友,谈心,并把自己编的歌唱给大家听。经过一系列的教育,培养出了史文彬等北方铁路工人的第一批骨干,又通过这些骨干,逐步将长辛店的广大工人团结起来。

在湖南,毛泽东曾经做工人打扮,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接近他们,到茶房去和工人一块喝茶、谈心和交朋友。他曾在长沙城外的一段铁

① 林健伯、李致宁:《李启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②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③ 李新等:《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页。

路上散步时，遇到火车修理厂的工人陈地广。毛泽东就和他“拉话”，然后去他住的地方“玩”，谈他的工作、工资……这个工人觉得客人很亲切。经过陈地广的介绍，他又认识了别的工人。彼此都熟了之后，毛泽东提议为他们办个学校，教他们识字。工人都很赞成。后来，毛泽东派郭亮去做工人夜校的教员。^①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尝试在农村和士兵中开展工作。在农村中的工作，主要是利用暑假学生回乡的机会，办农民识字班，开始时规模都不大。此外，对军阀军队里的士兵，也进行过一些工作，主要是通过茶馆，请他们喝茶，谈话，交朋友。

工人学校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群众工作方式。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不仅可以通过文化教育，迅速拉近同工人群众的关系，以自己热心的服务，赢得工人群众的信任。同时，他们能借此进一步了解工人群众的情况与要求，对他们进行初步的阶级意识教育，并得以挑选和培养工人骨干。工人骨干往往是一些享有威信的群众领袖，能比职业革命家更方便地联系、团结和组织群众。这样就为共产党人组织领导工人运动，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如邓中夏所说：建立学校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入手方法”，目的是“借此以接近群众”，以“组织工会”。^②

（四）建立公开的工会组织

五四时期，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劳工神圣”口号的传播，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日益受到社会有识之士的重视。组织各种标榜代表工人利益的工界团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在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上海，仅在1919年至1921年夏就出现了二十余个所谓工界团体，1922年又出现了十多个。^③然而，这些工界团体并非真正的工人组织，也丝毫没有现代工会的气息。因为其基本特点就是：第一，发起人多为政客、工头，甚至资本家或资方代表，并不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也很少开展旨在维护或争取工人利益的实际工作。第二，工商不分，劳资

① 《共产主义小组》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85—586页。

②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6页。

③ 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混合,有些还带有明显的行会或同乡团体的色彩。实际上也并没有多少工人会员。第三,名称宏大而组织松懈。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自封自己的团体代表着“中国”、“中华”或上海的“工界”。曾受聘担任“中华工业协会”总干事的张国焘即发现,这个工界组织号称有万多会员,实际上“仅仅见诸名册而已……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它的主要业务又不过是用上海工界的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某项政治主张而已。”^①因而,这类有名无实的工界团体,也被形象地称为“招牌工会”。

但招牌工会的大量出现,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已进入了现代工人运动呼之欲出的阶段。建立新式工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并得到了社会各界一定程度的认同,至少统治当局并不严厉禁止。就连军阀吴佩孚,也一度公开表示要“保护劳工”,赞成劳动立法。^②同时,招牌工会建立的方式,也给了共产党人必要的启示。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融入了这股创建工人团体的时代潮流,沿用了招牌工会的某些做法,建立了一批公开的工人组织。由于缺乏经验和力量,这些工人组织,最初尚不是以企业为基本单位、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产业工会。

北京的共产党人在1920年五一劳动节组织长辛店工人集会,当场宣布建立长辛店工会。然而,工会是宣布成立了,“实际上并未切实组织”。因而,为了吸收工人,这个工会又被改称为“工人俱乐部”。^③上海共产党人建立的第一个工会是上海机器工会。这是一个职业工会,即“以上海的各业机器工人组织之”。筹备会上号称“各工厂所到发起人共80名”,陈独秀等到会“参观”,并在报上发出消息,正式的成立大会有近千人参加;随后又建立了同样性质的上海印刷工会,号称有会员1346人。^④但有理由相信,这两个工会的实际会员人数相当有限,而且其职业工会的性质,也使之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和基层动员能力,基本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②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8页。

③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6页。

④ 陈绍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142页。

也是一个空壳性的组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两个工人组织曾成功地组织过工人斗争。当时上海确实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但都与这两个组织无关。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是一个公开的社会组织，其职责就是“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①书记部最初也采取了一些虚张声势的手法。据当事人回忆，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宣言称由张特立（张国焘）等26人发起，“这是为了对外宣传，实际上没有26人”。^②而其工作人员，最初均为向中国共产党领取生活津贴的职业革命家。

中国共产党人所建立的这些工人组织，最初也像招牌工会一样，经常以工人的名义参加各种政治性的社会活动。如劳动组合书记部建立后，曾致力于联合各种招牌工会，试图建立由自己主导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或上海劳动总工会，发起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组织有关反对华盛顿会议，追悼黄爱、庞人铨，纪念五一，反对澳门葡萄牙当局暴行的政治性集会与抗议等。共产党人所建立的工人组织与招牌工会最大的不同，则是它们始终把鼓动、指导和组织工人开展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因而最终获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并由此建立了一批真正的产业工会。

（五）以维护工人切身利益为中心，开展经济斗争

建立了自己领导的公开的工人组织后，中国共产党人主要凭借这些组织、用公开斗争的方式来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

1921年7月，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因反对监工克扣工资与侮辱而宣布罢工。劳动组合书记部闻讯，立即派李启汉前往指导。李启汉很快就通过其出色的宣传鼓动，获得了一批工人的信任。他在工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帮助工人建立了一个作为罢工领导机构的工人代表会议，并提出了非常明确而又具体的罢工要求。经过历时三周的斗争，罢工最后取得了胜利。工人显然从这一胜利中，理解了组建工会的重要性。

^①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② 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因而,李启汉等趁热打铁,发起建立上海烟草工人会,有400多人签名入会。但这个上海烟草工人会,仍属于职业工会的性质,即“凡是上海烟草工人,都可以入会”,它的会所就设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内,^①因而,仍然缺乏足够的群众动员能力。1921年10月,该厂工人再次举行罢工,随即遭到失败。直到1922年10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才应英美烟厂印刷部工人的要求,帮助他们建立了真正的产业工会——浦东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劳动组合书记部积极谋求发动上海的工人进行响应。除了公开发起组织上海香港海员后援会外,还成功地发动或指导了一些罢工。当年3月,李启汉等发起建立浦东纺织工会。4月,该工会就代表日华纱厂一厂、二厂的工人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两成的要求,旋即举行罢工。劳动组合书记部马上联合了一批招牌工会组织了浦东纺织工人经济后援会,为这次罢工提供政治声援和经济支持。总共募得大洋267元,小洋164.5元,铜元220枚,米2石,通过纺织工会,转发给全体罢工工人。^②最后,日华纱厂的资方被迫同意增加工资1—1.5成,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与资方交涉的权利。这一胜利,使浦东纺织工会的威信大为提高,两三天内就有3500名工人要求加入工会。^③1922年4月,上海邮局的信差为抗议当局的苛刻的保证金规定,发动罢工。李启汉即在第一时间赶到邮政大楼附近,找工人谈话,进行鼓动。工人最初有些紧张,不敢与他接近,李启汉就印了一些传单,亲自上楼散发。^④最后,罢工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一个上海邮务友谊会。

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的这些活动,尽管规模相当有限,却因真正体现了为群众谋求实际利益的宗旨,因而迅速受到群众的拥护,并就此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一名当时的工作人员就回忆说:“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公开指导工人罢工的机关,工人要罢工就直接来找我们……”

① 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② 《民国日报》1922年5月4日。

③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123页。

④ 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人家也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来找我们实际上就是找共产党，他们并不感到可怕。”^①甚至宝隆医院的护士，因对外国医生的态度不满，也来找书记部求援。但也因为如此，它很快就丧失了公开活动的条件。上海的租界当局十分清楚，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极有组织的罢工的司令部”，其主要活动家李启汉是“上海工潮(的)主要组织者”。^②1922年7至8月间，上海租界当局以唆使罢工、登载激烈文告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李启汉，查封了书记部。失去这个公开的阵地后，共产党人在上海领导的工运即陷入困境。以后，虽然又建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但公开活动的余地已经很小了。

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也充分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缝，采取公开活动的方式，并以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工作中心。

1920年直皖战争后，尤其是1922年直奉战争以后，野心勃勃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成为北方地区最大的实力派。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吴佩孚当时竭力标榜自己的进步和爱国，曾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开明色彩的政治口号，如召开民众国会、保护劳工等。同时，为了打击其政敌交通系，吴佩孚也有意援引进步力量，如请李大钊推荐交通部的铁路密查员，并对以组织工会为主要内容的工人运动基本采取放任的态度，拒绝进行镇压。而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人李大钊也巧妙利用自己同政界的历史关系，注意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争取到一些政客同情，甚至公开支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政治背景，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曾获得了较大的活动空间。1921年11月，陇海铁路工人为反抗洋员酷虐，奋起罢工，提出撤换有关洋员、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等条件。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立即发动各地工会捐款援助，通电各团体进行声援，并派罗章龙前往指导，帮助工人建立了陇海铁路工会。由于吴佩孚认为这次工潮“系由洋人虐待所致”，虽近在咫尺，也不进行镇压。^③经过10天

① 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② 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17页。

③ 徐有礼：《李大钊1922年7月洛阳行兼论吴佩孚“保护劳工通电”之考辨》，《北京党史》1995年第2期。

斗争，铁路当局最终被迫接受工会提出的 10 项条件，罢工取得胜利。吴佩孚对此的第一反应竟是：“这次北大（劳动组合）书记部人在北方铁路与交通系斗法，居然神出鬼没，打败南方财阀，他们确实有些办法哩！”^①

由李大钊推荐的 6 个铁路密查员，表面上是奉吴佩孚心腹之命对交通系分子进行监视，实际上却是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铁路工人运动的秘密特派员。这种特殊的身份，为党的群众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邓中夏指出：“第一，我们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并且任何同志都可利用免票乘车；第二，六个密查员却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定生活费外其余归党。此时，正因职工运动费用支绌，得此不无小补；第三，密查员是各路现任职员最害怕的，因此共产党员得着保护，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②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局面，由此得以迅速打开。仅在京汉路上，就建立了 16 个工人俱乐部，每个车站工人超过 100 名，就有一个俱乐部分会。

但这些产业工会，基本情况仍是：“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组织，每一工会内部大概有一主任或委员长，文书、组织、宣传、庶务、调查、交际各部。大会，代表会议，委员会议都是有的，但在组织的运用上的确模糊不清。一般的说，工会的秘书，确是我们派知识分子去充当……往往不知不觉的变成‘秘书专政’……”。^③也就是说，真正在这些工会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党派去的职业革命家，而不是真正的工人领袖。这也意味着这些工会尚缺乏牢固的群众基础。

随着工会组织的广泛建立，以争取自身权益为中心的北方工人运动猛烈高涨。1922 年 8 月，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首先为增加工资而举行大罢工，由于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周密安排，《晨报》、《大公报》等发表了同情工人的报道，对铁路当局构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因而很快取得了每人每月增加工资 3 元的重大胜利。整个北方的铁路工人

①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67 页。

②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44 页。

③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58 页。

都因此而深受鼓舞，罢工潮就此迅速蔓延，写就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最壮丽的篇章。山海关、唐山、开滦等地的路矿工人，都在工会的领导下相继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均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即使是遭到了武力镇压、被邓中夏认为属于失败的开滦煤矿罢工，实际上也为工人争取到了一定的利益，即：低于15元的月工资，给予增加10%，每年年底加给半月工资。^①这一系列成功的斗争，使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威信空前提高。工人深切认识到，“书记部是真心追求民主政治的人，绝对不是政治上玩猴把戏的，是工人们难逢难遇的”，“今日中国整个工人阶级都应该与书记部结义”。在工人中还流行过这样一首白话词：“书记部，真不赖，立工会，多自在！领头罢工有担待，长工钱，歇礼拜，年节包饺子，姑娘把花戴！今后谁禁咱罢工，咱就打破他们的脑袋！”^②

但是，当北方的工人运动发展到1923年2月时，军阀吴佩孚已觉得不能再予以容忍了，悍然以血腥手段，镇压了京汉铁路的二七大罢工。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在北京不能再公开活动，原来建立的公开工会也全部被查封。北方的工人运动就此陷入了低潮。

（六）在领导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

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涌现出了一批有着一定政治觉悟和群众威信工人领袖。他们通过斗争实践，认识到了共产党的正确，许多人就此被吸收入党。如京汉路的史文彬，津浦路王荷波，京奉路的邓培，胶济路的郭恒祥，正太路的孙云鹏，陇海路的游天祥、魏荣珊等。他们建立起了一些以工人为主的支部，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了扩大。

但是，总的说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工人党员并不积极。邓中夏认为，这是当时所犯的“一个极大错误”，主要原因就是对发展党员的标准掌握过严，“以为工人觉悟程度还不够加入共产党”，把许多积极分子拒之门外。^③直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党仍仅420

①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2页。

②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3、185页。

③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459页。

名党员,其中工人党员 164 名。

三、对公开斗争模式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在工人中开展的群众工作,可以归结为一种“公开斗争”模式。即:党主要利用当时社会政治环境所能提供的有限空间,通过建立公开的工人学校和工人组织来接近、组织和动员工人群众;而动员的切入点,就是维护、争取群众的切身利益;一旦群众的利益通过斗争得到实现,群众就会迅速凝聚在这些公开组织的周围,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党的政治影响就此得到有效的扩大。

在这种公开斗争模式中,存在着三个决定性因素。

第一,从事群众工作的职业革命家有崇高的献身精神。只有具备这种精神,他们才会不避艰险,走向群众,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获得群众的信任。事实上,当时的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如上海工运的主要活动家李启汉,在 1922 年 1 月、2 月,就因组织工人运动而两次被租界警方拘留、传讯,但他毫不畏惧,继续活动,直到当年 6 月被判刑入狱。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成员,更因他们情操高尚而被人称为“新的清教徒”和“政治童贞”,并在实际斗争中形成了“见利不争、见害不避”的优良品德,经手大量救济罢工的现金、物资,而很少发生贪污现象。因此,他们在群众中普遍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他们培养的许多工人骨干,本来就是享有一定威信和群众领袖。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工运机构能切实掌握群众的利益诉求,及时发动或支持他们为维护切身利益而开展的斗争,并且掌握一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能够给予工人组织方面、策略方面的有力指导及必要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以能保证斗争的胜利,即群众利益的实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运领导者坚信,“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口号,“就是劳动阶级亦是闻之掩耳而走”,“与实际何尝有丝毫补益”,过去的工人运动,皆“未注意工人切身的经济要求,所以失败后,就烟消云散,未在工人中留下丝毫影响”,只有共产党人,才“一面助长

工人的爱国运动，并因利乘便的输入正确意识，一面宣传真正工会组织的意义，并进而引导工会为工人的切身利益而奋斗”，因而，当时所有的工人工作，“完完全全是引导劳动者向纯经济的斗争的道路”。^①实际上，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主要特点。根据对报刊资料的统计，1921年至1922年间全国发生罢工140次，其中的115次以工资或改善工作待遇为目的，4次以成立工会为目的，只有1次政治性罢工。^②而且，多数罢工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事实证明，哪怕是微小的利益实现，也能使群众的信心和对党的工运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得到增强，并对更多的群众产生激励作用。然斗争一旦失败，则必然造成工人积极分子被资方开除，甚至被当局逮捕杀害、群众发生恐慌的局面，党的影响就此急剧下降。1922年11月，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领导的日华纱厂和英美烟厂同盟罢工的失败，即招致了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和上海纺织工会的瘫痪，整个上海的工运也就此进入低潮。^③

第三，存在着公开活动的政治空间，即存在统治当局不进行直接的暴力镇压的空间。这实际上也是整个公开斗争模式的生存空间。尽管历史已经证明，在近代中国的专制政体下，武装斗争是通往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但在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缝隙的特定时间和地区，如被租界割裂了行政权力的上海、吴佩孚与政敌激烈争斗时的北方地区，仍然存在着开展某些合法斗争的空间。早期的共产党人，正是利用了这个空间，走出了自己开展群众工作的第一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然而，这种空间毕竟相当稀少、相当狭窄。一旦统治阶级认定，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将严重危及其统治秩序时，他们立即会毫不犹豫地進行凶残的镇压。而一旦合法的工运机关不再存在、那些在群众中享有威望的职业革命家无法公开活动时，群众立刻会陷入群龙无首、恐惧畏缩的状态，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迅速丧失在群众中的影响。

①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张特立：《“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中国工运史料》总第12期。

② 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5表。

③ 陈卫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1922年6月,上海租界当局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查封和1923年2月吴佩孚对二七大罢工的镇压,都马上造成了这种后果。据1923年11月中共三届一次会议的报告披露,这时,上海“工作仍然毫无起色”,连机器工会都因数次失败而“无形消灭了”;而曾经轰轰烈烈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仅剩一些规模很小的秘密工会,最早建立工会的长辛店工人,虽然“大多数对于工会还信仰”,但都“不敢出头”,“工人阶级内部的精神,亦因此而涣散,胆怯,有的还堕落了。”^①

在这种公开斗争的模式中,是否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这除了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对于在发展党员问题上存在着认识偏差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斗争模式的运行,主要是依靠公开机构的政治影响和职业革命家的个人魅力,即党对于工会的领导,“只是个人式的英雄领导,而不是党的组织领导”^②。即使没有基层党组织的普遍建立,只要可以建立公开的组织,照样可以掀起巨大的群众运动浪潮。

正因为没有注意在斗争中努力扩大党的队伍,并建立起坚强的基层党组织,当公开斗争模式无法维持时,中国共产党因没有基层党组织的支撑,无法通过地下斗争来维持自己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陷入了极大的困境。然而,这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仍未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共三大通过的《劳动问题议决案》承认,“中国目下劳动运动方取守势”,却仍把今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重新获得公开斗争空间上,把“恢复工会”作为指导工人斗争的首要方针。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191、187页。

②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9页。

第二章

大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 在工人中的群众工作

一、历史背景

(一) 上海城市和工人阶级的特点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城市。一方面,上海的地方政治体制带有强烈的殖民地色彩,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存在着开展某种程度合法斗争的空间。同时,它的现代经济相当发达,是中国最大的现代经济中心,无论是商业、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公用事业,均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这两方面的条件,使上海很自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心地区。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强迫中国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依仗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清政府的颀顽无能,在上海建立了两块租界。所谓租界,就是由外国殖民者进行直接统治、游离于中国领土管辖主权之外的区域。租界是一个“国中之国”,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和武装力量,有独立于中国的司法系统,中国政府的一切机构,包括警察和军队,都不能进入租界行使权力。两块租界的存在,使整个上海城市的行政管理被一分为三,形成了三个互不统属与协调的政治区域,即由中国政府

管理的华界、主要由英美殖民主义者管理的公共租界和由法国殖民主义者管理的法租界。

在这三个区域中,统治当局在如何维护其基本利益方面有着很不相同的理念和方略。在由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华界,实行的是传统的专制统治,不管是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均是如此。他们没有任何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观念,不允许任何反对政府的言论和行为存在,而且严刑峻法,人民的生命财产不能得到任何保障。但是,这个相当腐败而且无能的统治机构,尤其在北洋军阀时期,在镇压进步或异己政治力量方面,虽然十分残暴,却往往反应迟钝,效率低下;对于人民的民族情绪,特别是反抗租界当局的一些活动和斗争,有时还采取某种放任态度。而租界的殖民统治当局,即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则基本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模式进行统治,强调法治,允许存在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特别是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自由。租界的统治效率比较高,对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帝情绪,反应十分敏锐,但相对于华界来说,对政治犯的直接判罚比较轻。这当然使中国统治者十分恼火,但是,他们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出于维护自身殖民统治利益的考虑,租界当局在镇压革命力量的问题上,一般不愿与中国政府积极配合;两个租界之间,也很少有密切的协调;而中国政府,在镇压人民的反帝活动方面,亦不会完全满足租界当局的要求。因而,在政治控制方面,上海存在着很大的缝隙;尤其是租界,往往成为中国各种革命力量从事政治和宣传活动的重要阵地。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已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全市的各类职工(包括店员、手工业者、苦力工人等)即工人阶级总数,估计在80万—90万人之间,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①这是一个相当庞大、内部结构也十分复杂的社会群体。

近代上海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早在19世纪40年代开埠以前,市区的20多万人口中,就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外地的客商,他们建立

^① 据丁日初:《上海近代经济史》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页。

了为数众多的会馆公所。19世纪后期，随着上海现代工业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外地贫民来沪打工谋生，使上海城市的人口急剧增长。1865年，上海的人口总数为69.2万人，1910年即达128.9万人，1927年更达到264万人。新增的人口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外地的移民。据估算，1885年至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的人口，80%以上为非上海籍贯；在租界以外地区，非上海籍的人口也要占70%以上。^①而这两个地区正是上海主要的工业区。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工人，主要就是由移民所构成。

由于当时上海的工厂普遍实行由包工头负责招募工人。来上海工作的穷人，或是与包工头沾亲带故，由其直接从家乡招募而来；或是设法请同乡介绍结识包工头，由其介绍入厂工作。因而，上海企业中的职工群体，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即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往往集中在同一个企业、行业，甚至同一工种。例如，福新面粉厂的两个分厂中，在轧面车间的都是宁波籍工人，包装车间的是无锡籍和常州籍，而在户外装卸小麦的都是苏北籍，每个车间都由一位与其工人同籍的包工头或把头负责。^②从表面来看，同乡、同籍便于工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团结，但这种基于地缘的联系和团结，却往往会模糊他们的阶级意识，形成带有人身依附性，即封建性的帮派关系，并被包工头所操纵利用。包工头实际上可视为一种工人贵族。他们普遍与资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对工人进行盘剥，决不可能真正代表一般工人的利益。

上海工人阶级也是一个生活境遇极其悲惨的社会群体。

根据北洋政府颁布的《暂行工厂通则》，工人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但实际上，一般都在10—12小时。据1926年对上海45家工厂的抽样调查，13家工厂的工作时间为12小时，23家的工作时间为10—11.5小时，5家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最长的为14小时，仅4家不到10小时。工人劳动条件恶劣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而且没

① 据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附录。

②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

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因而工伤事故层出不穷。据一个美国传教士对1923年上海工业医院880个工人住院病例的分析,其中属于工伤事故者占43%,其中100例是童工,而且年龄最小者仅5岁。^①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海普通工人的工资收入,一般为每月10元左右。而当时的米价,也在每百斤10元左右;一个五口之家每年的生活费,至少需要450元;远远高于绝大多数行业的普通工人年收入。因此,工人为了维持生计,只有让妻儿进厂工作和降低伙食标准。

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几乎毫无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可言。1914年开始生效的《治安警察条例》明文规定,警察有权“制止一切工人之结合与行动”。整个城市没有任何保护工人权利的法律或法令。因而,资方可以任意制定各种侵犯工人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规章制度,欺压、侮辱、打骂工人。20年代初期,沙逊集团考察上海的工业投资环境,首先注意到的一个有利因素即上海“能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没有任何限制多班开工的因素……也没有限制两班制的法律规定”^②。在社会上,工人也是被公认的贱民阶层。1925年10月,军阀发动争夺上海的第三次江浙战争(亦称奉孙战争),在上海市区疯狂拉夫,引起了上海地方人士的强烈抗议,但其抗议的内容,却主要是因为这次连着长衫的店员也不能幸免。可见,在他们的心目中,把穿短衣的工人拉走,乃是天经地义之事。

发达的现代商业、制造业,要求工人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上海特殊的华洋交错共处的文化生态,也有助于拓宽一般工人的视野。因而,上海工人总体上的知识文化水准要高于其他地方。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内部差异。如棉纺织业、卷烟业、面粉业、公共电车业、人力车等行业工人的文化水平较低。纱厂工人“一般的讲,一字不识的,男的有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女的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在内外棉第七厂中,男工七百多人,能够稍稍认得几个字的,还不到一半,

^①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242页。

^② 张仲礼、陈曾年:《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其中能勉强看报的，不过十几人。女工三千多人，能认识字的只有五六十人，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看报的……恐怕不到千分之五。”^①而市政业的工人则文化稍高。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的1800余职工中，“卖票的都认识几个字”。“在机务部方面识字者大约在百分之二十至三十”^②。三千七百多邮务工人“一般的文化水准，是比较高的，最低限度必须懂国文，并略识英文”。大多数工人政治思想意识不强，信仰大多还局限在传统的封建式的帮会和神灵。“男工十之八九都参加了青洪帮，拜有老头子，信仰关公。”女工多数是“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表示，但对自由解放，生活改善的主张却都表示欢迎”^③。邮务工人的信仰则是五花八门，“有耶稣教徒，天主教徒，也有信道教的，信佛教的”^④。

尽管上海的工人阶级很早就开始了自发的反抗，发动过多次经济斗争，尤其是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工人的自发性斗争明显增多。但由于缺乏有力的、正确的领导，工人无法克服自身的弱点，不能使自己的政治、经济待遇获得任何改变。

（二）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新战略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参与和协助下，成功地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走向高涨。一方面，随着共产党员不断地加入和积极的活动，作为国内最大政党的国民党的基层组织逐渐获得巩固和发展，党员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员的人数从1924年前的近5万人，猛增到1926年10月的45万人。^⑤另一方面，国民各阶层群众，首先是大城市中的学生、工人、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热情不断增长，并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全国性的群

①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②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③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12页。

④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472页。

⑤ 土田哲夫：《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党员成分的特征和演变》，《民国研究》总第6辑。

众反帝运动浪潮——五卅运动。1926年7月，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随着北洋军阀的节节败退，各阶层人民的政治热情更加高涨。首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革命纲领——反帝反封建，已成为最深入人心的政治口号。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走狗。”^①

在国共合作之初，由于缺乏政治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一度过于偏重国民党，忽略自身政治影响和组织的扩张。如1924年2月中共的一份文件要求：“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使国民党易于发展”；而对于发展自己的组织，却过分持重，即“介绍新分子加入本党时，须十分慎重选择，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其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②但这种偏差很快得到了纠正。

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强调指出，“劳动运动尤其是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因为，“工人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连接这些工人，我们的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上的势力。”根据这一认识，会议明确规定：“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

^① 陈独秀：《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第128期。

^②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1924年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①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在理论上阐明了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以壮大自己力量的必要性。中共四大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而要取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首先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人运动的领导，使工人阶级建立起“坚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而要担负起组织工人阶级的责任，党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加快党员队伍的扩大。

中共四大并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做出了专门的决议。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就将仍是一个宣传性的小团体，而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强大群众基础、能够“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革命群众”的革命党。^②

显然，1924年5月的扩大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新的城市工作战略，这就是基于对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认识，要求把党发展成一个有着强大工人群众基础、具有巨大政治影响的革命党，改变迄今为止实际上的“宣传性的小团体”的状态。中共四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即以此为重要战略目标，把发动和领导各阶层的群众，首先是城市工人群众置于中心工作的地位，做出了一系列有关开展工人运动、加强群众工作的决定。这些决定，就成为这一时期党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

（三）上海地下党基层组织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确立了必须建立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的原则。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三十

^① 《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189—191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308页。

人的,应从委员会的委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①中共二大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②这也就指出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党必须联系群众,党的自身建设——组织和内部教育必须适应这一要求。根据这个基本认识,中共二大党章对基层组织的建设做出了具体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③这“组”就是党的基层组织。中共三大党章的规定与此基本相同,只是把“组”改称“小组”,其建立的条件改为“五人至十人”。

上海在1921年底就建立了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上海地方委员会(上海地委)。1922年7月以后,改为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工作范围扩大到领导江苏、浙江两省党的工作。1924年4月后又不兼区委,仍称上海地委。1925年五卅运动后,党员人数和党的组织有了迅速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1日决定将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改建为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上海区委,亦称江浙区委)。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规模很小,组织发展速度也相当缓慢。中共二大召开前夕,党员总数为195人;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党员总数为432人,到同年11月,也不过增加了百余人。^④上海同样如此,1922年6月上海有党员50人,但到1924年5月,总数仍只有47人。^⑤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②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③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3—98页。

^④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中局报告》(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页。

^⑤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上海地方报告》(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0、256页。

这一时期党组织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就是党的各级组织对入党条件的掌握普遍过严。上海地委曾这样解释 1924 年 5 月以前本地党组织发展缓慢的原因：“（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中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他进国民党去了；（二）介绍为本党同志，务在严极。”所谓的“严极”，应该就是后来被中共中央所否定的须“先经过民族民主的政党之政治训练，然后才可以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的做法，或者是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了解马克思主义，都应有高度的工作能力”。^①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许多人坚持认为：在还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党内教育和训练的情况下，大量吸收党员是危险的。^②

同时，尽管确定了必须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原则，但对于基层组织的基本职责及活动方式，中共党章尚无明确的规定。因而，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最初也很不理想。上海的地方组织一度因“内部涣散，等于没有组织”，虽经整顿，却“工作仍然毫无起色”。^③为了保证组织的正常活动，上海地委甚至做出过“如组长一次溺职，罚洋十元”的决定。^④1924 年 5 月，上海的基层党组织共有上海大学、闸北、老西门、法租界、虹口 5 个组。按照党章的规定，各组至少每星期开会一次，可“一月来惟第一组开了三次会议，第二、三组只开过一次会议，第四、第五组一次会也没有开过”，党费也不能按时收清。^⑤

1924 年 5 月，中共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要求加快吸收党员，并初步明确了党的基层组织——小组的基本职责是：教育党员，发展新党员，经常在工人

① 《上海地方报告》（1924 年 5 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1924 年 5 月），《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6、243、474 页。

② 《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十一号》（1925 年 10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6 年编印，第 51 页。

③ 《各委员报告》（1923 年 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0—191 页。

④ 《上海地方兼区委第五次会议记录》（1923 年 7 月 24 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 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90 年编印，第 11 页。

⑤ 《上海地方报告》（1924 年 5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7 页。

群众中做宣传工作。同年11月由陈独秀和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第21号通告,又进一步指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显著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因而专门强调:“小组及地方会议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并规定:各“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①。这时,上海的党员增加到102人,建立了8个组。^②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首先,经大会修改的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的名称是“支部”,即任何地方,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公推三人组织干事会(相当于今支委会);支部人数较多时,可以再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大会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并确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现行的基层组织体制。

其次,大会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论述。《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极大地密切与广大劳动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关系,必须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党员们受其所隶属的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干事会的指挥。”因而,“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③。

最后,《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重申了1924年中央扩大会议对支部的工作职责的规定。即“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

^①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1924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300页。

^②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第158页。

^③ 《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380页。

员……支部在一个企业中，应当时常善于利用企业主和其使用人之压迫工人或冲突或致于罢工……的机会，去宣传工人群众，促成他们阶级的自觉”。这样，就明确了支部的基本职责：一是教育、管理和发展党员，二是开展群众工作，对他们进行政治上的引导、教育。同时，会议还决定在国民党和各种社会团体中建立党团，以“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

中共四大的这些决定非常及时。因为几个月后，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性群众运动高潮来临。中共四大的这些决定为党在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做好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制度准备，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运动领导权的掌握，并使自己的基层组织力量获得突飞猛进的扩张。

随着基层组织建设的不断推进，党的领导机关在1926年7月的第三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前后又对基层组织的建设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和部署。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连续发布了4个有关的文献。

192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①对党支部的功能、任务及工作方式，做出了8个方面共54条的具体解释与规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支部工作的详细规范。6月，上海区委发出专门阐述党的建设问题的第63号通告。^②7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尽管对于这次会议在党的政治策略方面的决定，历来评价不高，但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③等文件，在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基层组织建设方面，却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7月26日，上海区委组织部负责人赵世炎在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做了传达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有关支部工作精神的报告《组织问题与支部工作》^④，对一些重要观点，

① 《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1926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11—618页。

② 《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六十三号》（1926年6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12—222页。

③ 《组织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职工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186、196—205页。

④ 赵世炎：《组织问题与支部工作》（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87—298页。

做了进一步的理论阐述。这四份文献所提出或阐述的一系列观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组织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建立强大的基层组织是共产党的根本特点。《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开宗明义即指出，共产党“与其他的一切社会党的组织根本不同之点，就是它的基本组织是支部。”赵世炎进而强调，党的组织建设问题是很重大、很需要、又很宝贵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枢纽，俄国共产党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弄清楚，才建成现在这样严密完善的组织。因此，不能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简单容易。

第二，支部最重要的意义或功能，就在于它是群众的核心，“是党在各种社会中之核心”。《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提出了支部八项具体功能。即支部的组织意义是：党的基本组织和党的组织单位；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党在群众中的核心；发展党的工具；党的生活的中心；党的战斗的武器；党的实际监督党员工作的机关。还有一项为“支部是党在群众中的耳目手足——党有支部的组织，才能知道群众的要求，群众对于革命的情绪；在群众方面才能感觉到党的指导，这样才能在群众中起作用，才能领导群众。”上海区委的第63号通告则根据陈独秀的一次讲话^①，把这些功能概括为“核心”，即“支部的意义在能使每个群众都以他为革命的核心，他是有真正群众的，是完全接近群众，而能调动群众的一个唯一重要的党的革命的工具”，“支部二字，在西欧各国原文都作‘核心’意义解释，中国译为支部与意义似有不合”。^②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的《组织问题议决案》重申了这个观点，指出“支部并不是分部，而是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某区域的核心。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就是集合这许多的社会的核心，而成为一个党。支部的组织是按照社会的生活而精密分划的。”《议决案》和赵世炎的报告进一步指出，

^① 《中共中央、上海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6年6月1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2，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52—253页。

^② 当指“nuclei”，其单数形式为“nucleus”，本意即为“核，核心，中心”。《联共布党史简编》英文版（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1）中，党支部均作“Party nuclei”或“nuclei”。

现在党的支部却多数未能做到这一点，只能起到教育党员的作用，像一个党的分部，而并未成为所在社会组织或区域里的核心，因而党不能接近群众领导群众，“没有真正在群众中建立党的基础”，“这是一个最严重的缺点，应当要立刻改正”。

确立支部就是群众的核心这个观点，就意味着支部必须尽可能地联系群众，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并通过关心群众的各种切身利益的问题，来引起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由此乐于与党接近，并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这是对支部基本功能的最有力的解释，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指出了根本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方面的重大飞跃。

第三，对支部建设做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和具体操作的规定。扩大会议的有关决议规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支部干事会即支委会；只准设置两种支部，即按企业、学校或农村等单位设置的支部和按居住地如街道、区域设置的支部；支部必须执行党的决议和训令，给每个党员分配工作；重申党团不能成为党的第二组织，党团中的党员不能脱离支部，如党团的决定与支部有分歧，应提交上级机关解决。工厂的党支部必须通过工会，参与一切与工人利益有关的事件，借此组织和训练工人，并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则对党员教育的内容、开展群众工作的方式和技巧、支部生活的内容和程序、支部书记的职责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些原则和规定，使全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到了制度化的水平。

第四，提出了必须发展党内民主的思想。中共上海区委的第63号通告首先提出，中共是一个战斗的力量，为了使党的行动敏捷，需要实行相对的集权，但为了使党的政策群众化，使党的力量进一步扩大，也应该尽量实行党内民主，即“施行党的德漠克拉西”。对于支部来说，具体的措施就是大的支部经常开代表大会，小的支部经常开全体大会，这样可以增进党员对党的认识与工作的责任心；同时，要试行各级党部执行委员或支部干事的选举。虽然扩大会议有关组织建设的决议没有采纳上海区委的这一意见，但在《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中，却准许上海区委在部委、支部中“试行初步的德漠克拉西”，即用民主方式选举部分的部委委员和支部干事。

最后，提出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1926年7月1日，中共

上海区委组织部的会议首先提出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采纳了这一提法,在《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正式确定了“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含义,就是要把“党的真正基础建筑在各支部上面”,“把党的基本工作责成各支部,建立每个支部的活动工作,在每一个支部里实行分配工作……使各支部里都有全党形式的各样工作”。按照赵世炎的解释,这一口号,表明了支部工作的重要性,它意味着要求支部承担更多的工作,“使支部成为社会之核心,使每一个党员的所有社会关系和工作,统统集中到支部里面来。”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及时,而且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口号。因为只有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核心作用,党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也只有高度重视了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其应用的作用。对此,共产国际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指出:中共七月的扩大会议的有关决定,即“党的整个组织工作应当是根据实际任务把党员和非党群众团结在党的政治口号周围。党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吸引每个党员投入到贯彻执行行动纲领的工作中,而且这项工作基本上应通过支部进行”,是“完全正确”的。^②

不言而喻,上述思想观点,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二、群众工作模式的转变

(一) 五卅运动:公开斗争模式的成功与失败

开展工人运动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群众工作的主要内

^① 《上海区委组织部关于七月份上海工作报告》,《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页。该文件原无年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编者判为“1925年8月”,误。因文件中提到要与严春阳、丁文江交涉及“请汪(精卫)销假”问题,而严、丁均系1926年才在上海任职,汪的“请假”亦是“中山舰事件”以后之事。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1927年1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容。上海工人运动在1923年陷入了低潮，党领导的工会曾几乎完全丧失对群众的影响。中共上海地委在1924年5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坦承：“我们所做的工人运动是没有钻到里面去，只立在工人群众外面的，所以做几次，失败几次，到现在还是等于零。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是很大的错误。”^①而招牌工会，特别是一些有国民党背景的招牌工会却重新活跃起来，还在1924年3月建立了排斥共产党人的“上海工团联合会”，号称拥有30万会员。

为了重新打开局面，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加强了对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党内富有工运经验的著名领导人邓中夏、王荷波、李立三、项英等，先后被调入上海工作。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对开展工人运动的方针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特别强调要通过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来打开工作局面。即“工会的责任是发展会员的阶级意识，扩大他们的眼界，使日常的斗争问题，都和工人最切身的利益连接起来，譬如工资，工作时间（每日的时间，每星期或每月的日数），每星期的休息，人道的待遇等”，在策略上则要注意“渐渐建筑基础，留意群众的心理，不要太冒险”，因为“工会小组的第一次胜利，在每一企业里，拥护本企业工人的利益，而能得第一次的成功——那就必定有开展组织的可能，使大多数工人加入工会运动。”^②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也再次强调，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策略，一是要力争工会的公开，同时须“注意于提出的口号，使能适合当地群众的组织力量、需要及情绪，而促起群众做切实的更进一步的奋斗。过高的口号即不但不能真正引起群众自动的斗争，而且容易受反动派的中伤，在失败后借口归罪于我们。”^③

这一时期的工运工作，仍基本沿用建党时期的公开斗争模式，即从

① 《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② 《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4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235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48—349页。

举办工人学校入手,在工人学校的基础上组建公开的俱乐部或工会,团结、培养一批工人骨干,然后建立公开的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由于上海存在着外国租界和大量的外资企业,民族矛盾特别尖锐。同时,这一时期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缝有所扩大,群众的政治热情则日益高涨。党的领导机关较好地利用了这种形势,通过加强对群众政治上的因势利导,主要是以政治斗争或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经济斗争为切入口来发动群众,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1. 创办工人学校和俱乐部,培养工人骨干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李启汉,曾在沪西纱厂集中的小沙渡地区建立过一所工人学校,建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李启汉被捕后,中国共产党在该处的工作一度中断。1922年秋,青年团员嵇直被派到该处重新开展工作。嵇直在一家杂货铺边挂了一块“代写书信,不取分文”的纸牌,用免费代写书信的办法,结识了几个工人,随即在自己住处办了一个最初仅4名学生的工人补习班,用《新青年》、《向导》、《劳动周刊》上的文章作教材,很受欢迎。随着学生的逐渐增多,嵇直又请自己的同学徐玮在附近建立了一个同样的工人补习班。不久,李启汉原来的学生、工人孙良惠参加了补习班的工作,到处介绍工人参加学习。

1924年3月,国共两党为了发动群众,在上海大力推进平民教育,建立了公开的上(海)宝(山)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民国日报》上发布文告,号召各学校都建立一所平民夜校,并吁请各工厂经理动员工人就近参加学习。正是在这个平民教育的潮流中,中国共产党顺利地把沪西的两个补习班合并成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并公开挂出牌子,工人学生的数量也开始增加。

同年9月,党又根据长辛店和安源的经验,在补习学校的基础上公开建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俱乐部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为宗旨,所有沪西的工人均可参加,同一工厂有部员三人以上,即成立工厂小组。俱乐部由孙良惠为主任,嵇直、刘华先后担任秘书,内设识字班、文化补习班、演讲会,教师大多是上海大学的师生,包括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杨之华、李立三、项英等著名共产党人。免费识字读书,正是工人的迫切愿望,而教师既知识渊博,又善于演讲鼓

动，所传授的知识、观点又易于为工人所接受，因而，俱乐部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数月间，部员就从二三十人增加到近 2 000 人，在 19 个纱厂中建立了秘密的工厂小组。一些有正义感的工头也被吸收入会。^①刘贯之、陶静轩、姜维新等后来相当著名的工人运动骨干，都是在参加沪西工人补习学校或俱乐部的识字班的学习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同一时期，共产党人蔡之华在沪东杨树浦工厂区一个平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同样性质的“工人进德会”，以演剧等形式吸引工人前来听课，参加文娱活动，并印发宣传品让工人带回工厂散发。工人进德会的工作同样获得成功，团结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并在附近各纱厂建立工厂小组。1924 年底，工厂小组的会员达到 1 100 余人。^②

2. 把握政治局势，建立公开的工会

1924 年 10 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政权，孙中山随即北上，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时局宣言，支持孙的主张，并要求各地党组织指挥各群众团体，发起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上海迅速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机器工人俱乐部、平民教育研究社，及由共产党人郭景仁、郑覆他等组织的上海店员联合会和浙江旅沪工会等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一马当先，号召支持召开国民会议，发起建立了多个旨在促成国民会议的群众组织，并派员到各处演讲，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到 1924 年 12 月 14 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宣告成立时，竟有 143 个社会团体列名参加。

这次政治运动虽然为时很短，没有具体的结果，但在动员和组织普通群众，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方面，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如当时正在上海工作的邓中夏所说，工人阶级受到了国民会议运动不小的影响。^③这主要表现为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组织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工人

① 《五卅运动史料》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76—294 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0—91 页。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9—181 页。

③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32 页。

群众的斗争性日益增强。

1925年1月,杨浦工人进德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在进工厂宣传时,被租界警方逮捕,立即引起群众愤怒。来自当地多个工厂的数百工人齐集巡捕房,要求放人,被警方用水龙冲散。2月初,沪西的日商内外棉八厂工人,因反抗日本领班打人,一下子被开除50人。工人忍无可忍,准备罢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及时做出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决定,并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与准备。主要是:将作为罢工指挥部的沪西工人俱乐部迁到租界警方无法管辖的苏州河北岸,召集各厂的积极分子,用带有强烈民族情绪的“反对东洋人的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进行动员,并劝工人等领到工资后再举事。

准备就绪后,沪西工友俱乐部公开出面向日本资方提出以后不准打人、增加工资10%、被开除工人复工等6项要求。资方不予理会,沪西4个日资纱厂的万余工人即按照俱乐部的要求,在2月9日开始罢工,并建立了维持秩序的纠察队。由于事先组织严密,罢工一开始就声势浩大,“反对东洋人打人”等口号又相当准确地表达了群众的情绪,越来越多的工人受到鼓舞和激励。而已经罢工的工人,则不断到尚未罢工的工厂去进行鼓动,如散发传单,呼喊口号,甚至强行冲入这些工厂,捣毁其家具设备,^①即所谓的“打厂”——迫使被冲击的工厂工人加入罢工行列。罢工的规模由此不断扩大,先是囊括了内外棉的11个厂,接着延及沪西的所有日资纱厂,最后是沪东的日资纱厂。到18日,在沪6家日资公司22个纱厂的全部工人都加入了这场著名的“二月罢工”。这是上海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日资纱厂的全行业罢工。

同时,一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团体,如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学联、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等发起建立了“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全力声援罢工,并发起大规模的募捐活动,不仅在报纸上刊登募捐公告,还组织了街头募捐队,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舆论。这一时期,整个上海市民的政治热情已经相当高昂。这次罢工因带有强烈的反帝政治色彩,并通过“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进行了有效的社会宣传,因而也受到社会

^① 上海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各界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一些资产阶级人士也参加了罢工后援会，一些中国纱厂的资本家还向工人捐了款。连《新闻报》这种历来政治上持较保守态度的商业性报纸，也对罢工表示某种同情。

日本资方最初坚执蛮横态度，日本政府甚至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并进行武力威胁。中国警方也曾试图进行镇压，拘捕了带领群众冲击工厂的邓中夏、孙良惠等人。但由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中国警方也不敢公然查封沪西工友俱乐部。工人则因得到广泛的社会同情和一定的经济支持，更加无所畏惧。日本资方慑于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后被迫屈服，央求上海资产阶级出面调解。经过两天有上海总商会、日本资方、各厂工会代表及中国警方代表参加的谈判，罢工于当年2月底结束。

尽管调停的结果，工人仅得到资方不再虐待工人、允许被开除者复工的承诺，没有实现增加工资，但由于整个调解是在官方的参与下、由工会代表出面进行的，所以，调解本身就意味着工会具有了合法地位。这对于工人和坚持依靠公开斗争模式的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胜利。刘华在1925年3月1日的工人集会上就特地强调了这一点，说这次“上海总商会、警察厅长和各商会会长都出面替我们调解……我们工会已和从前不同，现在对中国官厅等于已经备案，在租界也得到了承认，已成为正大光明的工会了。今后只要各位对工会热心维护，我想就不愁得不到胜利。”实际上，中国警方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发表演讲，称：“这次罢工所取得的胜利，都是因为工会的名义……今后大家要维护工会。”^①

工人们显然从这场斗争中，理解了工会维护自己利益的本质，也进一步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因而，罢工结束后，大批工人登记参加各厂的工会。数天之内，小沙渡的工会会员增加到6000人，杨树浦的增加到3000人。3月下旬，纱厂的工会会员达2万多人。4月份，绝大部分日资纱厂的工人都加入了工会。到5月初，共产党人建立的工会组织已有24个，并成立纱厂工会联合办事处，就在沪西工友俱乐部内

^①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1—452页。

办公。^①租界警方惊呼,俱乐部现已成了一个永久性机关。因为这一时期,俱乐部继续以强有力的姿态,为工人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如经过多次交涉,使中国警方最终释放了拘捕的全部工人。一名内外棉纱厂的女工向俱乐部控诉遭到日本人毒打,俱乐部即请律师出面交涉,迫使资方同意发赔偿费;内外棉五厂的三名工头被资方开除后去俱乐部报告,经过俱乐部的交涉,资方被迫收回成命;一些被开除的工人,也因俱乐部的出面,得到了每人8元的赔偿。^②

1925年5月初,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建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派刘少奇等在上海设立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就近指挥长江流域和北方的工人运动,并专门通过《上海问题决议案》,要求建立“全上海工会之总联合机关”即上海总工会。5月18日,24个工会代表决定建立秘密的上海总工会。^③

这时,因为市场萧条,日资纱厂的资方决定向工人反攻,悍然撕毁调解协议,宣布不承认各厂的工会,并以关闭工厂相威胁。共产党人鉴于时机不利,强硬反抗有可能失败,从而危害群众切身利益,曾要求工人暂时忍耐。但资方却以为工人可欺,进而大量开除工人积极分子,并悍然枪杀前去索要工资的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工人忍无可忍,立即在内外棉的5个厂开始罢工。在这种群众已经起来斗争的情况下,中共上海地委决定动员社会各界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但罢工规模不再扩大。在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很快出现了一个各阶层广泛参加的反帝群众运动,中国资本家也开始卷入其中。但日本资方和租界当局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立即决定建立各阶级的反帝统一战线,发动全上海的罢工、罢课、罢市。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学生和工人的强大压力下,上海资产阶级的领导机构——上海总商会被迫下达了罢市的命令。

①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2页,刘贯之:《关于1924—1925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中国工运史料》下,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② 上海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9页。

③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5月31日晚，上海各工会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上海总工会公开宣布成立。翌日，上海总工会发布宣言和告全体工友书，宣布上海工人为抗议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于6月2日实行全市总同盟罢工，号召全埠各业工友全体参加。接着，总工会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加入了得到上海资产阶级认可的、领导上海五卅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工商学联合会。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成功地利用反帝爱国潮流的高涨和政治风暴的席卷，实现了上海总工会的公开成立，并获得了无可置疑的合法地位。这为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和实现对工人群众的政治领导，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3. 在上海总工会的旗帜下

上海总工会成立时，委员长是李立三，下设总务、交际、宣传、会计、组织等科，刘少奇、孙良惠为总务科正副主任。办公地点在中国政府管辖的闸北宝山路。因为，自从查封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后，上海租界当局就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采取严厉禁止的政策。公共租界警方即在1925年4月22日的一份文件中声称：“就公共租界而论，警务处决不容许这类运动进行而不加干涉。”^①

上海总工会在成立的当天，就经过认真研究，做出了分别组织各行各业分总工会的决定，并制定出详细的实施办法，确定了相应的工作人员。随后又通过《上海总工会日报》和新闻媒体，号召工人“快快组织工会”，并公布了组织工会的具体办法，其中明确规定：工会组织起来以后，必须派代表参加上海总工会，并向总工会报告组织及罢工情况。^②为了便于工作，总工会在工人集中的杨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及南市设立了6个办事处，其基本职责是：在各工厂组织工会；指定人员在基层工会驻会办事；每周至少召集一次基层工会职员的会议，对他们进行培训；每周向总工会报告各基层工会的详细情况。^③

① 上海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②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③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上海总工会成立时,所属工会仅 24 个。因而,6 月 2 日响应总工会号召,参加全市同盟罢工的人数还比较有限,仅 36 个企业的 47 435 人。^①但由于租界当局坚持实行高压政策,在 6 月 1 日以后持续屠杀上街示威的群众,激起了工人更大的怒火,政治性的罢工浪潮迅速扩大。到 6 月 13 日,全市已有 15.6 万工人参加了罢工,其中 13 万人属于 107 个外资企业。到 7 月 21 日,共有 206 个企业的 20 余万名工人参加了罢工。^②

随着罢工的扩大,上海总工会迅速完成了组建大量基层工会的任务,并确立了自己在工人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五卅运动期间,总工会领导下的基层工会与日俱增,6 月 7 日为 44 个,6 月 10 日为 67 个,7 月 28 日已达到 117 个,会员 21.8 万人。^③一部分基层工会是在共产党员或总工会工作人员的指导、督促下建立的。许多工会则是工人自发建立的。但这些自发建立的工会也都承认总工会的领导地位。许多工会在宣布成立时,要求总工会派人去指导。有时总工会无人可派,只能写封鼓励信。^④有些工会在成立大会上即明确宣布,派出代表“加入上海总工会一致进行”、“报告总工会罢工经过情形”。^⑤

而一直试图与共产党人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招牌工会——上海工团联合会,则就此陷入彻底的孤立。国民党人马超俊承认:此时,上海总工会已成“工界的权威”,而工团联合会“乃相形见绌,黯然无光……无法与上海总工会对抗。”该会曾想挤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可是连商人们也知道他们没有群众基础,根本不予理睬;该会号称有 30 万会员,可召开一个“工界大会”,只网罗到二百多名流氓,还被总工会组织的工人痛打了一顿。一些曾经隶属于该会的工人团体,遂纷纷要

① 《上海总工会罢工调查表》(1925 年 6 月 13 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0,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 1988 年编印,第 22—34 页。

②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8—219 页。

③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8 页;《五卅运动史料》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01 页。

④ 刘贯之:《关于 1924—1925 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回忆》,《中国工运史料》,下册,工人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6—127 页。

⑤ 《五卅运动史料》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9—91 页。

求加入上海总工会。^①

上海总工会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取得工人群众的信任，除了它为工人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忠实奋斗的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这个根本原因之外，也与它掌握了一定的经济资源，能够为罢工工人提供有效的经济援助有关。

早在二月罢工后期，共产党人就通过学生组织的社会募捐，获得一批救济款项，通过俱乐部发给罢工工人，发放标准是：每人2角，每名被捕人员的家属2元。^②这也是二月罢工得以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因。顾正红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有计划地用“雪耻会”、“救济会”等名义，继续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募捐。五卅运动爆发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各界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募捐活动，以支持工人的政治大罢工。因而，总工会在运动之初就公开宣布将维持罢工工人生计，“拟俟调查手续清楚后，视其平日所执工业之经济状况，酌定贴补办法，大约在罢工期中，每日每人至少贴补小洋二角。”^③6月11日，上海各慈善团体建立以著名资产阶级领袖王一亭为主任的临时济安会，明确宣布其目的就是救济失业工人。连官僚李思浩，军阀张学良、孙传芳都“各捐巨款，拨交该会，以作救济之需”。而济安会的救济款是通过总工会下发的。“所有发款事宜，由总工会开列名册，会同办理”。救济的标准，即为每人每天2角，先每人1元。^④整个运动期间，发放救济款的数额颇为可观。临时济安会从6月11日成立到8月22日，共发放221万余元；上海总工会从5月31日公开宣布成立到7月24日共发放22.5万元。^⑤

正因为总工会领导的政治性大罢工不仅反映了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代表了民族的意志，受到工人的坚决拥护和社会各界道义上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也因为总工会能切实解决罢工所造成的工人实际困难，工人没有后顾之忧，因而，在整个运动期间，总工会在工人心目中的地位

①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232页。

② 上海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1页。

③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④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306页。

⑤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7、818、410页。

确实至高无上,具备着令行禁止的权威性。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上海总工会,在五卅运动期间实现了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有效领导。

三罢期间,上海总工会组织了大量的街头宣传、游行和群众集会,工人都能踊跃参加,因而许多活动都达到万人以上的规模。如1925年6月7日英美烟公司的工人集会,9000名工人参加,会后游行,加入者2000余人;6月11日工商学联合会召开市民大会,参加者达10万人,“其最为人注目者,即为多数之纱厂女工,与衣衫褴褛之码头工人,群集一场,不分畛域。”^①上海总工会公开呼吁各界捐款,以救济罢工工人。许多没有参加罢工的华商企业职工积极响应,从微薄的收入中捐献款项。其中的一部分还直接捐给了总工会。如商务印书馆的职工成立经济后援会,决定所有职工按工资收入的等次捐款给总工会,标准为10元以上者捐5元,20元以上者捐6.5元,40元以上者捐8元,80元以上者捐15元,100元以上者捐20元;中华书局的职工每人捐献一天的工资给学生会和工会。^②沪西工友俱乐部则收到了鸿裕、鸿章纱厂工人的581元捐款。^③

6月中旬,上海资产阶级准备结束罢市,根据党的领导机关的决定,上海总工会宣布赞同有条件开市,但罢工仍将继续。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服从了这一决定。6月20日,总工会召开代表大会,各工会都有全权代表出席,一致决定无论商界开市与否,工人决不上工,坚持到底。6月26日,商界开市,总工会发出号令:“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得完满目的,则头可断,工不上!”尽管这时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心破坏,维持工人生活的救济费已入不敷出,总工会被迫做出了减少救济费的决定,许多工人的生活已十分困难,总工会坚持罢工的号令仍得到了完全的贯彻。不仅没有发生任何擅自复工的现象,而且还出现了新的罢工。据不完全统计,开市以后,上海出现新的罢工二十多起,参加者超过一万人。^④

①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06、689页。

②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6—101页。

③ 上海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④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

进入7月以后，上海租界当局加强了对上海资产阶级的压力，并采取断绝华商工厂电力供应的凶狠手段。软弱的上海资产阶级终于被吓倒了。同时，出于自己的阶级本性，他们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也越来越感到恐惧。因而，资产阶级的上层领袖日益转向破坏乃至唆使军阀当局镇压工人运动的立场。而原来曾与总工会携手合作的中小商人，热情开始低落；学生因暑假纷纷回乡，学联的力量也开始削弱。同时，军阀当局则开始对群众运动实行镇压政策，于8月6日查封了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和洋务职工会。

为了防止工人阶级孤立，保存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及时做出了逐步退兵、开始复工谈判的决定。上海总工会于8月10日发表《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为各企业工会与资方进行复工谈判规定了基本条件，即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发给罢工期间工资的50%，增加工资15%等。其目的，就是要保存工会合法存在这一重大的胜利果实，同时也是为了尽量减少工人参加政治性罢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别谈判，到9月下旬，各业工人陆续复工，五卅运动基本结束。尽管多数复工谈判所达成的协议，未能完全实现总工会所规定的最低条件，但在承认工会或补发工资的问题上，资方都多少作了让步。因而，工人普遍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所有的复工都按照总工会的明确命令进行，并均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可谓盛况空前。如根据总工会第三办事处的通知，浦东日华纱厂于8月27日全体正式复工；届时，该厂工人4700人和其他各业工会代表4000余人，“各手执一颜色纸旗，上书‘欢送复工’‘工会是工人之命’等字样，……于六时许整队出发，井然有序，前后军(乐)队、鞭炮队无数，经过杨家宅东长里至大街，道旁观者甚众，直至厂门，有奉军警察在场维持，门前有二日人拍手欢迎，各工友依队入厂，历经半小时之久，各工会始扬旗欢呼而返。”上海绢丝厂的2500名工人复工时，由军乐队引导的欢送队伍有一万余人，长达三华里，沿途高呼拥护总工会等口号。^①

^①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44—646页。

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也得到迅速地扩大。五卅运动前,上海区^①的党员总数为295人,在运动中增加了785人,到1925年9月,总人数已达1080人,占全党总数的三分之一。上海区共建立了74个支部,其中65个在上海。^②

4. 公开斗争模式的失败

上海五卅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在资产阶级的鼓励下,统治上海的军阀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进行公开的镇压。总工会公开活动的空间急剧缩小。

1925年9月18日,奉系的淞沪戒严司令部发出布告,宣布遵照北京执政府的电令,解散上海总工会,并取消所有工会。当晚,军警查封了上海总工会,逮捕总工会会务科主任刘贯之和交际科主任杨剑虹,并通缉总工会主要领导人李立三、刘华。11月29日,刘华被租界警方逮捕,旋即被移交给军阀当局。

对于这次镇压,共产党人事先已有一定思想准备。转入地下的总工会迅速发出抗议宣言,并要求各工会和工人不必恐慌,也不要罢工。9月24日,总工会所属的117个工会发出告全国同胞宣言,力陈总工会功绩,表示:“不但上海总工会存在时,为我全体工人所爱戴,即其被封后,亦为我全体工人所思念。”^③接着,各工会宣布建立上海工人代表会议作为全市工人的领导机关。

10月中旬,第三次江浙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孙传芳击败奉军,入据上海。中国共产党试图抓住这一政局剧变的机会,重新获得总工会的合法地位。上海各工会及学联等团体,纷纷发出呼吁,要求当局启封上海总工会。12月6日,处在地下的上海总工会发出命令,要求各厂工人罢工一天,参加上海市民反段(祺瑞)大会。是日,五万多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大会,当场通过恢复总工会的决议,并举行示威游行。当队伍行至上海总工会会所时,在群众“启封总工会”的口号声中,总工会代

① 上海区包括苏浙皖三省及上海本地。

② 《上海区委组织报告》(1925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9—42页。

③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6页。

表宣布公开办公，并发表宣言，声明“敝会已在此五万余群众热烈欢呼中拥护上海总工会之声中，再与社会相见矣。”^①随后，汪寿华被选举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然而，孙传芳对工人运动的敌视丝毫不减奉系，6天后即重新查封总工会，并下令杀害刘华。上海工人阶级再次被激怒，与全市各界群众一起，发起了激烈的抗议活动。在工人群众的坚决支持下，上海总工会于1926年1月第二次自动启封。但实际上是处于半公开状态，即会所和名义公开，而重要领导人员秘密活动。1926年6月27日，上海总工会被军阀当局第三次查封，直到1927年3月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才重新公开。

显然，在上海争取总工会的公开活动，是难以企及的目标。

在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和半公开活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主要表现为，“各工会均失其指导的机关，都有无形消灭的现象……许多工会，或因压迫，或因自惧，致有自行取消工会之牌额，而停止进行者；亦有仍旧挂着工会牌额而会所空空，无人居住办事者。”据上海总工会1926年1月的调查，其时尚能继续活动的工会仅47个，会员10.4万人。70%的工人处于悲观消极状态，“这类工人自闻上海总工会被封后即起恐怖，而且以为如此极有势力之上海总工会尚被封闭，以后将全无办法。……于是更以为加入工会后是无所用的。”还有10%的工人（主要是工头流氓）因在救济费上未能如愿而心生怨恨，趋于“反动”。只有20%的工人继续信仰上海总工会。^②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还比较薄弱。五卅运动期间，尽管党员的数量有了较快的增长，但绝对数量仍然有限，无法对群众进行有效的政治教育，也无法通过自己的工作，使大量新建的基层工会获得足够的群众基础。而工会对于工人的经济补助，因为方式方法过于简单，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因此，工人对于工会普遍存在着一些错误的

①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页。

② 《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后之工作概况》（1926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8年编印，第95—98页。

认识,如:“以为工会是专门发救济费的,若无救济费时,则工会可以不需再成立”;“工会在罢工期内有成立之必要,复工后可不必再有工会”;有的甚至认为工会不是工人的团体,而是其他团体办的。^①上海区委的一份通告更是严厉批评说:“因为过去的办事处及工会,几乎全变成为发钱的机关,工会内负责人员,亦几完全变为发放救济费的特派员。工人入会,似亦专为救济费而来,甚至于会内要叫一工友送封信往数百步之外的地方亦非先给他以钱不可。”^②

实际上,当时许多新入党的工人党员也严重缺乏党的知识。有些新党员,是由“党员个人的情感关系”介绍入党的,“只有帮派或姊妹们的情谊,而不知有党”;甚至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为何种团体之党员”。^③据中共引翔港部委的分析,当地的党员中,“大概能分清工会与党的关系有十分之六七,还有十分之三四连工会和党的关系恐怕还弄不清楚。……有阶级觉悟者仅十分之二三而已。”^④闸北部委也认为,当地“大多数同学竟不知道党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党是整个的”,“有的同学不负丝毫责任,视己与党没有什么关系。”^⑤也有些新党员则是抱着个人目的的投机分子。如上海区委所指出的:“在五卅高潮中,我们吸收八百人之多,免不了有少数的反动的不稳分子,所谓‘高潮带进的草渣’。”^⑥一旦遭受挫折,有些人马上就政治上转向。如上引翔港部委 1925 年 11 月的报告称,有些工人党员,一失业就“顿呈反动”,从而

① 《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后之工作概况》(1926 年 1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0,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8 年编印,第 92 页。

② 《上海区委通告胡字第四号》(1925 年 11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6 年编印,第 80 页。

③ 《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五十六号》(1926 年 5 月),《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六十三号》(1926 年 6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 1986 年编印,第 181、218 页。

④ 《引翔港部委关于各支部情况、群众运动及国民党工作的报告》(1926 年 10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4,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 1987 年编印,第 82—83 页。

⑤ 《闸北部委李德馨工作报告及意见书》(1926 年 3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7 年编印,第 171—172 页。

⑥ 《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十一号》(1925 年 10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 1986 年编印,第 51 页。

造成支部工作瘫痪。^①内外棉三厂的支部书记因“反动”而开除出党。^②小沙渡的党员，平时尚能信任、服从党的领导，“但在特别情形时，则半数同志恒不能免除个人利益为前提。”^③1926年9月小沙渡纱厂罢工失败后，“同志领袖，大多数都表现不好，如揩油，如要钱，甚至因要钱不遂，竟向（张）佐臣同志以报送捕房等语相恫吓。”^④还有一些党员在罢工失败后，连党的会议也不再参加了。^⑤

第二，工人群众的组织化程度过低。这也是公开斗争模式所难以避免的一个弱点。因为这时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处于公开状态的上海总工会。以总工会工作人员名义活动的职业革命家发挥了主要的组织、指挥工人的作用，他们帮助工人建立了企业工会，发展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再建立党支部。因而，这些革命家和所代表的总工会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而匆忙建立起来的企业工会及其活动分子，因为没有在斗争中发挥主要作用，很难获得工人的真正认同。结果就是，“各种工人不相信自己的工会，只相信上总”；^⑥甚至也不了解共产党与总工会的关系。用罗亦农和赵世炎的话来说，因为“上海先发（展）工运，后发（展）党，故现工人信上中（总）者多，信傅翥（按：即上海区委，此处指共产党）者少”；“大多数群众只受 C. P. 思想上的影响，而未做到组织上的影响。”^⑦

① 《引翔港部委十月份经过情形摘要》（1925年1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27—28页。

② 《小沙渡部委最近一个半月工作报告》（1926年3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240页。

③ 《上海区委召开各支联会书记会议记录》（1925年9月20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67页。

④ 《小沙渡日厂罢工的经过与教训》（1926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58页。

⑤ 《王炎夏同志关于小沙渡九月份罢工后的情况报告》（1926年10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260页。

⑥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1月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91页。

⑦ 赵世炎：《组织问题与支部工作》（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89页；《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4月24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2，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37页。

至于企业内部的党组织,则因处在秘密状态或力量过于单薄,更很少能在斗争中发挥主要的作用,远未成为群众斗争真正的政治核心和领导者,在群众中的影响远远小于工会。如引翔港地区有 11 个工厂支部,在群众斗争中,仅 3 个能指挥群众,其余的均“仅可说是个人的努力而非党的活动”。^①1925 年 11 月,上海区委决定改组上海总工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工会与党的关系过于松散,即在各地的党、团机构和工会机构,“名义上是脉络相通,实际差不多完全各管各事,不相统率。这样各不相谋已成了鼎足之势的三个对立机关,殊失了以党的组织为职工运动之骨干的意义。”^②这个批评是否公允,当然可以讨论,但这时工人运动的中心是工会而不是党组织,殆无疑义。

(二) 探索秘密斗争模式

为了使党在总工会不能公开活动的情况下也能切实掌握对于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心探索出一种新的群众工作方式。1925 年 10 月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对局势进行了分析。会议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确定:“首要努力的是工会之发展及巩固,并力争工会公开之自由”,“但同时必须做长时期的秘密组织之准备,决不可因一时的得着公开之自由,便忽略了秘密的训练及秘密的组织”;并且,今后要加强工会领导的经济斗争,“即在政治争斗中亦不可忘了经济的要求,因为只有经济争斗的奋进,才能增长政治争斗的力量。”^③此后,在群众中开展秘密活动,发动经济斗争以积聚力量,就成为五卅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方针。

1.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鉴于五卅运动后期出现的基层工会和基层党组织力量薄弱、缺乏

① 《引翔港部委关于过去三个月工作的批评与今后工作计划》(1926 年 1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7 年编印,第 57 页。

② 《上海区委通告胡字第四号》(1925 年 11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6 年编印,第 80 页。

③ 《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第 484 页。

战斗力的问题，党的领导机关首先做出了上海加快发展党员、增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决定。

首先是加快党员发展的速度。1925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第53号通告，把入党介绍人须有半年以上党龄的正式党员两名改为：介绍人中的一名为正式党员，无党龄限制；经过五卅运动锻炼的候补党员，应尽量缩短候补期。^①同年10月的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又正式决定：党员的候补期，从党章规定的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缩短到工人农民1个月，知识分子3个月；这次会议并对坚持较高入党标准的做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主张党员数量上的发展，当以党的内部教育能力为限”是一种“错误观念”，是“党的群众化之唯一障碍。”^②上海区委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提出：“产业工人乃是天然的同学（指党员——作者注），只要有阶级觉悟及诚实，便可加入，认识主义程度如何，能力如何，原可都不必计及之。”^③并多次发出加快党员发展工作的指令，甚至硬性规定每个党员发展新党员的数量。如1925年10月，指标为每个党员至少发展工人5名以上或知识分子2名以上。^④1926年5月，指标为每个党员发展2名，与群众接触较多的党员，则须发展4名以上。^⑤

发展党员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举办工人学校及密切的个人接触、考察，吸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如共产党员李士林、洪继贤等先后在南市的沪军营华商电气公司职工居住区和陆家浜中华职业学校开办了工人夜校，其中的华商电气公司职工颜梦屏、周云江、宋凤祥等先后被发展

① 《中央通告第五十三号》（1925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50页。

② 《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74页。

③ 《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十一号》（1925年10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52页。

④ 《上海区委组织部信第六号》，《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60页。

⑤ 《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六号》，《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92页。

入党,颜等又进一步发展了数名同公司的夜校同学入党,于1926年建立了中共华商电气公司第一届支部。^①共产党员王警东等在张华浜吴淞机厂工人居住区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工人积极分子孙津川被王等发展入党,随即建立了上海第一个铁路党支部。^②江南造船厂的学徒工宣祥生在五卅运动中表现积极,在另一个工厂工作的共产党员杨师傅经人介绍与之相识,经常谈话,然后就让宣填表入党。杨随后又在宣的介绍下,发展了二十多个学徒工入团。^③

经过努力,上海的党员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1926年7月,上海区有党员2241人,其中上海本地2163人;共有党支部112个。^④11月,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进一步号召,中国共产党要成为“群众的政党”,目前的第一重要问题,就是“党员数量上的增加”,目标是在翌年春的五大召开以前,使党员数量达到4万人以上,其中上海区要发展到7000人。区委在讨论了陈独秀的要求后认为,上海完全可达到新增10500人的目标,其中上海本地新增7500人,苏浙皖新增3000人。^⑤这个指标后来超额实现了,尽管其中可能含有水分或基础并不牢固。1927年1月,上海区的党员总数为5157人,其中上海本地为3630人;支部数则达到272个,其中142个在上海;^⑥20%的支部能很好地发挥作用,50%能正常开会。^⑦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本地的党员达到14000人左右,支部180个;四一二政变后,最初仍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华商电气公司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6—37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铁路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61—62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80—87页。

④ 《沪区本埠党员变迁统计表》(1926年10月5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573页。

⑤ 《上海区委关于扩大组织的计划》(1926年12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77—79、82页。

⑥ 《上海区委关于全区支部、党员、工作人员统计表》(1927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643、646页。

⑦ 《中共江浙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赵士炎关于党务报告》(1927年2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7,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110页。

有6 000—7 000名党员，支部160余个。^①

其次是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区委根据“支部组织不好，则吾校组织即呈涣散现象”^②的新认识，发出了加强基层支部建设的一系列的指示。主要内容是：

第一，整顿组织，建立支部工作的规范。要求各支部负责人向上级报告所属党员的政治表现及支部名单、党员检查表、每月统计表等，并严格实行以单个工厂、学校、机关为单位建立支部，不准建立联合支部，理由是“以一个工厂为单位，它的中心自然集中在本厂的活动及发展组织。”^③规定每个支部每周开例会一次，向区委组织部书面报告一次。^④并要严格党费的征收。区委的一份通告声称：如果连党员的党费也不能收，“其组织之腐败可想而知”。^⑤

第二，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与培训。要求各支部“厉行教育及训练工作，多开会议，尤其是同志间的相互批评”。^⑥区委开办了培训干部的党校、各部委高级训练班，培训课程中，就有“支部的重要与工作”的内容；还要求各部委开办为期5周、每周1次的支部训练班，并规定了培训的内容。^⑦

第三，建立指导员制度。即各部委、地方必须向各支部委派一名有

① 《江苏省委组织问题决议案草案》(1929年2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546页；《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7年4月20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6，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550页。

② 《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三十五号》(1926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25页。

③ 《上海区委组织部关于中心工作和组织训练班及群运指导工作计划》(1925年10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39页。

④ 《上海区委组织部信第一号》(1925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8页。

⑤ 《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十一号》(1925年10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54页。

⑥ 《上海区委关于上海总工会遭封事件的宣传大纲》(1925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8页。

⑦ 《上海区委党校及各部委高级训练班课程表》(1925年12月)、《上海区委支部训练班课程内容》(1926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12、118页。

经验的党员,对支部发展党员及开展党的政治工作进行就近指导。^①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看,这些指示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从1925年9月到1926年5月,上海区委召开了13次听取各部委有关基层支部情况汇报的会议,区委领导并对各部委的支部工作进行了专门检查。许多部委递交了所属支部建设的详细报告。如引翔港部委列举了所属11个支部的情况,6个支部做到每周开会,至少有五分之四的党员到会,只有2个支部从不开会;^②浦东的11个支部,只有2个从不开会,有6个可以指挥群众,只有2个不起作用。^③

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以后,在“一切工作归支部”口号的指导下,上海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上海地区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奠定了强大的组织基础。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得到了明显的巩固。1926年9月,因小沙渡纱厂罢工的失败,上海减少工人党员七百多人,几乎占党员数的三分之一,其中的三百余人还是工厂的支部书记或工会领袖,但是,上海党支部数量却没有减少,仍为113个。^④这足以说明支部已有了比较巩固的基础。因而,中国共产党很快恢复了元气,并组织了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

其次,试行党内民主的工作逐步展开。中共上海区委认为,实行党内民主,是克服工作困难的最紧要方法。因为,一是这可以让有才能的群众领袖获得参与工作的机会,以培养出许多干部人才;二是党的工作不是少数人的行动,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立党的巩固基础;三是如果所有的真正群众领袖,都能成为党的干部,党的力量自然能深入群众。

① 《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十一号》(1925年10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53页。

② 《引翔港部委关于过去三个月工作的批评与今后工作计划》(1926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57页。

③ 《浦东部委关于一月份工作情况及要求充实力量的报告》(1926年2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454页。

④ 《上海区委关于部委、独支、支部及党员等情况统计表》(1926年10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573页;《中央局报告》(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7页。

因而，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后不久，上海区委就开始全面推行各支部干事会的选举，“意在使所有同志对支部干事会负绝对的责任。”试行的结果是，“不但毫无流弊发现，且已收到相当的成效”。两个月后，区委又决定试行各部委委员的选举，同样“改选结果，非常良好，各部委委员，工人同志占百分之八十”。区委再进而准备进行区委执行委员的选举。^①应当指出，这里所称赞的工人比例高，并不是简单的成分论，而应该主要指工人领袖担任了干部，可以带动更多的群众。

第三，支部的活动日益活跃。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1926年底也对组织建设工作表示乐观：“各级党部都很活动，各种工作都有发展，党员增加，每星期平均约八十人”；尽管罗亦农一贯要求严格，仍认为各支部的工作不够理想，如“二千四百同志中至少不过四百余同志负责工作，大部分尚未积极参加，”“投机分子的混入与原有党员投机心理之高涨”等，^②但中共中央对上海的工作显然表示满意。同年12月的中央局报告即指出：“‘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沪区已在党内宣传甚久。”^③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后，罗亦农为首的上海区委仍继续要求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过，因此时上海的党所面临的是即将夺取政权的形势，区委所强调的，已不再是支部按时交纳党费、按时开会之类的常规内容了，而是提出了无限制地扩大党的组织、每天要开支部会等新的要求，强调党员必须绝对接受支部、部委的指挥，并要求赶造本区全体党员的详细名册，以便区委掌握每个党员的工作能力。^④

① 罗亦农：《最近政治党务的概况及今后上海工作进行之方针》（1926年12月），《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一〇三号》（1927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121—122、141—142页。

② 罗亦农：《最近政治党务的概况及今后上海工作进行之方针》（1926年12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121—122页。

③ 《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08页。

④ 《上海区委每日通讯第四号》（1927年3月），《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六号（组字第二号）》（1927年3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253、285页；《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7年3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344页。

2. 开展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

在五卅运动中,工人群众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动员,但他们所参加的斗争,主题却是政治,而与其切身利益并不直接关联。而斗争的结果,虽然使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总体上有了提高,工人也看到了自己组织起来以后所拥有的力量,但他们的切身经济利益,却并未因此而获得增加。尤其在总工会被查封后,许多企业订立的复工协议,使工人几乎没有获得经济利益,有些企业的资方还开始了反攻倒算。因此,通过斗争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成为广大工人群众的迫切愿望。

群众的这一情绪,实际上在五卅运动后期就出现了。就在总工会开始收缩政治性罢工、组织复工谈判的时候,一些没有参加政治大罢工的中国企业职工发起了争取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8月17日,上海邮务工人首先开展经济罢工。接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职工,也相继开展经济罢工。由于这些罢工都获得了总工会的支持,也都取得了胜利。如由共产党员陈云等出面发起的商务印书馆罢工,资方最初拒绝接受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等条件,商务的工会即“函请”总工会、总商会等援助,总工会立即出面组织了“商务印书馆罢工后援会”,上海学联并威胁说,如资方不接受工人要求,将号召全国停止使用商务的教科书,资方被迫屈服。^①

1925年10月中央扩大会议以后,共产党人通过转入地下的各级工会,进一步加强对工人经济斗争的发动与领导,直接的目的就是:“保存上海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永久之信仰,使工人群众对上海总工会不失望。”^②具体的策略则为:一是在因工会被禁止而不能举行罢工的企业,发动怠工斗争;二是不提出过高的要求,以使工人易于获得胜利;三是利用灰色团体组织群众;四是积极选拔和培养“工人中之有能力者”,吸收他们参加工会的工作,使之成为“工人群众中之下级领袖”。^③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上海店员和职工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102页。

^② 《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后之工作概况》(1926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8年编印,第112页。

^③ 《上海总工会最近三月内经常工作之计划》(1926年1月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8年编印,第80—88页。

区委特别强调，各党支部必须切实掌握周围群众“实际生活中所感受的苦痛，并加以评判，以引起群众对我的同情与了解，乐于与我接近，愿意受我领导，但不要为空洞过激的言论，致群众与我离开，失其宣传的效用，”要经常“和非同志作切身问题的讨论，参加或发起各种灰色的运动。”^①为了帮助各支部组织群众，上海总工会还建立了特派员（亦称组织员）制度，由各个产业工会派出一批职业革命家以特派员的名义，前往各工人区域指导工作。

总工会被封以后，共产党人在各企业普遍发动了经济斗争。“总工政策之执行者，计有小沙渡之内外棉七厂、四厂、十二厂、日华、同兴、东亚麻袋等工厂，各厂总工之次数，约均在一次至五次，所得的结果亦均甚为完满，如已能使厂主不再开除工人，发补助金，增加十分之一的工资等”，“曹家渡之公益及杨树浦之恒丰等，先后均有总工事件之发生，亦均得到相当之结果；”日华厂的总工曾引起资方的武力镇压，结果工人反而在总工会的支持下奋起罢工，最后获得胜利。这时，随着总工会自动地启封，工人的斗争情绪又趋于高涨，因而，上海纱厂、怡和纱厂、东方纱厂、商务印书馆、内外棉三厂的工人为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相继获得胜利。当然，也有一些罢工遭到了失败。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经济斗争卓有成效。据总工会统计，在1925年10月到12月间，6个工厂的13900余名工人参加了经济罢工，获得胜利者4个厂，工人11600人，占85%，实行总工的有27个厂，工人6万余人。^②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也非常注意维护被开除的工人活动分子的生计。1925年底，上海约有2700余名被厂方开除的失业工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通告称：“这2000余失业工人，都是工人阶级中的热心分子……自失业以后，饥寒交迫，困苦万状，急待救济，望各地工会量力捐助，以尽同一阶级共同互助之谊。”随后，上海总工会专门组织

^① 《上海总工会最近三月内经常工作之计划》（1926年1月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8年编印，第80—88页。

^② 《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六十三号》（1926年6月2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15页。

了五卅失业工人维持会,举办了救济五卅失业工人运动周。^①

在一些工会不能公开活动的企业中,共产党人开始尝试在工人群众中建立秘密组织,以继续把群众掌握在自己手中。如引翔港部委认为,裕丰纱厂的工人“本他们遗传的领袖观念”所建立起的弟兄团之类的灰色组织,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组织形式,要求所属的各厂支部普遍推广。^②曹家渡一带的工厂,“因政治压迫,使工人闻工会之名而害怕,(工会)已无公开活动之余地”,当地的共产党人遂“极力从事秘密组织”,有的叫职工同乐社,有的叫弟兄会;^③还采取了支持工头出面组织工会的策略,即“叫同志在厂中公开的宣传工头出来组织工会,一方表示谢意,一方表示我们自己更应该出来组织帮忙。……我们要他们允许我们组织群众,这种允许自然要看我们的手段如何,我们总有一天充实我们的力量——各间干事会和各间代表,把依附在腥臭上的苍蝇拍灭。”^④

事实证明,这种灰色的组织有时确实有强大的凝聚力。如同兴纱厂有党团员八十余人,所建立的弟兄团“组织力量尚大”,“能博得群众的信仰并能抓住群众”。裕丰纱厂有党员 30 人,“已组织的弟兄团亦很得力。”^⑤曹家渡的喜和纱厂,3 名共产党员分别建立了 3 个秘密的弟兄团,崇信厂亦有党员组织的弟兄团数十人。^⑥公益纱厂的工会表面上由工头把持,但基层的干事会和工人代表却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因而,该厂的工人实际上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⑦从这一时期的一份调查表

①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3—274 页。

② 《引翔港部委十月份经过情形摘要》(1925 年 11 月 18 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7 年编印,第 28 页。

③ 《曹家渡部委报告》(第一号)(1926 年 1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7 年编印,第 292 页。

④ 《曹家渡部委十二月份工作报告》(192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7 年编印,第 330 页。

⑤ 《引翔港部委关于办事处取消后对各工厂的工作方针》(1925 年 12 月 11 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7 年编印,第 41 页。

⑥ 《曹家渡部委报告》(第一号)(1926 年 1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7 年编印,第 292—293 页。

⑦ 《曹家渡部委十二月份工作报告》(192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7 年编印,第 332 页。

来看，兄弟团之类的灰色组织一般均规模很小，但往往能影响多数群众。如吴淞铁路有个60人的“同盟会”组织，所能影响的群众为800人，统益纱厂有50人的“互相会”，能影响全厂4400名职工。^①

然而，总体来看，这种扎根于企业的灰色的工人组织并不普遍。而且，在统治当局和资方对工人运动采取严厉镇压政策的情况下，他们所开展的经济斗争一旦失败，必然会导致表现积极的共产党员或工人活动分子被资方开除，从而使党丧失政治影响。如引翔港的上海纱厂，曾组织起了“坚固的”弟兄团，但一次斗争失败，就“精华丧失殆尽，原有组织消灭”，“同学都被开除，支部已无形消灭”。^②喜和纱厂和中华书局，均“因罢工不成与罢工失败的关系，致使支部根本改组，未及恢复。”^③

在许多情况下，工人中的党员尚不能有效地掌握群众。大量的经济斗争，仍是由工会“组织员”从“外部”鼓动起来的。从当时上海各地党组织的会议记录或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多基层支部并不直接从事职工运动。在组织工会或发动经济斗争方面，组织员往往起着主要的作用。引翔港部委1926年3月的一份工作报告即认为，当地职工运动“太糟糕”，主要原因是“负组织工会的责任者没有注意工会的基本组织，培养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领袖”，同时，“上总没有得力的负责人派来，形成主观力量不足”^④。浦东部委报告说，祥生铁厂工会不起作用，工人在一天天消沉下去，根本原因就是“工会组织员一点用处没有，假使上总再不派一得力的组织员来整理工会组织，恐再过一、二月，要消灭了”。^⑤曹家渡部委则声称：上总派来的做职工运动的人，“不但不

^① 《上海总工会工会组织调查表》(1926年)，《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8年编印，第231页。

^② 《引翔港部委二月十五日至三月三十日的工作报告及今后工作计划》(1926年3月30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74—75页。

^③ 《曹家渡部委关于支部情况的报告》(1926年9月29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307页。

^④ 《引翔港部委二月十五日至三月三十日的工作报告及今后工作计划》(1926年3月30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73页。

^⑤ 《浦东部委关于地区政治经济概况及最近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26年4月2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463页。

能应付问题,连参加一个公开会议鼓动群众的能力都没有……倘有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同志来负责职工运动,我们的职工有恢复五卅时的希望。”^①

正是由于还没有能在工人中建立坚强的群众组织,许多经济斗争因缺乏有力的群众基础而遭到失败。

1926年夏,内外棉三厂、四厂的工人为反对工头诬陷和浦东日华纱厂工人为改善待遇而发动的罢工,虽然都坚持了三十余日,均告失败。8月,上海区委又为抗议日本水手杀害小贩陈阿堂,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日商纱厂总同盟罢工,结果遭到惨重失败,大批党员和工会活动分子被开除出厂。上海的党员人数从7月的2163人,骤降到9月的1395人。^②从区委对这次斗争的全面总结来看,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显然就是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即第一,工人群众对于这次政治性罢工,没有热情。“政治的口号,渐渐失去作用……工人亦多莫明(名)其妙”,“一般群众空气很消沉”。第二,群众缺乏有力的组织。罢工酝酿期间,许多工人领袖热情高涨,“都说非罢工不可”,而实际情况却是:“他们有时虽可号召群众,但到紧急时候,就没有一点力量”,“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简直是原始时代的状况,连宗法社会的首领与其部下的关系都没有,连哥老会、青洪帮都不如”。如在组织工人纠察队时,“那些担任队长的,就虚开名单,预备揩油,结果弄得一塌糊涂。所谓纠察队,一点不起作用”,甚至有些党员群众领袖也表现恶劣,“如揩油,如要钱,甚至因要钱不遂,竟向佐臣同志以报送巡捕房等语相恫吓”^③。

显然,通过经济斗争来建立坚实的群众基础,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很难一蹴而就。正是基于这些失败的教训,中共上海区委进一步认识到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的重要性。在有关日商纱厂同盟罢工失败

^① 《曹家渡部委十一月份工作报告》(1926年12月5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319页。

^② 《沪区本埠支部变迁统计表》(1926年10月5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573页。

^③ 《小沙渡日厂罢工的经过与教训》(1926年9月20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52—358页。

的总结报告中，上海区委再次强调了基层支部工作的意义，要求“尽量整顿”支部，“使支部真能负起群众核心的使命，无论什么问题，都要经过支部讨论，无论什么决定的政策，都要在支部中报告，由支部直接在群众中起作用。”^①也正是出于充分发挥支部作用的考虑，上海区委从1926年10月开始，逐渐取消了工会组织员制度，规定“在已成立工会处，应即取消组织员，而代之以工会之正式委员或职员。”^②

3. 以上海自治为中心的政治斗争

在领导群众开展经济斗争、探索秘密斗争模式的同时，上海区委始终没有放弃开展政治斗争，并通过公开的政治斗争来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的努力。

一方面，在当时的共产党人心中，开展以工人为主体的公开的政治斗争，以此推动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发展，乃至最后夺取政权，实际上是党的根本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的工人经济斗争，仅仅是党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积聚政治能量、实现政治使命的手段。

另一方面，五卅运动的经验也确实表明，公开的政治斗争能相当有效地激励大批群众，从而迅速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因此，争取上海总工会重新获得公开活动的舞台，以重新获得进行公开斗争的条件，也一直是上海区委努力追求的目标。

1925年10月，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孙传芳迅速击败奉军，入据上海。共产党人即利用这一政局变动的机会，发起反对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的群众运动，并提出了启封上海总工会的要求。12月6日，共产党人以上海总工会等团体的名义，在闸北召开5万人“上海市民反段大会”，宣布自动启封总工会。这时，刚刚入据上海的孙传芳当局，由于尚未站稳脚跟，慑于群众声势，不敢坚决镇压。上海总工会获得了宝贵的公开活动机会，再次成为广大工人群众心目中的保护神。上海迅速出现了一波新的罢浪潮。

^① 《小沙渡日厂罢工的经过与教训》（1926年9月20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64页。

^② 《小沙渡日厂罢工的经过与教训》（1926年9月20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52—358页。

从1926年初到5月底,25个纱厂的26000多名工人参加了25次大小罢工。^①接着,一些缫丝厂的工人在自发开展的经济斗争中建立了罢工委员会,主动要求上海总工会予以援助。当警方要求工人派出代表时,工人宣称:“我们没有代表,只有总工会才能代表我们。”上海总工会即派杨之华前往指导,很快取得了胜利。随后,又有几十家丝厂的数万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同盟罢工,均在总工会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纱厂的罢工也于此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仅6月份,就发生了14厂次的罢工,参加者达1.5万人。^②

与此同时,工人的政治热情也在不断高涨。1926年5月下旬,共产党人在上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五卅周年纪念运动。数万工人按照总工会的命令停工两天,并在5月30日举行了6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和游行。接着,全市各行业的罢工风起云涌,仅6月份就发生大小罢工35次,参加者近7万人。^③这时,孙传芳终于无法容忍,于1926年6月27日再次查封了总工会。

接着,上海区委选择了一条新的政治斗争路径。

1926年6月22日,上海区委发出第64号通告《地方政治工作的意义与作用》。在这份文件中,区委明确提出:“过去我们的工作,太偏于大的国家政治方面,以致所做工作,很少得到切实的效果,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党所在的四周围社会状态的变动,各种群众的心理,很少有明确的了解与认识,不能把我们的活动,和社会发生密切的关系。同时使我们大部分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感觉着党与他实际所处的社会环境无甚关系,所做的工作都太高远,不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甚至烦厌起来,或竟对党淡漠了。这都是我们不知道好好注意地方政治,不能领导同志及其他群众为他切身所处的实际生活的问题而活动而奋斗所产生下来的恶果。”因此,“以后我们要开始做许多很切实的很具体的地方政治工作,帮助群众向其四周围的直接压迫者奋斗,并指导他们以各种奋斗的方法,

①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126页。

③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89页。

使他们对我发生信仰，并且乐于与我合作，情愿受我指挥，这才算把我们党的力量真真(正)深入了群众，同时也就获得了大多数群众。”^①同年7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充分肯定了上海区委的这一新的战略，并要求上海区委“须提出上海市民的总要求，即上海市民运动的政纲，使上海一般市民不认为我们是洪水猛兽，而认为我们是工人和被压迫民众的利益的代表者。并依此政纲的意义建立革命民众的联合战线。”^②

1926年7月，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北伐战争。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上海各阶层群众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热情再次高涨起来。上海区委巧妙地利用了资产阶级人士对“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之类口号的好感，提出了“建立上海人民自治的上海”这一公开的政治口号，积极推动以此为中心、旨在联合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层群众参加的反对军阀统治的市民运动。根据上海区委制定的《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市民运动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的自治市政府。在这样政权之下，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只有工会组织事实上的存在，一般市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相当自由以及反抗租界帝国主义之根据地这三件事。”^③

为了推动革命形势，上海区委决定联合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推翻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抽调工人骨干，迅速组织起一支秘密的工人纠察队，并在北伐军兵锋逼近上海的1926年10月23日，发动了旨在驱逐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尽管因为准备不够充分和盟友国民党人的临阵退缩，这次带有浓厚军事密谋色彩的起义遭到了失败。原定出动350人的工人纠察队，结果出动了200人，而号称有千人武装的国民党人，只出动了百余人。^④

但是，这次同国民党人和资产阶级的合作，却使上海总工会重新获

① 《今后上海职工运动的改进计划》(1926年10月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85页。

② 《中央扩大会议关于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05页。

③ 《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1926年10月1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408页。

④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和较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虽因起义失败、十余人的被捕牺牲,部分工人群众出现了短暂的恐惧、消沉情绪,但经过共产党人及时的宣传鼓动,群众还是很快就恢复了信心。而且,随着北伐军的捷报频传,他们的政治热情开始不断地高涨。在11月上旬的上海区委会议上,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就非常自信地通报说:工人群众对于起义的失败,“大部分不甚明了,一小部当时稍觉失望,现在经过解释,已不成问题。九江失守消息传到,负责同志又躁作起来。一般工人群众因九江久不下很气愤,如果九江一下,气焰必可大高。”据他估计,这时全市所能动员的工人,已达5万至7万人。^①也正是鉴于工人群众政治热情的不断提高,上海区委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今后“不客气的以工人为事实上的暴动领导者,去领导国民党资产阶级起来革命”,“这次不是军事投机,而是民众暴动”,暴动将“以工人为主,民众起来参加”。^②

为了创造第二次武装起义所必需的气氛,上海区委决定开展大规模的街头宣传活动,即“1. 发传单,组织队伍去散发;2. 召集许多会议,尤其是工人群众中大大的宣传与煽动;3. 民校(即国民党——作者注)群众组织讲演队开始与市民讲演。”^③按照这项决定,5天内有上千人上街宣传,散发传单70万份。尽管军阀当局进行了镇压,几天内就逮捕了八十多名宣传者,其中党员五十余人,^④群众的情绪却仍不断高昂。上海区委预计所能动员的工人数量,也随之不断增长。到11月11日,汪寿华已估计最少能发动6万工人参加政治罢工,另外还有4万码头工人和5万手工业工人;^⑤企业中的工人运动也在此时出现了

① 《上海区委主席团特别会议记录》(1926年11月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262、268页。

② 《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1月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277、281页。

③ 《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1月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277、282页。

④ 《上海区委关于上海第一次武装暴动的总结报告》(1926年11月24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39页。

⑤ 《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1月8日)、《上海区委主席团特别会议记录》(1926年11月1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4,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277、307页。

蓬勃兴旺的景象，所建立的工会越来越多。以致上海区委相信，能够在几个月内将上海的党员数量从1720人增加到9200人。

为了进一步激发群众的情绪，上海区委再次尝试总工会公开。11月28日，上海总工会联合商学各界，召开了一个5万人参加的“反对奉鲁军南下上海市民大会”，并于11月30日公开登报声明：“以近来上海自治运动日益热烈，有公开办公与各方接洽之必要”，宣布在闸北景云里14号办公，并要求“所属各工会于5日内一律公开会所，从事办公。”^①军阀当局最初反应迟钝，未予制止，工人群众则备受鼓舞；前往祝贺者络绎不绝。“且有不少新的工会组织而加入上总，如手工业、水木作会等，南洋烟草公司职工联合会也想来加入。”总工会并决定了公开后的工作方针为：提出新的工人待遇总要求，设法在基层制造连续不断的小工潮，使总工会处在调解的地位。^②12月8日，军阀当局再次查封总工会，但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工人群众立即再次予以自动启封，将办公地迁到虬江路的印刷工会内。这次行动，也得到了一些资产阶级人士的支持。如“市民公会王汉良、邬志豪等都说我们承认上总，你们自可自由启封。”^③

总工会的再次公开，显然是共产党人获得的一个巨大胜利。因为随后就重现了五卅式的工人运动高潮。即：工人在共产党人的鼓动下，不断提出经济方面的要求，总工会则主动出面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由于总工会的巨大威望，谈判的结果总是工人获得某种收获；在工人兴高采烈欢呼胜利时，共产党人建立了工会或党的支部。如12月18日，上海三千多估衣业店员罢工，要求改善待遇。资方只得请邬志豪出面与总工会谈判；邬用汽车把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请去，要汪“帮忙”，最后接受了增加工资等多项条件，劳资双方代表和邬、汪都在协议上签字；在工人燃放鞭炮庆祝胜利时，17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1日，法商电

① 《申报》1926年11月30日。

② 《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26年12月7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5，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34、36页。

③ 《上海区委召开母校党团扩大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5，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59页。

车公司工人罢工,提出增加工资和不准虐待等 12 项条件。法租界警方要求杜月笙进行调停,杜亦请汪寿华出面,接受了工人的部分要求;而直到这时,连汪寿华都不知道谁是法电工人的领袖;但仍有十余人被发展入党。^①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在 12 月 25 日兴奋地写道:“工人运动目前在一个很兴旺的状态中,各方面都有积极发展。过去我们只能在纱厂工人中发生影响,现在这些纱厂工人固无不积极活动,而与革命运动最有意义、最有作用的城市交通工人,也正在大大发展……许多从前在右派所影响之下的黄色工会,现都觉悟起来要求加入我们的上海总工会……愿受上总的指挥。”^②正是从这时开始,上海工会组织的扩张进入快车道,总工会的会员数急剧增长。据上海总工会的资料,1926 年 6 月,总工会有 4.3 万名会员,9 月为 5.2 万,1927 年 1 月为 7.6 万,而到当年 2 月,则有 28.9 万。^③

然而,政治局势推动下的工人运动,仍然无法避免一哄而起、基础不稳的弊端。由于工人群众的热情普遍高涨,工会组织员再次成为职工运动的实际中心。当时在党内就有人尖锐地批评说,现在工人运动的兴旺局面,“最大原因,是由于革命潮流的高涨,武汉工潮的推动,真正由工作能力上去发展者则很少”,“大部工人处于被动地位,多为包办形式”,“各组织员、各产总负责人都是临时哄动工作。”^④汪寿华也承认:这时“各工会真能起作用的很少。从上总起,各种工作形式完全在包办状态中,组织员包办工会,工会之盛衰完全以组织员个人为归依”。工会工作的主要缺陷是“很长期间没有造成人才”,组织员“太专制与包

①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 年 12 月 21 日、1926 年 12 月 24 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 年 12 月 25 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 5,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90 年编印,第 127、150、160 页。

② 罗亦农:《最近政治党务的概况及今后上海工作进行之方针》(1926 年 12 月 25 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2,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7 年编印,第 118—119 页。

③ 《上海总工会呈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报告书》(1927 年 6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0,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8 年编印,第 363 页。

④ 《上海总工会陈之一对于沪区职工运动的意见》(1926 年 12 月 22 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0,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88 年编印,第 222 页;《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各工运负责同志会议记录》(1926 年 12 月 31 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 5,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 1990 年编印,第 199—200 页。

办”，由此必然导致工会工作“不能群众化”，“不能造成工人领袖。”^①组织员虽然是领取津贴的“职业革命家”，但本身素质也良莠不齐，不少是所谓的“学生派”，真正工人出身的不多，因而组织员“很少能与非同志的工人接近”，“没有好好注意工人实际生活”，或者“包而不办”；有的组织员“能力薄弱”，甚至有“雇佣劳动化”的倾向。^②

而且，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这一时期的许多共产党人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暴力威慑手段，即用武力对付阻碍工人行动的封建把头或其他政治力量的工运分子——“工贼”、“流氓”、“走狗”。如邮务方面的共产党人，为了打开工作局面，“要求打走狗”；法商电车公司“发展同志很困难，现决定打走狗。”由于这时武装的工人纠察队（1927年1月31日统一称为“武装工人”，以区别于罢工期间的临时纠察队）已经有相当规模，有些暴力行动已相当于暗杀了。如小沙渡部委在1月27日报告：“昨晚又打一走狗，中两枪，尚未死。……大走狗均躲避了，余均极恐慌”。南市部委决定：“已预备打两个走狗。”^③应该承认，在工人运动初期，这种手段往往是相当有效的，因为它能迅速地解除群众对于封建势力的恐惧心理，鼓舞他们的斗志，并对异己势力造成威慑。上海区委对于这种做法，基本是肯定的，但也有一定的节制，即需要上级的批准，不是基层人员想打就打。在一次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汪寿华就直言不讳：“因为前次打了几个工人，所以流氓等都屈服，厂中各事都找工会解决。”^④但到1927年1月时，暴力威慑有越演越烈的趋势，甚至“各方面都来要求打人”，区委才开始略感不安。罗亦农批评说：很多部委来要求打走狗，“这是很错的。我们要首先有群众激烈的气概，然后可以偶

① 《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12月28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各工运负责同志会议记录》（1926年12月3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5，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172、197页。

② 《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各工运负责同志会议记录》（1926年12月3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5，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199—203页。

③ 《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5，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411、429页，第446—447页。

④ 《中央、上海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1月10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5，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330页。

一做打的工作。”罗解释说,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市民越来越感到恐惧,工人中频繁的暴力活动,将使党处在孤立状态。但尽管如此,罗仍同意对小沙渡地区一贯用暴力压迫工人的日本纱厂“走狗”采取激烈行动,称“我们对于法西斯特要格杀勿论。”^①

毫无疑问,采取这种一哄而起加暴力威胁方式所鼓动起来的群众,肯定缺乏足够的组织基础。还在1926年底,上海区委就已经清醒地预计到:上海资产阶级将会联合蒋介石压迫共产党,共产党人唯一的对抗手段就是“大大的发展工农组织”。^②上海区委意识到,工人运动组织基础薄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反复强调要加强对工人的组织,但直到四一二政变发生,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1927年2月中旬,北伐军逼近上海。中共上海区委在2月16日的全体会议上做出了先举行总罢工,然后举行第二次工人暴动的决定。2月18日,上海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通告,明确这次罢工的目的是“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而取得上海……全系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斗争”,“我们的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故工人在行动中“绝对不能有经济要求之提出。”^③然而,仍有部分企业的工人趁机提出了经济方面的要求,以致在起义失败后上海区委要求工人结束政治罢工时,一些工人还“不情愿复工”。^④

上海总工会的命令再次被证明极其有效。36万以上的上海工人参加了政治大罢工。虽然随后举行的第二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但历时5天的政治大罢工已充分显示了这时共产党在上海工人群众中巨大的威望和动员能力。如上海区委在《告同志书》所指出的:“这五天的总同盟罢工之影响是极大的,这是上海工人阶级自五卅以来第一次表现其伟大的革命势力……五卅时工人的势力还是从普遍的革命的狂热中

① 《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7年1月22日)、《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记录》(1927年1月25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5,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430、433—435、439页。

② 《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记录》(1926年12月16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5,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90年编印,第82、137页。

③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④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表现出来的，而这次乃是在一个指挥之下有计划的表现出来的。……军阀及一切反动派自然对我们的势力望而生畏，一般资产阶级中人也绝不能不看重我们的势力。”^①

起义失败后，为了继续激励工人的政治勇气，上海区委决定加紧实行“红色恐怖”，要求每个部委“设法打死一个两个走狗”，并对失业工人进行救济，还明确规定给每个工会领袖与重要分子每天发给6毛钱。^②实际上，尽管统治当局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不断有工人活动分子被捕、被害，一些工会组织遭到破坏，共产党人在上海工人群众中的政治威望却基本没有受到损害。这与整个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一定关系。从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在1927年2月底3月初的汇报来看，绝大多数行业的工人继续保持着对总工会的高度忠诚，如“海员工会非常信仰上总，申明以后接受上总命令……印（刷）总（工）会下各工会无甚损失，大家只觉罢工太早了一点，并不认为失败。……南洋华商烟草公司可单独成立工会，对上总更加信仰，虽然昨天工会被搜查。”^③有些行业的工人，还表现出了更强烈的战斗性，即“时常因政治的刺激，自动的要求罢工”，“除店员及英界电车，余都不生问题，一定可以接受上总命令而行动。”^④

上海区委审时度势，迅即做出争取各区域工会半公开地位的决定，要求各工会召开工头会议，用红色恐怖的声势震慑他们，迫使他们接受工会的命令，并普遍地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及承认工会等条件。目的就是，让工人知道，现在已经到了自己扬眉吐气的时候；在北伐军到达上海以前，就能为工人争取到这些利益，必然会使他们格外相信工会、感激工会。^⑤

到3月上旬，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运动已在整个社会中具有相当

①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页。

②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页。

③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

④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2、260页。

⑤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330页。

强大的威慑力。“资本家方面，因恐慌而对工人大半表示让步，船津（日厂代表一）亦要与工会谈判；一般走狗更加惶恐，有辞职者，有躲避者。”^①有些资本家甚至因为害怕工人的力量，还自动给工人加薪。^②

上海区委现在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上次总同盟罢工之日起，党在群众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可以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上海建立一个以共产党为后台、由工人领导的革命政权。^③

1927年3月21日中午，根据上海总工会的命令，80万工人几乎在同一时间举行了政治大罢工。一个小时以后，3000名工人纠察队员分头扑向各军事目标。经过与军阀武装近30小时的激战，在北伐军的配合下，胜利占领上海华界，创造了世界革命史上罕见的奇迹。

三、基本经验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中的群众工作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处在地下的、最初只有数百人的政党，竟然能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就把几十万过去从未得到有效组织的工人群众集合在自己的麾下，并主要以这支力量作为政治基础和军事基础，夺取了城市的政权，这足以说明其动员能力的特别强大。

从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实际历程来看，首要的经验是：党的领导机关始终能够抓住群众工作的本质——维护其切身利益。无论是采取公开的斗争模式，还是秘密的斗争模式，都把组织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作为一切工作的首要目标。强调掌握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提出符合群众心理的斗争目标，拒绝一厢情愿的空洞说教，正是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和基层党员的普遍共识。

^①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238页。

^②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页。

^③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5—297页。

群众的利益是划分层次的。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一般情况下，改善待遇，包括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反对欺压、改善工作条件等，是一切工人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而随着其觉悟程度的提高，即日益认识到工会组织与自己利益的休戚相关，争取和维护基层工会，乃至上海总工会的合法地位，也逐渐成为群众拥护的斗争目标。与此同时，上海的工人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民族尊严的维护，也是他们重要的基本利益。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政治动员的深入，由共产党通过工会组织的各种反帝爱国斗争，以及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斗争，日益被工人视为关系到自己重大利益的问题。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仍主要以公开斗争模式作为工人运动的切入点，以争取其切身经济利益作为组织动员群众的基本目标。但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多次不失时机地用符合群众觉悟程度的反帝爱国之类的政治斗争要求，借助发动大规模的政治抗议运动来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并对群众进行组织，把群众引导到政治斗争轨道上。正因为动员的目标——无论是经济要求还是政治要求，均体现了群众的基本利益，并符合他们的觉悟程度，共产党人迅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此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基础。

其次，在动员工人开展罢工斗争，特别是政治性罢工的时候，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能够切实保障他们的最低生活。这是动员能够奏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五卅运动中，工人之所以能够坚持长期罢工，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与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上海总工会能从上海总商会等资产阶级团体中筹措到必要的资金以维持工人生计有极大关系。所以，当资产阶级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停止向总工会提供资助后，罢工将被迫结束已没有任何悬念。

在此后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斗争中，向工人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也是上海总工会的基本责任。虽然这时已不能再向资产阶级筹款，但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据杨奎松的研究，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暴动经费约支出 2 470 元，实际花掉 1 789 元，余 671 元。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曾向俄国人要求援助 6 500

元,俄国人同意提供7000元;又向国民党人提出援款要求,国民党人则同意给罢工工人5000元。3月5日下午已得款1.3万元。^①

第三,初步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的秘密斗争的模式。即通过秘密工作的方式,努力吸收工人领袖、积极分子入党,广泛地建立地下的工厂支部和企业工会,然后依靠支部,也就是工人领袖与群众的固有联系,通过不断开展的经济斗争来凝聚和组织群众,以此逐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尽管在这一时期,这种秘密斗争模式尚未得到普遍的推广,成功的范例也不多,公开斗争的模式,特别是公开的政治斗争仍是发动群众的主要途径,群众更多的是信仰公开的总工会,而不是企业中的党支部或工会,但这一斗争模式的创立,却使中国共产党初步具备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继续开展有效的群众工作的能力。

从这一时期的实际工作经验来看,秘密斗争模式的成败关键,也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是党员高度的献身精神与工作能力。要党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条件下,自觉为党工作,当然首先必须具有对党高度的政治忠诚及以此为前提的献身精神。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忠诚,任何工作都无从谈起。同时,党员也必须有一定的群众威信和工作能力,能够准确地把握群众的心理和要求,从而制定可行的工作方针和目标,并通过有效的工作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许多工人党员,还不完全具备这种素质。这也是党还相当年轻、对党员的教育和训练还远远不够充分的结果。

二是基层党组织的坚强有力。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战斗力的基础。对于党的群众工作而言,它既是直接凝聚、团结群众的政治核心,又是对党员进行教育和训练的机构。没有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就不可能有秘密斗争的模式。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等党的领导机关对这个问题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措施,不仅在白色恐怖加剧期间有效地保存了党的力量

^① 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期。

和在群众中的影响，也为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传统。

三是党的领导机关能够随时根据局势和群众情绪的变化，制定正确的策略和方针。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极其严格的组织纪律的政党，下级对于上级的要求，必须坚决执行。如果上级的指示不合时宜，不符合实际，往往会对基层造成巨大的伤害。这一时期，就组织群众斗争的方针、策略而言，党的领导机关基本没有发生重大失误。在大多数情况下，领导机关对发动大规模斗争相当谨慎，而且指挥异常灵活，一旦发现斗争不利，即能及时做出退却的决定，基本没有发生过不顾群众情绪而冒险蛮干的错误。这也是这一时期群众工作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

一、历史背景

(一) 工人阶级的基本状况

1. 经济生活状况

四一二政变后,上海的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在疯狂的白色恐怖气氛中,资产阶级和统治当局乘机向工人阶级反攻倒算,工人群众在大革命时期经过斗争所获得许多实际利益,丧失殆尽。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人的工作时间普遍增加。“上海各种企业工人的工作时间,最低的普通为九时半,最高的普遍为十二小时。自来水工人和墨色印刷工人竟每日工做十八九小时的工;店员最低的普通为十一小时,最高的十五小时。”^①

第二,工人的工资普遍降低。“工人每日的工资最高的为一元,这必须是有技术的熟练工人,而普遍最低的工资仅二角;手工业工人竟有每日只得一角五分者。”^②如喜和纱厂女工“每日的工资最大的是六角至七角,最少的一角至二角;但六角的七角的是非常少数的。只有三角四角的为多数。平均起来女工的工钱不出四角。”^③

^{①②} 贫秋:《上海近日的罢工潮》,《中国工运史料》总第19期,工人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③ 阿毛:《上海女工的生活状况》,《中国工运史料》总第22期,工人出版社1982年版,第90—91页。

第三，工作强度增加。如“纱织厂每个工人由管理一架车增加到二三架，甚至四架车，即过去三四个人的工作量改为两个人，甚至一个人来承担了。”^①特别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的加重和“一二八”后上海经济形势的恶化，工人的工作强度更趋加重。

第四，工作条件恶化。“以前在吃饭时有半个小时停车，现在也取消了；车间里本来有椅子可以坐坐休息，也取消了；以前在放工前可以早停十五分钟给工人穿衣服等，现在也取消了。”“日本人办的同兴纱厂，工人的中餐是在早上上工时由家里带进厂去的，到吃的时候已经冷了，须得用热水泡过，现在日本人取消了热水的供给，只给冷水。”^②

第五，失业率提高。1929年，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对上海职工失业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统计，“仅参加各行业工会的会员失业就达10009人，占全市工会会员总数的6.45%”。同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的户口统计则为，“华界的市民总计约150万人，无职业者竟达25.7万多人。”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称：“如果再加上租界的人口，全市总人口约270万，无职业者总数当有45万人左右。”^③“30年代初，失业人口进一步膨胀，1934年，上海华界的职业人数为1961875人，其中无业者达303000人，所占比例超过15%。”^④

2. 政治权利状况

国民党上海统治当局厉行白色恐怖，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积极分子。仅从1927年4月至12月初，“上海工人在白色恐怖下面而牺牲生命的在二千以上，遭拘捕罚禁或失业的达万人。”^⑤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工人群众的政治权利甚至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工人的一言

①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414页。

② 据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9页。

③ 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上海特别市职业失业统计之试编》，《社会月刊》第1卷第8号，转引自陈文彬：《1927—1937年上海失业人群再就业情况述略》，《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④ 熊月之：《上海通史》第9卷，第140页，转引自陈文彬：《1927—1937年上海失业人群再就业情况述略》，《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⑤ 贫秋：《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与上海工人总会之内幕》，《中国工运史料》总第19期，工人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

一行,资本家,帝国主义者,军阀都可以轻轻加上‘暴徒’两字的罪名,捕去坐牢或拖去枪毙。”^①“上海警方随时进厂捕人,加上反革命或共产党的罪名,则可以随意枪毙和监禁。”国民党当局多次发布命令,颁布各种条例来对付工人运动,一度还禁止工人集会、游行、罢工。如上海卫戍司令白崇禧就曾发出布告禁止工人罢工,“倘敢聚众滋扰,无故罢工,即按军法惩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政府也曾联合发出布告,明确规定:“劳方不准有罢工怠工行为”,违者“定即严惩,不稍宽贷”^②。因而,工人群众即使普通的经济斗争,也往往会遭到血腥镇压。此外,工人参加进步组织,或创办进步报刊,收藏或阅读革命书籍均在严禁之列,甚至“赁房没有家眷者,行动慌张者,观看群众斗争及探监者,同革命战士有亲戚关系者,来往书信中有议论政治者,住宅进出无定时者,都随时有可能被拘捕,甚至不加审问,就被杀害。”^③

但是,工人参加工会的权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依然存在。

大革命以后的上海,工会是工人基本组织这一事实,得到了社会各界、包括国民党统治当局的普遍认同。国民党当局即使在严厉镇压工潮、迫害共产党人和工人活动分子的时候,也没有禁止一切工会。事实上,他们是希望通过建立官办或官方控制的工会,将工人群众、工人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这就使这一时期的工人组织情况,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态。

当时上海共有三大类工人组织:一是国民党当局主导下的“官办工会”,二是由国民党“民间人士”组织的黄色工会,第三类是共产党人领导的赤色工会。

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封闭解散进步工会,禁止工人结社集会,另一方面试图建立听命于自己的工会,以便更好地控制工人。为此,当局先后成立了“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简称“工统会”)、

① 贫秋:《上海近日的罢工潮》,《中国工运史料》总第19期,工人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页。

②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页。

③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

“上海工人总会”（简称“工总会”）、“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工整会”）等官办工会。这些官办工会的头目均由国民党当局指派，唯当局的旨意是从，实际上也不从事任何意义上的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作，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其唯一的职能就是替政府当局镇压工潮，因而，习惯上也将其称为“反动工会”。也有人认为它们根本就不是工会，而只是盗用工会名义的政府机构。1931年底建立，并在1932年获得官方认可的“上海市总工会”，则是在一批黄色工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其领导人因从事过一些工人运动，多少有一些群众基础，但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并不认真维护工人的权益，而是热衷于拉帮结派，扩张个人政治势力，因而，基本上属于御用机构，在群众中的实际影响日益减弱，后来沦落到在下层几乎没有多少群众可言，也可以说是一个官办的招牌工会。

黄色工会，主要是指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些由国民党人掌握领导权、有合法地位的工会。其中不少原系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所建立的工会，在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人篡夺了领导权才退化成黄色工会。黄色工会的领导人在政治上忠诚于国民党，但也能开展一些维护工人权益的活动，甚至发动同资方的斗争，斗争的方式则主要是请愿、请求仲裁和调停、谈判等，易于为当局所接受，往往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因而一度颇得工人群众的拥护。其中的“七大工会”即英美烟草公司工会、南洋烟草公司工会、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工会、邮务工会、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会、报界工会、华商电气工会，在1928年还曾盛极一时，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工人组织。连瞿秋白也承认说：“黄色工会或者在野政客（自然都是国民党党员），能够鼓起小小斗争，根据国民党的法律说话，甚至还请‘工友们’大家来商量表决，那是更可以利用解决目前的迫切要求。”^①但当工人的要求超出官方可以容忍的范围、程度时，黄色工会便会暴露其虚伪、御用的本质，从而失去群众的支持。1931年底，

^① 秋白：《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中国工运史料》总第21期，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7页。

以黄色工会为基础的官办工会“上海市总工会”的建立,也标志着黄色工会的结束。

赤色工会是地下党在工人群众中建立的主要组织,采取坚决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立场,政治色彩非常浓厚。赤色工会始终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和取缔。当局甚至实行过连坐法,严惩参加或接近赤色工会的工人群众,“假使有某一工人被发现了与红色工会有些关系,那末,他附近的五个乃至十个工人便须连坐,轻则开除,重则拘系、屠杀。工人在进厂时,须缴纳相片,并须有殷实的铺保和大手印。”^①因而,赤色工会只能采取非法的或地下的组织与活动形式。

3. 政治思想状况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工人的政治意识并不强,他们主要关注的,仍是待遇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如纱厂的女工多数是“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表示,但对自由解放,生活改善的主张却都表示欢迎。”^②在工人运动比较发达的邮务工人中,由于共产党人发挥过重要的领导作用,“共产党对邮工们的影响是有相当的好”,但由于白色恐怖的威胁,“邮工们纵然对于这一主义有相当的好感,但恐怖的心理也存在很深。”^③

但沉重的生活压力和政治压迫,使许多工人充满了对现状的不满。而大革命尤其是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又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因此,他们也始终保留着强烈的反抗冲动。随着国民党当局对内混战不休、对外妥协不断的面目暴露,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情绪日益增长。特别是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饱受战火的摧残,工人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了切身的体验。国耻家仇在他们的心里埋下了种子,只要有一个合适的导火索就能将之点燃引爆。

总之,悲惨的生活境况,使得大多数工人群众存在着反抗的心理。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②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12页。

③ 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472页。

他们时刻关注自身的切身利益，时刻准备着为改善生活境遇而斗争。但同时，他们又怀有害怕革命的恐惧心理，有着敢怒而不敢言的压抑和谨慎。因为稍有不慎就会遭逮捕，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因而，他们普遍害怕参加各种政治性的活动，甚至不敢接触共产党。

（二）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方针与策略的演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白区工作方针经历了曲折的演变。应该承认，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出现了严重失误，未能正确解决对开展群众工作至关重要的策略问题。其间，虽然许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领导和基层党员，力图从实际出发，采取合适的工作方法与斗争策略，但这些努力总是很快就被急进冒险的“左”的路线和策略所打断。三次“左”倾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更是深受其害，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群众力量。直到瓦窑堡会议以后，党的白区工作的路线和策略得到调整，上海的群众工作才开始转上正轨，在抗日救亡的大潮中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1. “左”倾盲动错误对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危害

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中共在“八七会议”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实现了党的方针政策的重大转折。但由于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期，还不能较为客观、理性、科学地分析自身所处的环境，采取恰当的斗争策略，加上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的情绪逐渐滋长起来，并在1927年11月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次“左”倾盲动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不顾革命处于低潮，特别是城市中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事实，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城市和农村一样时刻准备暴动。

1927年11月9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了关于上海暴动问题的第八号通告和组织全省暴动计划的紧急决议案，要求在上海“以最迅速的速度加强主观的力量（如党的组织、工会组织、军事组织），同时，变小的经济斗争为大规模的经济斗争，纱厂丝厂便须做成整个的总罢工，由这种斗争很迅速的达到波动，夺取武装、夺取政权”，中共上海各区委须立即执行这一决定，“绝对不准丝毫犹疑，凡犹疑不积极执行者，省委必决

不容惜的予以最严厉之处罚。”^①在这种情况下,11月份的沪东纱厂工人大罢工和英商电车工人总罢工都被当作暴动的好时机加以鼓动。罢工过程中,沪东纱厂资方曾表示愿意和工人方面谈判,但中共江苏省委为达到暴动目标,指示上总和沪东区委拒绝谈判,要求扩大罢工,举行总同盟罢工。当群众发动不起来时,就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派红色恐怖队员持枪冲厂,关闭机器,强制罢工。由于发动罢工的指导思想和斗争策略忽视了群众的实际利益,脱离了群众的实际要求,最终均以惨败而告终。各厂无条件复工,大批工人积极分子被开除。

在这次“左”倾盲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大革命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再度遭到巨大摧残。由于工人斗争的失败,导致党组织和赤色工会遭到严重破坏。据中共六大时的统计,全国的工会数量由734个减少到81个。上海同样如此。如沪东纱厂大罢工失败后,沪东区委所辖党组织和党员数量骤减,党支部从原先的二十多个减少到十多个,党员由四五百人减少到一百多人。英电罢工失败,直接导致五十多个工人骨干被捕。斗争的一再失败和惨重的损失,严重地挫伤了党员及工人群众的斗争积极性,“他们充满了失望和畏惧的观念,对于党及工会没有信仰,他们觉得没有前途,没有出路,总之,对于革命没有一点热情,大多数同志都无形的脱离了党,找不到,开会不到,送刊物及信亦有不肯接受者。”^②

2. 中共六大前后党的白区群众工作方针的部分调整

1927年底至1928年初,中国革命面临的严峻局面迫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重新探讨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和策略。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九次扩大会议做出《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批评了当时党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出党的政策路线应当是“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党的工作中心应该是“争取几千万的工农群众”;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应“注意加紧工农之间的群众工作,必须竭力加紧组

^① 《江苏省委通告第八号》(1927年11月9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260页。

^② 《沪东区报告》(1928年4月1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247页。

织工会的群众工作，为此目的而利用工人所谓的‘兄弟会’等等。”并且提出可以参加有群众的黄色工会。^①共产国际这些有关群众工作方针策略的指示，无疑对中共六大前后的群众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28年7月，中共六大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通过了《职工运动决议案》，对工人运动的路线、方针、任务和策略做出了新的规定。《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动员所有的无产阶级群众来围绕着他的阶级组织（党及职工会）”；要“指导无产阶级之日常经济和政治斗争，反对反动工会，组织革命工会，用宣传与煽动的方法提高广大工人群众之阶级觉悟”；同时还规定了对官办工会、黄色工会的策略：“反动工会有群众便须加入，去争取群众。”还明确要求上海地下党到上海几个黄色工会（英美烟公司工会、商务印书馆工会、邮政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等等）里去工作。《决议案》认为，党的群众工作中最危险的现象，是“‘从上面’宣布罢工，‘命令罢工’，使一部分少数积极分子抛弃工作，对于下层工人群众加一恐吓压迫等等的方法”；强调“革命工会应当领导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去团结群众”，“革命工会应当要会提出并拥护某种工人在一定时间或一定条件之下所认为比一切都迫切的经济要求”；在组织企业罢工时“须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的状况，以及自己的战斗力的程度，来提出当时工人阶级可以得着的要求。”^②这些策略方面的规定无疑是正确的。

中共江苏省委积极贯彻中共六大路线，把工作重点从组织暴动转变到争取群众、领导群众日常斗争方面。在上海，争取群众主要就是争取广大工人群众，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在发动和领导企业的日常斗争时，不拒绝合法方式，注意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一些群众迫切需要而且能够达到的要求，以求取得斗争的胜利，从而鼓舞群众的斗志。在这种策略指导下，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次数明显增多，而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8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376页。

且斗争取得胜利或部分取得胜利的比重也加大。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分析,上海 1928 年下半年共发生 187 次工人斗争,其中上总领导的为 70 次,占 37%;黄色工会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领导的为 23 次,占 12%;工人自发举行的为 90 次,占 49%;领导情况不明的为 4 次,占 2%。其中,斗争取得完全胜利和相当胜利的分别占到 25%和 19%^①。这些数据表明,地下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3.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使上海群众工作再次受挫

正当中国革命力量有所恢复之时,共产国际却对中国的革命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1929 年 10 月 26 日,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险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开展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活动,游击战争等等)。”^②在这种判断下,“左”倾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再度抬头,党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认为,“直接革命形势就是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党的斗争策略应采取“进攻路线”,“必须用群众行动政治示威去刺激群众”从而向着“总同盟罢工的方向走”^③。193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政治任务决议,进一步提出“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断定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飞速向前发展,工人罢工的浪潮的扩大,从经济斗争转变到政治斗争……从和平请愿的合法斗争的方式之下解放出来,走到直接斗争以至武装冲突,就是证明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经向着革命的高潮飞速迈进”,并进而提出:“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

^① 参见项英:《过去一年来职工运动发展的形势和目前的总任务》附表 22,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5—176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91—792 页。

^③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67—568 页。

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①

根据中央的要求，中共江苏省委开始在上海实行越来越“左”倾的工人运动策略。1930年3月5日，江苏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以政治口号组织政治罢工，同时发动一厂一业的争斗，尤其是组织同一产业，同一职业的同盟罢工”，必须“领导一切群众争斗使之汇合扩大深入而举行政治罢工，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举行兵变等，实现地方暴动。”^②3月中旬，中共江苏省委制定了上海“三八”示威走向“五一”总罢工的工作大纲，随即成立了由李立三兼书记的领导上海五一总罢工的“上海总行动委员会”，开始组织和训练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至少发展工人纠察队员650人，准备举行上海工人第四次武装暴动。

冒险主义的指导给上海的群众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片面强调群众斗争的政治性质，不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并且不考虑开展斗争的客观条件，地下党频频发动总同盟罢工、飞行聚会，结果屡屡失败，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许多共产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被杀，党及其领导的赤色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4.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群众工作中的“左”倾指导仍在继续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这次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在群众工作方面的策略进行了批评，即“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的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暴动前提的斗争”，“空喊总罢工武装暴动而忽视工厂之中日常的群众工作，和群众直接的日常要求”。但同时，会议仍声称，“只看到经济斗争而否认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联系的密切，不去努力创造总罢工武装总暴动的必要条件”是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坚持认为右倾仍是主要的危险，城市阶级斗争“正在

^①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123页。

^② 《江苏省委通告第十七号》（1930年3月5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523页。

更加剧烈和日益高涨”，因而斗争的目标仍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①在斗争策略方面，会议提出到了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要求“在一切斗争中，尤其是日常部分要求的斗争之中，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一般下层群众团结起来实行斗争，独立的去领导他们的运动，”但同时，仍应“使这些运动都走到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之下来。”^②

显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批评了先前的冒险主义，但“左”倾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的清除。在上海的群众工作实践中，政治罢工、飞行聚会、游行示威等冒险主义的斗争形式和策略方法，仍被大力提倡。如1930年10月10日，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双十节时拥护苏维埃政权运动》的号召，七千余群众在上海地下党组织下，分别在沪东、沪南、沪中、沪西、闸北、浦东等地举行游行示威，当天即有6人被捕。同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二千余工人、学生、贫民在南京路新世界举行飞行集会，高呼“建立苏维埃政权！”^③等口号，先后有9人被捕。

5.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严重危害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占据了党内的统治地位，推行更加系统的“左”倾错误。王明等认为“从全国形势一般看来，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实。”^④因而，他们断定“在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时期中，党的策略路线一般的是进攻的”，“如果谁要在现时中国形势下主张退守的策略，谁便就是公开地跑进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地反革命营垒去，谁便就是根本不配在共产党内来讨论‘路线问题’。”^⑤王明等认为，李立三的错误不是“左”，而是“形式上以‘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投降内容底路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1930年9月24—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287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1930年9月24—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③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4页。

^④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页。

^⑤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3—644页。

线”；其在城市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是，“放弃在黄色工会内作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时不去尽力巩固赤色工会。”^①因此，他们不断要求各级党组织加紧发展赤色工会和由赤色工会独立领导工人斗争。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们坚持在工人运动中采取所谓的进攻路线，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拒绝利用已有工会的合法地位进行斗争，实际上的指导方针就是：“任何工厂出现了个人的斗争，就要把它变为同盟罢工，任何经济斗争的出现，就要把它变为政治罢工，要把政治罢工变为武装工人，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排斥工运中的统一战线，把一切非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都视为敌人。”^②

上海是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深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群众工作和党的力量就此遭受到更加惨重的损失。1931年“九一八”到当年年底，上海工人斗争30次，参加人数为11602人，1932年为82次，参加人数71395人，1933年为86次，参加人数74727人，到1934年为73次，参加人数降到31023人。^③不光斗争次数和参加斗争的群众数量少，而且取得胜利斗争的次数也较少。罢工完全取得胜利的，1931年“九一八”至当年年底一次也没有，1932年仅有15次，1933年26次，1934年21次，其中，大多还是自发斗争。由于力量的消耗，最后地下党连飞行集会也组织不起来了。到1935年7月，江苏省委、上海中央局等党的主要领导机关已全部被破坏。尽管许多已失去组织联系或上级领导的党员、基层支部，仍坚持自己的信念，努力在群众中发挥影响，但上海地下党有组织的基层群众工作实际上已经停顿。

（三）上海地下党的组织演变情况

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一方面，冒险主义的错误，连续不断地导致党的有生力量遭受损失。另一方面，在发展党员时，长期采取狭隘的关门主义

①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626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7页。

③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7页。

方针,要求所有的党员必须无条件参加各种街头的公开活动,如散发传单、飞行集会之类,使得许多积极分子望而生畏。结果就是,党员队伍越来越小。虽然领导机关高度重视发展党员的工作,多次指令开展突击发展党员的活动,基层党组织却始终得不到发展。

从这一时期党员数量的下降过程中,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出这一趋势。^①

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时,上海的共产党员人数曾达到14000余人,四一二政变后,骤减至7000—8000人左右。^②1927年6月夏季大罢工失败后到“八七会议”前,党员数量进一步萎缩到1220人,党员数量9月为1182多人,11月为1500—1800人,12月为1799人。^③此后,由于受到“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上海党员的数量在1928年出现递减的态势。1928年6月,上海党员数量已不足1000人。1929年后,上海党员的数量呈起伏状态。该年3月有党员1411人,7月约为900多人,8月与9月上海的党员数量为1000人左右,10月为1100人左右,11月为1160人,12月为1179人左右。^④这时,全市的产业党支部数量为六十多个。^⑤

1930年3月,上海的共产党员数量为924人,4月为981人,5月在1131—1255人之间^⑥。1931年底则下降到七百多人,其中工人党

① 本小节利用了杨艳生硕士学位论文《长征前上海党员人数增减考证和原因分析》所搜集的资料。

② 《大石同志关于江苏党的组织情况的谈话》(1928年1月9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30页;《江苏省委组织问题决议案草案》(1929年2月20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546页。

③ 《江苏省委组织报告》(1927年11月),《江苏省委组织科报告》(1927年12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382—429、621页;《大石同志关于江苏党的组织情况的谈话》(1928年1月9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30—31页。

④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第101—117页。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信》(1929年11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⑥ 《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上海市党的支部情况统计表》(1930年5月30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6,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6编印,第128—132页。

员约为 500 人，党的支部则有一百多个。^①1932 年 9 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要求，上海地下党开展了一次突击发展党员工作，使 10 月初党员人数达到 1 726 人。1933 年 3 月，经过又一次突击发展，上海地下党号称有党员 3 000 人，6 月份号称有四千多人。^②但这两个统计数字可能包含了很大的水分，因为到了是年的 12 月，上海的党员数量又仅剩 612 人了。^③1934 年，上海党组织力量进一步削弱，到 9 月，全市仅剩 71 个党支部、475 名党员了。^④

1934 年 11 月，上海地方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1935 年 1 月，最后一届江苏省委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和上海的省级领导机构已不再存在。其后国民党当局又于 2 月、7 月和 11 月进行三次大规模搜捕，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央文委等几十个机关被破坏，大批领导成员被捕。到 1935 年 7 月 24 日止，在上海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各区区委都被破坏殆尽。区委下属的支部也不存在了。^⑤

三次大破坏后，上海地下党组织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但仍有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得以保存下来，根据王尧山的回忆，当时保存下来的党员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系统中：一是党的“文委”系统：1935 年文委系统保存下来的党员约 100 人左右^⑥；二是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共产党党团：武卫会上海分会有共产党党员，大概二三十人^⑦；三是工会系统：1935 年上海市工会联合会系统的党员约 100 人^⑧。此外，中共

①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工作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2 年 2 月 12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0 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47 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1983 年版，第 211—212 页。

③ 《江苏省委组织部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1933 年 12 月 3 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3，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 1986 年编印，第 95—103 页。

④ 《江苏省委九月份组织状况报告》（1934 年 11 月 21 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3，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 1986 年编印，第 397 页。

⑤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43 页。

⑥⑦⑧ 王尧山：《关于上海地下党重建的经过》，《党史资料丛刊》1979 年第 1 期。

中央的印刷发行部门有党员 20—30 人^①。四是共青团系统：1935 年 7 月后，尚有五十多个基层支部^②。根据中共六大党章的规定，有党员三人即可组织支部，因此可以推断 1935 年 7 月以后，共青团系统至少有党员 150 名。此外，还有一些在各地失去组织关系后来到上海找党，或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党员。由于这些剩下的党员是在经过 11 月的大破坏以后保存下来的，所以可以大致确定到 1935 年底为止，上海党员在 390—410 人之间。

1936 年，上海地下党开始重建组织，对党员进行了一次个别审查，清退了一些不合格或身份可疑的党员。到 1937 年 5 月，上海共有党员 160 人左右。^③

纵观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时沉时浮，在峰尖和浪谷中，经历着一次次失败与成功，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在成长中的艰辛和坎坷。

二、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 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

（一）赤色工会及其活动

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实行了查封、解散等严厉镇压政策，上海总工会、各区工联及各产业总工会等工会领导机关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公开活动条件的丧失，使总工会已难以获得过去那种巨大的权威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迅速缩小。1929 年 6 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进行地下活动的上海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并指示上总及所属工会全部参加工联会，以工联会的名义去指导基层工会。6 月 18 日，上海工会联合会宣告成立。工联会成立

^{①②}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3 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0—201 页。

之初，上总并未立即撤销，仍在发布政治宣言、告工友书等文件、传单，并领导工人纠察队。同年下半年开始，上总的名称不再出现。转入地下的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工联会及其所领导的基层工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赤色工会，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上海工人中建立的主要群众组织。

1. 组织概况

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上海总工会所登记的基层工会达到 502 个，会员有 82 万之众，^①是为赤色工会力量鼎盛时期。

四一二政变后，大批基层工会遭到取缔或瓦解，共产党所能掌握的工人群众数量也大幅度下降。据 1927 年 10 月的《江苏省委最近工作总报告》称，其时党有把握号召的工人为 5 万人，估计“暴动时可号召十万人。”^②到 1928 年 8 月，江苏省委估计则是：“目前我党在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基础大部分在店员手工业工人及一（部）分轻工业工人和市政工人上，聚积起来不到六万人，能号召的虽可达十万人，但大半是无组织或动摇的。”^③由此可以看出，这时赤色工会仍保持着至少 5 万人的规模，但产业工人会员已严重缺乏，且会员质量不高。

进入 1929 年后，上海赤色工会的规模开始急剧减少。邓中夏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中估计：“上海赤色工会会员大概约一万人，能影响并能动员的群众大概约四五万人；但大半还是店员，纱厂工人还只有几厂。”^④而据上海工会联合会 1929 年 10 月 14 日的工联党团会议的记录，其时“全上海我们有把握的一千人”。^⑤

1930 年 1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赤色职工国际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的工会会员，总计 39 800 人，其中上海工联会会员为

^① 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0 页。

^② 《江苏省委最近工作总报告》（1927 年 10 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印，第 447 页。

^③ 《最近上海职工运动决议案》（1928 年 8 月 17 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2，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 1985 年编印，第 640 页。

^④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86 页。

^⑤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会联合会》，档案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4 页。

3 000 人。^①同年 6 月 15 日出版的《全总通讯》报道了上海的赤色工会情况：“有二千余会员，而下边的组织仍然表现得非常之散漫。”^②据上海工会联合会的统计，1930 年上海赤色工会人数为 2 777 人^③，按上海 80 万工人计算的话（实际不止此数），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赤色工会会员仅占工人总数的 2.6%，其中，有明确统计的沪东区工人总数为 53 180 人，赤色工会会员 296 人，占工人总数的约 0.56%。可见，这时的赤色工会在数量上已经不成气候。

此后，上海赤色工会进一步萎缩。罗迈在 1931 年 2 月 7 日出版的《实话》第 19 期上抱怨，上海“赤色工会和会员都猛烈的缩小（现在只有七百人了）所有产业工会都变成了空架机关，现在几乎没有真正的赤色工会。”^④到同年 10 月 21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汇报了这一时期赤色工会的组织状况，其中上海的赤色会员仅仅 600 多人。^⑤

九一八事变后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上海出现了一个群众救亡运动的高潮，各种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但赤色工会的发展仍无起色。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说法，这时赤色工会在组织上已获得“相当的发展”，即“市政发展五十八人，印刷十人，青工六十人，女工十人，香烟二十四人，共一百六十二人。”^⑥3 个月总共才增加了 162 名会员，就被认为是“相当的发展”，可见情形之窘迫。

到 1932 年 5 月，“全上海赤色工会会员不过四百人左右”，而且，“即使四百赤色工会会员，也没有在组织上巩固起来。”^⑦据上海工联合会组织部统计，是年底全上海的赤色工会人数仅剩 126 人^⑧。到 1933 年，“一些赤色工会小组相继停止活动，以后会员寥寥无几。”^⑨

①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的工会会员及其领导的群众》附表，《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81 页。

②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57 页。

③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会联合会》，档案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71—474 页。

④ 《中国工运史料》总第 24 期，工人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 页。

⑤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工人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51 页。

⑥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工人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71 页。

⑦ 《中国工运史料》总第 25 期，工人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9 页。

⑧ 据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会联合会》，档案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70 页。

⑨ 《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7 页。

对于赤色工会规模不断缩小这一可悲的趋势，中共江苏省委曾竭力试图予以扭转，多次下达严厉的指示，制定详细的计划，要求基层党组织及赤色工会干部组织坚决地发展会员。如1931年5月，江苏省委在制定六、七月份工作计划时，要求基层组织“帮助上海工联党团并领导支部发展会员，建立赤色小组，成立正式分会，完成六月份发展会员三百人，七月份五百人。”^①同年10月，江苏省委再度提出，“在今年广暴（广州暴动纪念日——作者注）以前一定要发展三百真正的赤色工会的会员。对于各种附属组织，必须加以切实的注意，在广暴纪念以前发展五百人。”^②1932年，江苏省委更提出“在‘十月革命’前须实现‘为一万赤色工会会员而斗争’”^③的口号。但事实证明，这些计划最后都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幻，在血雨腥风中破灭得了无踪迹。

大量事实表明，这一时期上海赤色工会不仅规模不断缩小，其内部的组织建设也基本乏善可陈。

1930年1月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派员巡视上海赤色工会后，即致信上海工会联合执行委员会，批评说：“各区下级工会很少是有群众组织。所谓工会大都是建立在少数干部分子或活动分子关系上，工会都没有基本的组织。”^④虽然此时上海赤色工会尚有三千多人的规模，但“实际上是拉夫来的，拿暴动欺骗来的，没有工会生活，所以产委一结束，赤色工会和会员都猛烈的缩小”^⑤上海赤色工会的领导机构实际上也是一个空的机关，严重脱离群众“不但不能集体化，不开会，负责人彼此不知道有些什么工作。……没有组织，没有分子。一切问题由秘书处负责，不能时刻指导下层群众工作。”^⑥

① 《江苏省委六、七月份工作计划》（1931年5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97页。

② 《江苏省委对工联党团的决议》（1931年10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78页。

③ 《江苏省委“九一八”到“十月革命”工作计划》（1932年9月20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1页。

④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

⑤ 《中国工运史料》总第24期，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⑥ 《江苏省委最近工作总报告》（1927年10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449—450页。

许多工厂分会或赤色支部都是经常处在流动状态。如“沪西赤色工会组织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以前大部分是中国纱厂,但是到了现在,沪西只有日本厂的组织,中国纱厂又没有了,或者已经很少了,这是常有的事!几个月中间,上海工会组从这一部分换到那一部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此,有人分析道“赤色工会的流动,完全因为领导机关没有去巩固。一般工会工作同志,把赤色小组成立了,以为‘大功告成’,有意无意抛在一旁,寒热病似的注意了东,忘记了西。常常听见工人们说‘有斗争你们就来找我,斗争结束后找不到你们。’”^①无怪乎中华全国总工会惊呼“组织不稳固,会员流动太厉害。”^②

上海赤色工会不仅组织机构散漫,对于会员的联系也极其薄弱。作为一个秘密组织,赤色工会内部没有最起码的组织生活,甚至平时也不与会员发生联系,只是在开展斗争时上级才出来对会员发号施令。“工会以至工会支部,缺少经常工会的活动工作,不能开会,不能收费,对于会员没有很好的工作分配与活动方法的指导。因此,工会与群众的关系不密切,组织的作用,仅在斗争时候表现其作用,在平常一般工人群众是尚未认识工会是他们自己的组织。”^③

2. 基本任务和主要活动

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规定,赤色工会的基本任务包括政治与经济两大部分。其政治任务是:“坚决的领导群众做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力争工人一切自由”、“必须与国际工人阶级有亲密的联合”、“拥护工人祖国苏联”、“赤色工会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工人阶级应该赞助农民的土地革命”。其经济任务是“不应忽视群众的经济要求与领导,增加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星期日休息,改良待遇,及工人卫生等要求,”而“八小时工作制是目前工人经济斗争中最主要的一个要求”。^④

基于上述基本任务的规定,中共江苏省委及上海基层党组织指挥

① 《中国工运史料》总第25期,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

②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276页。

③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页。

赤色工会开展了一系列斗争。

首先就是组织或策动各种政治性的罢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认为，“革命工会应该很坚决的站在工人前面，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要有计划的去领导斗争，有计划的去运用罢工战术，组织罢工，由日常斗争发展到罢工和一业同盟罢工。只有广大群众罢工斗争的发展，才能使革命力量加强，才能走上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道路。”^①

在实际工作中，赤色工会所组织或策动的罢工，主要就是政治性罢工，即使是普通的经济性罢工，领导机关也总是设法将之引向政治斗争的轨道，至少也要贴上政治性的标签，“在一切经济斗争中必须提出政治要求”^②。理由即是：“在现时为在一省或数省中形成并巩固一强有力的苏维埃根据地斗争的时期，赤色工会的任务，便是在准备很好的群众斗争中去发动组织与领导广大工人阶级的群众，应该从工人迫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要求着手，应很巧妙的把他们和政治斗争以及为苏维埃斗争的中心目标联系起来，而使他们革命化。”^③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罢工斗争必然“红”得发紫，并导致不断的失败。

如1930年1月11日，美商安迪生灯泡厂部分工人准备组织赤色工会性质的俱乐部，资方闻讯，即勾结当局逮捕了3名工人代表，全厂八百多工人于13日举行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会即向所属工会发出援助该厂工人斗争的号召，提出的口号单中，便有“工人有组织自己阶级工会、罢工示威的自由”、“拥护上海总工联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的口号，这立即暴露了这次罢工的政治背景，工人无法达到目的，被迫于当月15日复工。同月，祥昌棉织厂资本家借口营业不振，宣布关厂，该厂三百余工人竭力反对，并向国民党党政机关请愿。这本是一次合法的经济斗争，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会联合会却提出“打倒国民党”、“准备第四次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等

①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319页。

②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10页。

③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过“左”的口号,结果未能获得什么效果,反而是吓退了群众。

同年6月18日,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全体工人,在法电机务部工会领导下,为改善经济待遇举行罢工,遭到法租界捕房的武装镇压,被打伤三十多人,24人被捕,是为“马浪路惨案”。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即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抓住这一流血事件,来号召组织全上海八十万工人,以至广上(大)贫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运动,实现总同盟罢工的方针”^①,并把从实际出发、试图坚持进行合法斗争的法电工会负责人徐阿梅指责为“黄色工贼”,把法电工会指责为“黄色工会”。同年7月14日,英商老怡和丝厂三千余工人因收入减少,生活困难,反对资本家停止夜工而罢工,江苏总行委也准备将之扩大为全市总同盟罢工,除提出“反对开三日班”、“加工资”、“发米贴”等经济要求外,还加上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全上海各厂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建立苏维埃政权”、“拥护红军”^②等口号。结果当然遭到镇压,有十余人受伤,工人被捕,后又有数名罢工积极分子被捕,21日,工人被迫无条件复工。

1934年3月7日,美亚绸厂四千五百余工人,为反对资方工资打七折,在共青团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赤色工会却趁机提出“冲破五次围剿”、“援助工农红军”等与劳资双方都不相干的口号,还让罢工委员会带领群众包围市政府,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重伤二十余人,轻伤百余人,坚持近50天的罢工斗争失败,罢工中的积极分子167人被开除。

赤色工会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组织成员参加各种政治性的群众集会。即“各工会应即召集各种群众会议,以宣传赤色工会的政治主张以及斗争纲领,以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建立强固下层组织基础。”^③由于每次示威和集会几乎都遭到镇压,都有群众被捕甚至牺牲,群众愈来愈不愿

^① 《江苏总行委紧急通知第一号》(1930年7月22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333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8页。

^③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意参加，最后便只剩下党团员和赤色工会会员参加，结果，损失更加惨重。

准备武装暴动，则是赤色工会的最终任务。这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共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最高理想。中共领导机关一再强调，“发展工农（人）武装的组织——纠察队、维持队等，要在斗争中扩大这些工人武装组织，不仅是工人自卫，而且以为准备武装暴动，实行武装拥护苏联的主要工作之一。在群众中开始进行武装的军事训练。”^①

按照全国总工会和中共江苏省委的要求，上海赤色工会一直在尝试建立工人武装组织，准备实行上海工人的第四次武装起义。如1929年8月，上海工联会提出：“我们应当宣传准备第四次暴动。工人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1930年3月，建立了160人的工人纠察队，同年4月20日，上海工联会冒险举行了一次工人纠察队的大检阅，参加的有400人。检阅时还举行了授旗宣誓仪式。结果遭到当局冲击，多人被捕。1931年“五一”前后，上海工联会准备再扩大工人纠察队，强调“这队伍在暴动时就叫暴动队”、“组织工人纠察队不仅是保卫工会，而且要组织武装进攻，为上海工人第四次武装暴动做准备”。^②但由于这类工人武装的活动过于冒险和公开，往往在罢工斗争和游行集会中遭受损失，始终没有能获得切实有效的发展。

另外，赤色工会会员还被要求参加一些其他的革命组织，做相应的工作。如要求参加革命互济会等。“各工会以至赤色工会支部，所有会员，应有组织的加入革命互济会，在互济会的分部或支部中，应选举负责人出来组织革命工人救济委员会，与互济会一致的进行工作。”^③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赤色工会偏重于从事政治活动，而且不讲究策略，这样就注定赤色工会大多数的斗争活动必然遭受挫折，特别是政治色彩过于浓重的活动必然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因此，工人群众对赤色工会有很大的恐惧心理。“一般群众原来对我党及上总，信仰很好。……在本党及上总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很

①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20页。

② 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

③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信仰,及至叠次失败,受严重的打击,和切身的痛苦,同时我党的指导上发现许多的错误,组织上发现许多的弱点,所以渐渐对我党及上总的信仰减削了,甚至失望了。”^①

3. 赤色工会失败的原因

这一时期赤色工会作为党领导的工人群众组织,总体上无疑是失败的。虽然它进行过大量英勇的斗争,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斗争能切实起到扩大中共政治影响,进而团结、领导广大群众的有效作用。赤色工会对普通工人群众,明显缺乏吸引力,因而队伍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它既然不能有效地团结和引导群众,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因而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组织,更不能承担起中共领导机关为它所规定的基本任务。

赤色工会工作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

第一,这与上海地下党尚未建立有效的城市群众工作的秘密斗争模式有关。如前所述,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上海领导的工人运动获得很大的成就,主要是公开斗争模式的成功。这种斗争模式的最大隐患,就是工人运动的发展高度依赖一个公开的工会领导机关——上海总工会,从而使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缺乏可靠的基层组织基础。上海总工会统辖的基层工会虽然数量众多,大多却是凭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借着政治口号的激荡建立起来的,并没有巩固而健全的组织基础,普遍存在着“委派制度、命令主义,少数包办,缺乏工会民主生活,下层基本组织薄弱,在各组织上都是严重表现涣散现象等等”^②问题,亦没有坚强的党的基层组织作为核心,也普遍缺乏独立开展经济斗争的能力与经验。尽管中共上海区委在五卅运动后的一段时间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曾在组织经济斗争方面做过一些努力,但总的说来,还没有摸索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秘密斗争模式。因而,一遇严重的白色恐怖,需要通过脚踏实地的经济斗争来凝聚群众时,多数基层工会就显得有

^① 《沪东区报告》(1928年4月1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245—246页。

^②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380页。

些无所适从了。如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份文件所说：“在过去，赤色工会虽领导了广大工人群众作了许多伟大的革命斗争，但未能充分注意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的要求，因此又使一般的工人群众认为工会是政治斗争的组织，养成群众依赖政治的观念，轻视本身的阶级力量。所以国民党反动以后，赤色工会的机关一遭关闭，工会群众的组织和基础即完全瓦解。甚至在秘密活动时，一般工人群众不愿秘密进行工会组织，而希望某种政治势力来解决他们一切政治问题。这都是公开时代在工作上的错误，而遗留于群众中的影响。”^①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政治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白色恐怖严重，没有任何进行公开政治斗争的空间。上海地下党因受到曾经行之有效的公开斗争模式的深刻影响，在缺乏扎实的基层工作基础的条件下，继续袭用过去的办法来动员群众，自然要碰得头破血流。由上而下的强迫命令、委派制度等完全不符合地下党群众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遂成为这一时期工会工作中难以克服的痼疾。

四一二政变后，赤色工会领导机关曾热衷于用“红色恐怖”手段来胁迫群众参加斗争，就是这种错误工作方法的典型例子。1927年11月，恒丰纱厂工人罢工，永安纱厂部分工人也开展同情恒丰纱厂的罢工，资本家勾结巡捕房拘捕罢工领袖，上海总工会即指挥一批“红色恐怖队”队员冲入永安纱厂，迫使全厂一千八百余名工人都参加罢工。申新纱厂五厂工统会控制下的厂工会拒绝参加罢工，上海总工会又“组织了四五十名武装的‘红色恐怖队’队员，持枪冲进申新五厂‘大打一阵’，关闭机器，强制罢工，”于是，“工贼走狗拼命躲避，许多不理解情况的工人也吓得逃出厂去”，该厂1800名工人遂于11月4日“实行同情罢工”。日华一厂、二厂工头由于害怕“打厂”，“连忙派出代表表示同情斗争，也于同一天参加罢工”。在这种红色恐怖的气氛中，沪东纱厂实现了所谓的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虽然有“7个厂，约15000人”^②，但实

^①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214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际上群众并不理解为什么要罢工,只好分散回家,罢工斗争的局面冷冷清清。最后,一遭大规模镇压,工人群众又纷纷复工,同盟罢工彻底失败。

赤色工会甚至还曾用“红色恐怖”来打击积极复工的工人,以阻止工人复工,坚持罢工。1927年11月,上海英电90号司机被巡捕流弹打死,8号司机负伤,工人群众因不满资本家的处理,在市政总工会的领导下罢工。因有少数工人没有参加罢工,赤色工会便派出7名“红色恐怖队”队员前去袭击阻拦。结果,“英电驾驶员和售票员惧怕出事,不敢驾驶,英电各路电车就全部停驶。”^①但资方又派查票员开车,到12月7日上午,开出的电车增至20余辆,上工工人有100余人。“红色恐怖队”队员再次出击,先后将两名带头出车的查票员打死在家中。^②这虽然暂时阻止了复工,但因为缺乏群众基础,最后无法避免斗争彻底失败的命运。不仅如此,这次活动还使该企业的群众疏远了共产党。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工运干部即写道:“罢工工人在这一个大行动以后的恐慌更蕴蓄在各人的胸中……在青莲阁召集车务工人,到者只60余人,群众表现其动摇犹豫的心理。……他们与我们约定听回音的时间,竟避而不敢与我们见面。”^③用所谓的“红色恐怖”的方法来强行发动工潮,显然完全违背了党的群众工作必须团结、教育群众和必须尊重群众利益、群众心理的要求,必然会被群众唾弃。

第二,对中国共产党与工会的关系界定不清,导致赤色工会失去群众组织的特点。

政党是政治组织,理应以开展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而工会是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理应表达广大群众的基本经济利益,其功能定位首先应该是维护群众经济利益的组织,而非主要关注政治问题的政治组织。因此,工会必须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工会干部必须来自群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英电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英电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4页。

^③ 转引自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页。

众，这样才能及时而且准确地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威信。然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过多地直接干预工会的活动，使赤色工会实际成了党的政治外围组织。

这突出地表现为赤色工会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单一和狭隘，甚至“处处模仿党，依靠党。以至于上海工联报告中，把党与工联的关系的不好，当作工联工作上最主要的缺点”。^①1927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在总结上海赤色工会发展情况时，也承认：“群众的组织，前月发展到三十个工厂委员会，因党与工会系统未分开，工厂委员会仍是等于虚设。”^②

而造成党过多包办工会事务、党与工会的组织不能划分清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党的干部认为工会中的工人“能力太弱，没有独立指挥的能力……复加以白色恐怖和失业的恐慌，同志只有直觉，没有认识革命的出路，以工作为差事。上级指导机关，也不会应用他们的能力”^③，所以只能包办。

对此，中共江苏省委也曾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希望建立独立的工会系统，通过组织工会党团来领导工会，而不是直接干预包办工会，“肃清派人包办职工会及工人团体的传统观念及其制度，尽可能发展工人群众自己独立能力，吸收广大的非党群众，而党从中发生党团作用，以消灭代替工会及不发生工人群众组织的目前现象”；还曾强调工会领导机构中的党员人数比例要适当，“在党领导下工人群众的任何组织，指导机关的地位，我们同志只能占相当数目，绝对不能采用包办的形式，这不仅在下层组织中应如此，在上层总工会中亦应如此。”^④

然而，赤色工会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必然要求入会会员有很高的政治素质，至少愿意参加各类冒险的公开政治活动。因当时的中

① 《中国工运史料》总第25期，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②③ 《江苏省委最近工作总报告》（1927年10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447页。

④ 《江苏省委组织问题决议案草案》（1929年2月20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585页。

共领导人认为：“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极端秘密的条件之下，极广泛的群众组织是不能组织的，只能组织最先进的分子，共产党员和积极的无党工人。”^①但能满足这种标准的工人人数不多，这就必然导致赤色工会组织的狭隘性。早有研究者指出：“在那时环境下，赤色工会本身不可能发展的，因为它提的要求不是一般工人所能参加的，而是党员的标准。……事实上也是以党员要求来发展会员的。”^②实际上，有理由相信，1930年以后的赤色工会会员，大多数就是共产党员，因为其时的会员数量，与党员数量极其接近。见下表：

时 间	1930年5—6月	1931年	1932年4—5月	1934年9月
党员数	1 255	700	600	475
赤色工会会员数	2 102	600—700	400	497

（据本章前引资料整理）

由于赤色工会中几无普通工人参加，明显缺乏群众基础，甚至很难算作一个群众组织，党的领导机关自然无法从中造就一支有力的工人骨干队伍，结果必然导致党对工会工作的包办，“把职工运动完全建筑在上总的工会工作人员身上，区委几乎成了单纯的党内组织部，支部更加离开了群众工作，形成了党与职工运动的对立的形式。”^③党对赤色工会的包办，直接的恶果就是赤色工会无法及时而又准确地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诉求，不能完成团结和凝聚广大工人群众的基本任务。

第三，赤色工会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应该是“左”倾指导思想所导致的一系列错误方针和策略。

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斗争道路的影响，“城市中心论”在土地革命初期的中共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如强调“党的责任就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

① 《中国工运史料》总第21期，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4页。

② 沈以行：《工运史鸣辩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③ 《江苏省委组织问题决议案草案》（1929年2月20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560页。

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①“从大城市日常的工人斗争的发动与扩大，进于工人群众反抗政府的总的政治斗争，以至大城市的武装暴动活动胜利，成为四周农民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而夺得工商业中心的政权——一省的政权。”^②曾经成功地实现过工人暴动的上海，更由此成为中共中央心目中最重要暴动基地。因此，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便不得不以准备暴动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导致了赤色工会工作中一系列的“左”的错误方针。

由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最终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赤色工会的功能定位上，便不可避免地过分强调其政治使命，忽视了工会组织的基本任务，从而脱离了群众。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的工人群众政治热情明显下降。中国共产党却基本无视这一点，赋予赤色工会过于沉重的政治任务，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因而不可能对广大工人群众产生吸引力。赤色工会在发动政治性罢工或其他斗争时，在策略上还总是按照上级不切实际的要求，只强调进攻和扩大，拒绝退却或必要的妥协，既不符合群众的切身利益，又造成了巨大的安全风险，更令群众望而生畏。

同时，赤色工会及其活动浓厚的政治色彩，使得其无法通过合法的公开活动来影响和团结广大群众。虽然当时即有人认识到，“群众工作绝不是秘密所能发展的，必须公开的宣传赤色工会的主张，争取群众”^③。但是，在“左”倾方针的指导下，赤色工会不仅拒绝任何合法活动，还竭力把一般的工潮强行贴上共产党的标签。严重的白色恐怖条件下，这种公开活动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不会对群众产生任何有益的影响。

赤色工会的冒险和关门主义的政治活动使其基本丧失了活动的空

①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57页。

② 《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1928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95页。

③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579页。

间,工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遭到破坏。“在1933年至1934年间,赤色工会平均每一两个月就要遭到一次破坏,最多不超过四五个月。”^①既不能有效吸收新的成员,党员和工人骨干又不断地流失,赤色工会当然要日益走向衰落。

(二)“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

这一时期,地下党及赤色工会领导的群众斗争,除罢工等日常的斗争形式和模式外,还比较突出地采用了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方式。飞行集会,就是由党的领导机关对集会的日期(一般为纪念日)、时间、地点(一般为热闹地区)做出具体规定。届时参加者扮成行人分散前往,到约定时间,则由一人或数人以燃放爆竹或摔酒瓶为号,与会者立即集合,有人演讲、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散发传单,然后在军警到来之前解散。

1. 党对飞行集会、游行示威的认识与组织

当时党的领导机关一再强调,飞行集会是一种有效的斗争手段。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就断定,飞行集会是在“不能经常的召集群众的会议中(时)最好的一种鼓励群众而带有行动的集会方法。”并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准备飞行集会,使“飞行集会易于转变为群众的示威活动。”^②同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在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中,进一步对此类群众示威作了充分肯定,称“群众示威是斗争发展到了高度的一种最热烈的表示”,“他表示对于统治阶级政治上的反抗,他检阅了自己的团聚力量,故这种行动实含有庄严的意义”,故“一年来我党领导的示威运动的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他每次给予群众的政治影响与给予敌人的恐慌畏惧都显然是很大的”。示威运动组织不力者,则被该文斥为“机会主义者”。^③1930年7月22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中更是断定:“示威运动,在目前将成为群众主要的政治斗争的行动。”^④

① 沈以行:《工运史鸣辩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530—532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175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要求和指示，江苏省委组织这类活动可谓不遗余力。特别是各种纪念节日，都有具体布置。当时的纪念日还特别繁多。仅1929年来看，就有：1—3月的“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二七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日”、“上海三次暴动二周年纪念”；4—6月的“四一二”、“五一”、“五三济南惨案周年纪念”、“五四”、“五五马克思生日”、“五九国耻纪念”、“五卅四周年纪念”、“六二三沙基惨案四周年纪念”；7—9月的“八一国际赤色日纪念”、“九一”、“九五”、“九七”；10—12月的“双十节”、“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等等。为了组织是年的五卅运动纪念活动，“党内成立了由中央、团中央、省委团省委、上海总工会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总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行动。党外的群众团体成立了上海各界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筹委会，发了大量的宣传大纲和传单。30日清晨，示威群众从各方面陆续汇集南京路两旁。10时整，一声哨响，积极分子拥上街头，一面散发传单，一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少数积极分子撤退时砸了电车和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国日报》馆。这天有的区也分片组织了示威、群众大会或飞行集合。”结果“这次活动有近百人被捕。”“五卅”示威后，省委又筹备“八一”总示威，“‘八一’当天有数千工人，学生、少数农民、士兵，冲破中外反动派的警戒封锁，在南京路、福州路、白渡桥、天潼路示威游行，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上海各区也举行了罢工、飞行集会或群众大会。”^①按照时任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的说法，是年“从‘五卅’以来，上海平均每十天有一示威，无论大小，变成不断示威。”^②

1930年则有：1月19日“以灯泡厂惨案为中心”的“反军阀战争，武装保护苏联与准备武装暴动”示威，参加者一千多人，数十人被捕；3月18日的示威活动，一千四百余人参加，20人被捕；4月8日，省委在北京大戏院召开上海“五一”总示威第一次筹备代表大会，“散会时被武装巡捕包围，百余人被捕”；4月20日，“上海各区工人纠察队近四百人，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292页。

② 《何孟雄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在杨树浦临清路一带公开举行检阅大会，遭到敌人的冲击，许多人被捕”；4月27日，“省委在‘仁济善堂’召开上海‘五一’总示威第二次筹备代表大会，二百多人被捕”；5月1日，“上海有一万多群众拥到南京路，占领马路，阻拦电车、示威游行，遭到早有准备的中外军警巡捕的冲击，被捕多人”^①。

特别是到后来，由于罢工斗争已很难发动，地下党更是全心投入到此类活动。飞行集会甚至一度成为党领导上海群众开展斗争的唯一方式，直到党的力量损失殆尽，再也无力发动为止。

2. 飞行集会与游行示威的效果

刘少奇早就指出，飞行集会之类是典型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行动。“纪念节在过去几乎成了我党冒险主义‘教徒’的‘礼拜日’。在这一天，照例要发宣言、发传单、出特刊、关车、罢工、到马路上示威、叫口号、开会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只有我们的干部，也要到马路上叫口号、散传单、打石头——示威。……结果在这些纪念节的损失，是难以计算的。”^②由于这种内容空洞的政治示威与群众利益无关，严重脱离群众，群众不想参加，加以几乎每次示威和集会都遭到镇压，都有人被捕甚至牺牲，群众也愈来愈不愿意参加，只有党团员参加。结果是：这类活动非但不能起到任何教育或鼓舞群众的作用，反而造成越来越多的党员骨干暴露、被捕。1931年五一节，上海地下党要求分区举行飞行集会，沪东区“组织上动员并集中了四十人以上，虽没有做到演讲，但有十七人散了五六千份传单，七个人喊了口号，张开了红旗”；“岳州路集中二十六人，散了四百份传单、喊了两个口号”，^③闸北沪西的则示威没有实现。沪西的三次飞行集会都告失败。^④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292、299页，第303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③ 《江苏省委关于上海“五一”工作总结》（1931年5月12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45—346页。

④ 《江苏省委关于上海“五一”工作总结》（1931年5月12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47—348页。

而当时“左”倾领导人对此类不但不进行反思，反而自欺欺人地夸大其实际意义，说这是“冲破统治者的恐怖，表示自己的力量伟大，这是宝贵的成功。”“吓得帝国主义、资本家、国民党不断的发抖”。如1929年的五一节南京路示威，被捕一百多人，内部的总结却说“虽然损失了一百多同志，却使敌人在政治上受到打击。”^①在这种认识下，“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恶劣的白色恐怖环境，对实际困难视而不见，对组织这类冒险活动不力者，扣上“机会主义”、“右倾”的帽子予以打击、排挤。

这一时期的飞行集会和示威活动，固然表现了地下党员及其领导下的积极分子敢于同敌人斗争、不畏牺牲的勇气，但此类活动无关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超出了多数人的觉悟程度，非但不能起到团结群众的作用，甚至还使群众疏远党。这是一种明显错误的群众工作方式。

（三）对群众的宣传工作

有效的政治宣传，是政党传播政治主张、扩大政治影响、争取群众支持的重要途径。重视对群众的政治宣传工作，是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特点。这一时期，上海的中外统治当局均实行严厉的言论控制政策。但由于租界的存在，行政体制的割裂和政策的差异，也使得统治阶级无法绝对封杀所有的反抗言论。只要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方针和策略，仍有机会利用统治制度的这个缝隙，特别是利用租界的特殊政治环境，开展有效的政治宣传活动，争取广大的群众。但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干扰，党在群众宣传和教育工作上存在很多缺陷：宣传组织机构由于力量的限制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宣传目标和内容由于过于政治化而不易为群众接受；宣传缺乏策略，不讲合法和公开，不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做适当的改变；宣传的形式和载体上没有能考虑到宣传对象的特殊要求，单一而死板。因而这一时期，尽管党高度重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却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成绩。

^① 沈以行：《工运史鸣辩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1. 群众宣传工作的机构与力量

上海地下党的宣传领导机构是江苏省委宣传部,下设部长、秘书、宣传科、鼓动科、出版科、印刷局等部门,并成立有省委宣传委员会、党报委员会、职工宣传委员会(《上海工人》编辑委员会)等。宣传部决定群众宣传的目标、内容和主要形式等。

地下党的各区委均设有宣传委员会,由“区委宣传委员,工联宣传委员,K. M. T. 区委党部宣传委员,C. Y. 区委宣传委员”组成,“每周开会二次,计划该区宣传工作”。

各区委、支部还都应该成立宣传队,开展广泛的群众宣传活动。各区委的宣传队“专司秘密散发宣传品,写标语,造谣言,侦探消息,传达命令等”,“各支部均应组织三人以上的宣传队,执行一切宣传工作,在较大而有力量的支部须设立宣传委员会,计划并指引该支部的一切宣传工作”。^①工厂中“均应立即组织宣传队、粉笔队、传单队”。^②从文献中看,当时有些党组织所建立的宣传队还有标语队、口号队、演讲队、毛笔队、炭条油墨队、鼓动队等名称。

这种专业化的宣传队主要由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有的还享受津贴,如“特别服务队每月给生活费十元。”^③因而,始终规模不大,而且活动模式固定和僵化,往往只是在工厂门口和大街上发传单、作演讲等。其中,以散发传单和书写标语为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上级党组织往往以一种相当浮躁的心态,强迫命令各级组织人员大量印刷传单,在规定的地点作规定数量的散发。这就使得这项工作带有极大的风险性,一不小心就会遭到逮捕。

2. 群众宣传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政治宣传工作的目标是“使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普遍的

^① 《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四至八月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9月15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60、82页。

^② 《江苏省委关于蒋介石倒台后我们的行动大纲》(1927年8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39页。

^③ 《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四至八月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9月15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84页。

深入群众去，扩大工人阶级对本党的信仰，使群众对于阶级的意识更进一步的认识，而走向我们所指导的道路。”^①围绕着这个目标，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反对国民党的统治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继续遭受列强的欺侮，政局动荡不稳，军阀割据，内战频仍，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群众几无政治权利和自由可言，生活极度困苦。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各阶层普遍的愤慨，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中又不积极，缔结了可耻的城下之盟，更是遭到国人几乎一致的唾骂。

共产党人坚信，国民党是“国民公敌”，国民党政权是反动的政权，也是中国人民一切痛苦的主要根源。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也是人民群众一致的心声。因此，旗帜鲜明地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向群众“揭破国民党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欺骗民众，屠杀工农的事实”，将使群众更加认识到“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加强群众的革命认识和情绪。”^②此外，中共江苏省委还要求抓住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作反对国民党的宣传。如“在每一工厂的每一个小问题，党及上总都不要放弃对于工人的宣传——使工人认识国民党一切形式的工会组织为政府机关，而非为工人的组织。”^③

(2) 反对帝国主义及拥护苏联的宣传

帝国主义是阻碍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三座大山之一。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长期处在中外民族矛盾的中心。外国人直接在沪投资开办工厂，凭借技术、资本上的优势和治外法权的庇护，不仅对民族资本企业构成巨大的压力，还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令人发

① 《江苏省委关于沪东区的工作决议案》(1927年7月30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16页。

② 《江苏省委华字通告第四号》(1928年10月15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81页。

③ 《江苏省委关于上海职工运动决议案》(1928年5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413页。

指的侮辱压迫,历来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对象。尤其是租界当局凭借不平等条约和炮舰政策的保护,多次对上海人民的政治抗议活动进行血腥镇压,更使上海人民形成了强烈的反帝情绪。因而,在上海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无疑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

同时,上海地下党还大力开展“拥护苏联”的宣传。强调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宣传苏联工人的“幸福生活”、宣传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但这些宣传并没有很好地针对群众的心理,更无法与群众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完全脱离群众的需要与政治水平。有些材料甚至在宣传“苏联的五年计划”,结果群众根本不知所云。特别是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中国共产党简单地号召群众打倒国民党,拥护苏联,完全无视民族感情,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莫名其妙,甚至引起反感。

(3) 反黄色工会及改良主义的宣传

在关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上海地下党还曾大力开展反对黄色工会及改良主义的宣传。将一切非党的思想一律斥之为反动的思想,必将之打倒而后快。甚至认为改良主义倾向比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更为恶毒和危险。党的领导机关一再要求“扩大反改良主义的宣传,打击群众的合法观念和对国民党的幻想”,^①“加紧揭破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的改良欺骗”^②。

(4) 有关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政策的宣传

除了进行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改良主义的宣传外,中共江苏省委还要求,“在斗争中须利用一切事实联系到党的政治宣传”^③,即宣传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力图使自己的主张为群众所了解,所理解,所信服,从而凝聚在党的旗帜下。但宣传的口号,往往明显脱离群众的认识

^① 《江苏省委关于上海目前争取群众的策略和工作方针决议案(草案)》(1929年2月27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643页。

^② 《江苏总行委关于宣传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3月21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625页。

^③ 《党团江苏省委通告第一号》(1929年2月1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470页。

程度，也难以一般为一般群众所理解，如“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帝国主义的羁绊；推翻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政权及建立工农专政与组织苏维埃”^①；“工人聚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②；“加紧工人纠察队与准备第四次暴动”^③等。

3. 宣传的方式和方法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条件下，国民党对言论及出版物实行严厉的高压政策和严格的检查制度，对异己的公开言论予以残酷的打击。在此种条件下，采取何种宣传形式和宣传方法，便决定了宣传的范围和宣传可能取得的效果。如何做到既公开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宣传，又不暴露自己的革命力量，做到公开与秘密的很好结合，做到宣传的群众性与党性的统一，这就需要采取较为合适、群众容易接受的宣传方式和方法。

除了飞行集会之类的集中宣传活动之外，文字宣传始终受到地下党的高度重视。中共江苏省委认为：“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煽动宣传的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等等）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④

这一时期，江苏省委及上海地下党一直大量散发各种文字宣传材料如小报、宣言、传单、标语、墙报等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教育群众。1927年8月，江苏省委为反蒋介石政变而制定的行动大纲中，就要求上海“各工会立刻根据此次运动（反蒋介石——作者注）目的发表宣言”，“各区应尽可能的自出一种小报；或不断的散发许多传单”，并要求各区宣传部赶快计划出版党报、三日刊、政治宣传大纲、快报等^⑤。

① 《江苏省委关于宣传问题决议案》（1929年12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409页。

② 《党、团江苏省委通告第一号》（1929年2月1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470页。

③ 《江苏总行委关于宣传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3月21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625页。

④ 《江苏省委关于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12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414页。

⑤ 《江苏省委关于蒋介石倒台后我们的行动大纲》（1927年8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39页。

1932年8月江苏省委为准备“九一八”纪念,规定各区委“应该立刻准备‘九一八’的各种宣传品,沪西、特区、法南、沪东至少二万份,沪中、闸北至少一万五千,其他各区至少一万。……对各区小报、壁报必须加强它的领导。……增加小报发行的数量至少一半至一半以上,每一个中心厂必须有壁报,保证小报、壁报按期出版……同时必须充分计划来准备口号队、演讲队、散发队等等的组织各区宣传部应该准备画报、新剧、歌谣各种宣传工作,来兴奋群众的情绪,动员群众。”^①由此可见,文字性的各种宣传在群众宣传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出版的群众刊物比较讲求针对性。如《三日旬刊》是以“浅俗讽刺文字”对工人及一般市民宣传的;各区工委办的各种油印的每日小报,“专给工人阅读”;C. Y. 编辑的旬刊则“侧重青年阅读”;《向左周刊》则“侧重知识分子及商民阅读”;上海总工会编辑的各种画报“侧重工人阅读”;济难总会编辑的月刊“侧重文艺性作品;介绍死难者的历史”^②。这样,有针对性地开展群众宣传工作,使党的主张能为各阶层群众所了解,避免了造成宣传对象的模糊和混乱,从而可以更好地抓住群众的需求特点,表达群众的心声。

上海地下党也积极探索群众易于接受的宣传形式。如沪西区就报告“文字宣传以滑稽画报及简单标语最宜,在车间内散发,到处粘贴,同志很高兴有效力(原文如此——作者注),不至焚毁,大的散在工房,工人家中,宣传反对工统会……再之发些大乌龟人头狗身……等带滑稽画的宣传,此种宣传品,备受同志及群众欢迎。”^③地下党还比较注意宣传品适合不同类型群众口味和理解能力的问题。“对于工农宣传工作,应尽可能的利用各地各种的工人刊物,而文字务宜通俗化。对于小资产阶级、中学生、小商人等——则应利用各种由同志编辑的公开文化刊

^① 《江苏省委宣传部为“九一八”宣传鼓动工作给上海区委的一封信》(1932年8月27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581—582页。

^② 《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四至八月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9月15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81—82页。

^③ 《沪西区工作报告》(1928年3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218页。

物，必要时省委亦可出可公开的文化刊物，以广宣传。”^①有些党组织还注意到群众大多文化程度比较低，不识字的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因而还举办了各种阅读班，以更好地发挥文字宣传的效果。

4. 群众宣传工作的效果及原因分析

这一时期，虽然地下党制定了群众宣传的很多计划，布置了很多任务，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也都十分努力勇敢，但由于指导思想失误，宣传效果十分有限。这一时期党的档案文献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批评，比比皆是。如1927年10月1日《江苏省委宣传部组织及工作计划》称：“最近报告有将宣传部发出之《前锋》及他种宣传品，不向外散发而自行烧毁者，有聚累宣传品，久不发出者，有以散发出宣传品了事，不问对象如何，无宣传计划，以至无效果者。”^②省委在1928年11月总结中承认：“江苏党过去对于宣传工作，并未有计划的执行，只有应付工作，而扩大的党的宣传，固然无有，更无党的教育工作。”^③1929年2月的省委的评价亦是：“江苏党一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建立经常而有系统的教育宣传工作以战胜改良主义的宣传，扩大自己的政治主张到广大群众，并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连日常应付的工作也非常缺乏。”^④由于缺乏有效的宣传，这一时期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并没有扩大。“江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减少，党所能领导的群众日益削弱，群众在国民党的欺骗与压迫之下，对于我们党发生许多恐惧与误会，甚至于在浦东便已有以为共产党是杀人掳掠的党徒。上海工人斗争中，国民党用各种方法隔绝群众，使不与我们接近，工人亦便有些害惧，不敢接近我们。”^⑤

① 《江苏省委最近工作决议案》（1928年9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74页。

② 《江苏省委宣传部组织及工作计划》（1927年10月1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144页。

③ 《江苏省委转发中央对江苏目前工作方针决议案（草案）》（1928年11月20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232页。

④ 《江苏省委关于上海目前争取群众的策略和工作方针决议案（草案）》（1929年2月27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642页。

⑤ 《江苏省委宣传工作决议案草案》（1929年3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176页。

以反改良主义的宣传为例,可以看出党的有关努力非没有什么效果,群众反而始终比较容易接受所谓的改良主义,甚至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也对“改良主义”发生兴趣。“现在汪陈派的宣传大多超过我们党若干倍。工人斗争渐次扩范围,我们的宣传反有缩小的形势,本来我们宣传工作就做得过少。总之现在的形势,改良欺骗的宣传,不仅扩大到广大群众,而反映到我们党内(合法观念),我们的宣传,不只不能进攻,连防御也不够。”^①“工人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复生,合法观念的发展,党内合法观念的右倾的倾向之生长。”^②“一般的工人斗争,群众仍旧是依赖国民党的仲裁调停……甚至上海的区委支部负责同志亦认为除仲裁、调停以外,没有办法。”^③

此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受到严重摧残,宣传工作进一步萎缩。秘密报纸的发行量明显下降。共青团省委领导下的《少年真理报》每期仅发行 600 份,而且由于“不通俗、不青年化、论文太多、信息太少”,对群众几乎无影响。各区虽有团委领导下的一些刊物,如沪东《沪东青年》、《反帝国报》,沪南《美亚工友》,沪西《沪西青工》,但“四月份刊不出,每月份数、散发、反映都不知道”。此时,各种宣传品的数量也急剧减少,三八妇女节仅发宣言单 2 500 份,标语 2 500 份,而且宣言由于“缺乏煽动性”、“文字太冗长,词句不通俗”、“发出的迟缓”而不能造成预期影响。^④

当时的地下党也曾对宣传工作的失败原因进行过一些分析。

中共江苏省委曾经认为,主要原因是党历来忽视日常经常系统的宣传工作。“自有党以来,没有建立其经常的系统的宣传鼓动工作,以前一切文字、刊物、传单、口头等宣传鼓动工作,都是临时无

① 《江苏省委通告第二号》(1929年2月9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492页。

② 《江苏省委关于上海目前争取群众的策略和工作方针决议案(草案)》(1929年2月27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624页。

③ 《江苏省委宣传工作决议案草案》(1929年3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176页。

④ 《江苏省委宣传部三月至四月宣传工作的报告》(1934年5月4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268页。

常的。”^①“因为地下党的宣传不易，便幻想来一个军阀战争或等待一个革命的高潮，爆发广大的宣传，因此忽略了日常的宣传工作。”^②而后来由于突出非经常性的纪念宣传，使得平常的宣传工作也始终缺乏计划性，带有浓厚的应付性质，即“缺乏精细的、切实的工作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坚决不动摇的斗争精神。每天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纪念节’！因为缺乏计划，所以有时是‘临时抱佛脚’，工作迟缓的原因也正在此，宣传品太迟缓，甚至有时过期还未发出去”。^③

宣传工作没有明显成效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左”倾错误的指导，导致了宣传内容失当、错误，根本不能反映群众的心声，因而不受欢迎。如在中苏两国发生冲突时，甚至在日本侵占东三省时，中共领导机关却无视广大群众的民族感情，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口号。大量的政治宣传被简单化、口号化，无法使群众理解和接受。1932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在总结“红五月”工作时便承认：“在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宣传品中，还是很少活泼的运用每一事变，提出更具体的部分口号……假若我们仔细检查各区群众组织的宣传品，那立刻可以发现，这些宣传品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没有地方性，很少当地具体事实的联系”^④，“各区宣传工作普遍缺点是太机械而主观，不能考虑群众心理，认识宣传对象”^⑤。在许多经济斗争中，政治的宣传口号还经常被强加在群众的经济要求上，令人反感。如“在一张纸上，同时写上‘加一元钱’和‘苏维埃政权’的确相隔甚远的口号，使群众莫名其妙”。^⑥当时还有一种倾向，

① 《江苏省委华字通告第四十三号》（1928年10月8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87—88页。

② 《江苏省委宣传工作决议案草案》（1929年3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173—175页。

③ 《江苏省委红五月宣传工作的总结》（1932年6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651—652页。

④ 《江苏省委红五月宣传工作的总结》（1932年6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650—651页。

⑤ 《江苏省委宣传部十月份工作报告》（1927年11月5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228—229页。

⑥ 《江苏省委通告第二号》（1929年2月9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495页。

就是认为宣传口号的调子越高,就越能争取群众。如“改良主义宣传八小时工作制,而我们的同志便提出七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以为我们的口号比他们高便能战胜敌人”。^①宣传内容的简单化、口号化、不考虑群众的认识能力和接受能力也是重要的原因。

这种“口号崇拜”即过分强调甚至夸大宣传、口号作用的实质,就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是当时的地下党群众工作失败的表现。因为归根到底,真正能够打动群众的是事实,是共产党代表和维护他们切身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事实,而绝不是宣传、口号。宣传、口号只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为基础,才能产生效力。

三、基本经验与教训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处在最严酷的白色恐怖条件下,地下党的广大干部党员怀着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始终不畏艰险,坚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政治斗争,努力探索白区地下工作的有效方式,以争取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基础。他们在这一奋斗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的献身精神和绝妙的政治智慧,可歌可泣,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历史遗产。

但是,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备受“左”倾错误困扰的时期。不仅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三次严重的全局性“左”倾错误,就是一些干部和基层组织中,也曾弥漫着强烈的“左”倾情绪。上海在1927年10月至1933年初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直接受“左”的思想的指导,各方面的工作都深受其害。尤其是以工人运动为主的群众工作,遭受到特别严重的挫折。这主要表现为: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曾经声势浩大,现在却不断萎缩,最后落到几无群众参加的地步;党领导的群众斗争不断失败,群众的积极性和热情遭到沉重打击;党的组织及其主

^① 《江苏省委宣传工作决议案草案》(1929年3月),《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173—175页。

张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低落，越来越多的群众对党缺乏信任，甚至不敢和党接触。党在上海的政治影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因而可以断定，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群众工作尽管十分努力，也不是没有任何成就，但总体上说，或者说与其他时期相比，基本上是失败的。总结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更加清晰地获得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规律的完整认识。

（一）有益的经验

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虽然多数时间处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但也有一些时间，提出或实行了比较正确的群众工作策略方针。如中共六大，把争取群众作为当时党的总路线，要求各级党部“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①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共六大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一度出现相对较好的势头。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得到发展，赤色工会会员数量有所恢复和发展，“1929年11月，已有二十多个公开的工会，会员达2.7万余人。”这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赤色工会发展的最高峰。群众斗争的次数、参与人数和斗争胜利的次数都有所增加，仅1929年7—10月，“上海工人斗争共76次，其中领导的就有44次，参加人数12.65万人。76次中，得到胜利的28次，其中工联领导的有20次。”^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较为正确，组织、宣传、斗争均比较讲究策略。具体来看：

第一，在群众工作指导思想上，中共江苏省委注意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纠正盲动错误，将群众工作从组织暴动转变到争取群众上来。

第二，在组织群众方面，虽然继续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中心，但也准许党员用合法的方法和手段来团结群众，曾要求尽量利用和组织具有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8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4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0页。

公开或半公开的合法性组织,诸如兄弟团、姐妹团、互助社、体育会、读书会等去团结群众,或加入非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中去争取群众。中共江苏省委还曾专门指出:“不可说笼统的‘反黄色工会’口号,致使黄色工会群众的误解,发生工人阶级间的恶感,更给反动领袖以利用的机会”,甚至禁止在黄色工会中组织赤色工会性质的秘密组织,因为“这很容易走到分裂广大群众,和给敌人在群众中以破坏我们工作的机会”。^①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的彭湃在指导邮务支部工作时,就认为应该通过合法的群众团体来组织群众。邮局地下党遂针对不同群众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组织,邮局快信间成立了赤色工会小组干事会,主要在信差中开展活动;在职员中组织了邮社、护工团;在一般工人中组织兄弟会等团体。这样,共产党人在邮局很快扩大了影响,“到1929年3月,邮局有党员12人,护工团210余人,积极分子几乎遍布各分局车间”^②。

同时,中共江苏省委鉴于曾有巨大威望的上海总工会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活动下已无法公开活动,难以继续有效地团结、领导多数基层工会和群众,便于1929年6月18日新建了上海工会联合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海总工会原有的艰难处境,使得群众工作得以继续开展。建立不拘泥于名称和形式的群众组织,无疑是秘密工作环境下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第三,在发动群众日常斗争的策略方面,中共领导机关比较注意根据客观环境状况和群众的力量,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适合的要求,尽可能夺取斗争的胜利,为群众争得利益。如1929年5月,沪东老怡和纱厂资方为节约能源,取消工人中午蒸饭,工人只能吃冷饭,遂开展自发的怠工。时任沪东区委书记的刘少奇,即指示工人恰当地提出“恢复蒸饭”的口号,派代表与资方谈判,资方被迫同意恢复蒸饭,并答应不得开除怠工工人,这一斗争遂取得胜利,党的影响就此扩大。同年9月,同兴工厂的日本资方将工人吃饭休息的时间从每天半小时缩短

^① 《江苏省委通告第二号》(1929年2月9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497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4页。

到15分钟，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厂里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暗中商议后，决定发动罢工。时任沪东区委书记的何孟雄，了解情况后便指示要注意策略，以免碰硬，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工人遂决定将罢工改为深夜怠工。由于日本监工和工头深夜极少来车间，以便派人放哨，发现工头来车间就通知工人开车，工头一走再关车休息。这样怠工后资本家发现产量明显减少，又无能为力，最后不得不宣布收回减少休息时间的规定，斗争取得胜利。

实践证明，只要较为准确地把握了群众的利益诉求，切实地维护群众利益，就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而胜利的斗争，就能比较有效地消除部分群众的疑虑，从而团结更多的群众，提高党的威信，扩大党的影响。

（二）沉痛的教训

回顾和分析这一时期党的群众工作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党在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策略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失误，相比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而言，教训更为深刻。

1. 关于群众工作的目标和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群众工作的最大失误，就是不顾客观环境的变化，无视当时白色恐怖下群众的基本状况，不组织群众有秩序的退却，而是坚持城市中心的路线，一味地强调发动工人开展政治斗争，希望重现大革命时期工人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的辉煌，从而实现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中共中央认为，“上海是本党工作非常重要的地方，他的现状与地位，都必须本党能很坚苦的去执行认真准备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去认真准备群众暴动的基础，做成本党无产阶级的根据地”，“苏维埃中国的最终胜利，必定要以上海无产阶级的胜利来决定”。^①基于这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和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就不能从实际的力量对比出发，从而对整体的工作或具体的斗争，都规定了过高的目标或大而无当的内容。一切工作，都是以是否有利于直接的政治目标甚至暴动作为取舍的标准，有利于政治宣传

^① 《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1928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106页。

或暴动的工作就去做,还试图把所有的经济斗争都升级为政治斗争,而不体现政治内容的经济斗争则遭到贬损,基本拒绝通过经济斗争来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这种指导方针的结果,就是严重脱离群众,而脱离群众,必定导致一再遭受惨重损失。

实践证明,群众工作的指导思想至关重要。指导思想与客观状况要求有偏差,群众工作必然遭遇挫折。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基于群众的心理和需求,及时、合理调整每一时期的群众工作目标和指导思想。可惜,在“左”倾错误统治下,当时的上海地下党人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2. 关于组织群众的策略

大革命后期上海群众工作的实践已经表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必须寻找一种既善于隐蔽自己力量,又能有效凝聚群众的秘密斗争模式来开展城市群众工作。当时的上海地下党已开始进行初步的探索。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其统治的严密和镇压革命力量的残酷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北洋军阀。在这种环境中,探索建立有效的秘密工作模式更显必要。采取适当的形式来组织群众,是秘密斗争模式的重要内容。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长期统治,使得这一探索没有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坚持建立非法的、秘密的、关门主义的、政治色彩鲜明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既无法公开活动,又不能吸引和团结群众,明显不适应当时严重的白色环境,自然难以生存和发展。

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工人中的群众组织以赤色工会为主,这是一个存在着严重关门主义倾向的组织,带有极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实际上也以政治活动为主。这样的“群众”组织,对于多数群众没有吸引力,因而并不能真正起到团结、凝聚广大工人群众的预期作用。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其他群众组织,也存在着同样的关门主义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由于实行消极的抵抗政策而遭遇了严重的统治危机,社会上各种自发组织曾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上海地下党也乘机领导建立了一批公开的救亡组织。但由于“左”倾分子的错误领

导，这些群众组织都被强行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因而人数始终不能有很大发展，还动辄被查封。如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成立的“上海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最初以合法的抗日团体面貌出现，刘少奇为该会起草章程，规定“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之完全独立与解放，增进工人本身利益为宗旨”。这个表述比较符合当时抗日环境和工人的要求，得到了群众拥护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有四十多个工会参加。但临时中央却认为章程调子太低，没有强调“武装工人、组织总罢工及组织群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政治运动”，是“右倾机会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点，逼迫刘少奇检查反省。^①最后，“工反会”因组织飞行集会而暴露政治面目，失去了合法地位，于同年3月下旬就被工部局捕房查封。

基层党员建立的灰色组织，如兄弟团、姊妹团、体育会、互助社等，党的领导机关也一味地强调要将这些组织尽可能向赤色工会转化，使其成员尽可能加入赤色工会。结果这些组织失去了其特有的联系不同群众的功能，同样沦为狭隘的秘密政治组织，失去了对普通群众的吸引力。

实践证明，群众组织应该基于群众的利益需求，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应多样化而非单一化。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应该尽量采用合法形式、隐蔽自己的政治背景，以最大限度地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3.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

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斗争，大多不是基于群众的切身利益需求，不是从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实际生活中提出群众斗争的目标和口号，而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把各种政治斗争的要求强加给群众，因而很难获得群众的支持。特别是飞行集会、游行示威之类并无多少实质意义的街头斗争，更不能被群众所接受。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得不采取种种自上而下、强迫命令的方式去动员群众，甚至动用“红色恐怖”的武力去胁迫群众。结果，即使斗争开展起来，也因缺乏群众基础而不能持久，反而使党失去群众的尊重。

^① 转引自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8页。

由于受到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指挥具体的群众斗争时，也很少注意考虑群众的情绪与风险，讲究技巧，进退有度，张弛得当，而往往是一味地蛮干，有进无退，拒绝妥协，拒绝仲裁、调解。同时，也严重缺乏统一战线观念，片面狭隘，对异己力量一概采取排斥甚至攻击，结果不仅失去社会其他力量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也不能获得工人群众广泛的支持，孤立了自己。即使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党在组织抗日团体、开展救亡斗争时，仍然采取唯我独尊的孤家寡人态度，拒绝与其他团体合作，并坚持加紧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和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甚至在一二八抗战结束时发动了一次冒险的起义。这种做法，使党在政治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实践证明，引导群众斗争，必须基于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需求，尊重他们的情绪。在工作方法上，应当是尽量采取启发、引导、教育的方式，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自觉行动，而绝对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甚至武力威胁的粗暴方式；群众斗争形式应当多样、灵活，并讲究指挥斗争的策略，注意运用统一战线的政策，尽可能争取斗争的胜利，避免群众的损失，以保护群众的积极性。

显然，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地下党未能探索出一套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大革命时期党在上海积累起来的群众基础丧失殆尽，党自身的力量也受到严重摧残，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忘却的沉重教训。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

一、历史背景

(一)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抗战时期的政治环境

1935年秋,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继续对日妥协,拟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放弃华北主权。在空前的民族危机前,北平爱国学生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发起一二九运动,就此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同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公开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迅速兴起了救国运动。1936年“一二八”四周年时,上海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同年5月29日和5月31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先后在上海成立。上海开始成为全国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在各界救国会的组织下,上海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一二八”、“三八”、“五卅”、“九一八”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鲁迅出殡等大型街头活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党当局为阻挠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于1936年11月23日悍然逮捕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位著名爱国人士。蒋介石本想通过逮捕救国会七领袖,扑灭救亡运动的烈火,结果却适得其反,救亡运动更加广泛地得到了国内各阶层,甚至国民党内部抗日人士以及世界进步阵营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正如宋庆龄在一份声明中

指出的那样：“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已经被捕了，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当局的倒行逆施只能“更引起中国人民反日的忿怒和爱国的热诚”。^①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巨浪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争取下，发动西安事变，用“兵谏”的办法，逼蒋介石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开始了全面抗战。接着，壮烈的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抗日战争重要的战场。同年11月下旬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后，由英美势力主导的租界因在中日之间持所谓的“中立”态度，成为日伪势力尚不能直接控制的“孤岛”。爱国民众和坚持抗战的各种政治力量利用这个特殊的空间，继续开展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斗争。如组织各种抗日集会、示威活动，显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在新闻、出版、文化、教育领域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教育鼓舞广大群众；为大后方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人员、物质和提供情报；抵制日伪“以战养战”的阴谋等。

但租界当局所谓的“中立”态度实际上是相当软弱的。一方面，他们要竭力维持其原来的殖民统治秩序，同占领着周边地区，并力图渗入租界事务的日伪势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敢同日伪势力直接对抗，总是屈服于日伪的淫威，试图以压制人民的抗日运动来取得日伪的某种谅解。因而，日伪势力在租界中相当猖獗，特务、奸细到处活动，恫吓、绑架、暗杀抗日志士的恐怖事件层出不穷。同时，国共两党执行不同的抗战路线，对如何动员人民和如何打击敌人，有着大相径庭的主张，并都想尽量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这就使得孤岛的政治环境呈现出极其复杂而且险恶的特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上海进入了全面沦陷的最黑暗时期。在日伪的残暴统治下，人民丧失了一切政治权利，没有任何发表爱国言论和开展爱国活动的自由。军警特务横行霸道，不但可以随意

^① 《救亡情报》第28期。

逮捕、杀害任何居民，还经常以搜捕抗日分子为由，把某些街区长时间地封锁起来。由于日军疯狂的掠夺搜刮，整个城市经济一片萧条，大批工厂关闭，大量工人失业，粮食等基本生活物资高度匮乏，人民生活极其困难。但是，上海人民并没有屈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一直坚持在上海周边地区活动，在人民的支持和配合下，给日伪以不断的打击。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工作者，在中共中央和上级的正确领导下，始终站在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采取各种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策略，坚持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工作，积聚力量，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转变

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也是党的白区工作方针转折的起点。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①这说明中央已开始认识到白区的群众工作中存在严重的缺点，必须坚决改变。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关门主义倾向，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这为党的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指明了方向。党的白区工作由此进入恢复发展的阶段。毛齐华回忆说：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召开的第二天，毛泽东和他谈过一次话，内容就是关于党的白区工作。毛泽东在了解了上海党组织遭受破坏和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后指出：在城市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轻举妄动是不行的。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不能轻举妄动，要作长期埋伏，等待时机。斗争要讲究策略，要“有理，有利，有节”，要注意积蓄力量，斗争要适可而止。^②

1936年，中共中央派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工作。为了消除过去“左”

^①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1935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

^② 毛齐华：《毛泽东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一次谈话》，《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2期。

倾错误在群众工作中的恶劣影响,刘少奇对党的白区群众工作的基本方针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于1936年4月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系统地批判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同月,他又写了《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正确地阐明了白区工人运动的基本方针。刘少奇在这两篇文章中,明确指出:“我党目前在中心城市与产业中心的工作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目前还不是革命与反革命决定斗争胜负的时候,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情况下,应当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①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利用一切机会来保存、巩固并扩大党在企业中的组织。他特别强调“为着争取群众,创立和积蓄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领导这些斗争必须从争取胜利(即使是最小的胜利)的观点出发。要使用一切方法争取这些斗争之具体要求的胜利。”^②

为了总结十年内战期间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推动党的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中共中央在1937年5月召开了白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党的白区群众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党的群众工作的意义

会议认为,要争取革命胜利,党必须领导群众“在斗争中去准备”:斗争才能锻炼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加强他们的组织力量;在斗争中,群众才会认识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在斗争中,群众才会感觉到团结自己与组织自己的必要,学会如何向敌人进攻以战胜敌人,如何退却与防御,以保存自己,也只有在实际斗争中,他们才会了解共产党。对于群众,单靠宣传鼓动是不够的,他们需要自己的政治经验^③。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3页。

2. 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

张闻天指出，在党的白区工作中，首要的任务便是“有自己的独立的秘密的组织，而同时又需要在群众中进行公开的活动”，“必须清楚的分别党内工作方法与众工作方法的根本不同”，只有这样，“才能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划分清楚，不相混淆，并且把它们正确的联系起来”，才能避免秘密组织与公开组织的塌台破坏。同时“共产党员应该决然取消那些最少数的先进的秘密的群众组织，如像共产主义青年团、赤色工会、社联、左联等团体”，而进入到各种公开的、半公开的群众团体中去进行抗日救国活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走进群众之中去，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条件。^①刘少奇进一步指出，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实际上就是秘密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②，即“群众工作应当是公开进行的（虽然有时只能半公开进行），而党内工作则应当秘密地来进行（如有可能也应当部分地公开地进行）”，“党内工作的方法，绝不能拿到群众中去使用”。^③

3. 关于白区工作中的斗争策略

第一，要善于利用公开存在的团体与组织，开展群众工作。这包括群众自己组织的各种团体，如兄弟会、姊妹团、互助会、合作社、同乡会等，也可以包括官办的各种团体。刘少奇指出：“只要环境允许，我们就应当尽可能地采用合法的公开的方式去进行工作。秘密的党的工作没有全部公开进行的可能，只能部分地公开进行。我们应当利用这种部分公开的可能去工作，哪怕是一点半点的公开机会都是宝贵的。能够公开办一个补习学校，组织一个灰色团体，出版一个灰色杂志，我们都必须去利用。”^④

第二，秘密的革命团体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如形势许可，这种团体可以转变为公开或半公开，以获得比较长久的存在与发展；如形势不利，则应从一时的公开转向半公开或秘密。总之，革命团体是否公开，

^① 此处及下段引文均见《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172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③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取决于群众本身的力量、当时革命的形势、斗争的方向是否转变。^①

第三,党必须重视领导工人群众日常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并且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从争取胜利(即使是最小的胜利)的观点出发,要使用一切方法争取这些斗争之具体要求的胜利”。为了争取斗争的胜利,“对于国民党的‘调解’与‘仲裁’,在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完全拒绝”,在某种情形下应该加以利用。当继续延长斗争对工人不利时,“应该在某种相当条件下,‘适可而止’地暂时停止战斗”,“对于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②

这些论述和原则,来自实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并具有极其强烈的针对性,为上海地下党基层组织的重建及抗战时期群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白区党代表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派遣刘晓赴上海主持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分别接见刘晓,针对上海工作的实际情况做出了重要指示。张闻天指出: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群众化,要使群众运动自然而然地形成,要警惕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余,不要去搞什么关门主义。^③毛泽东则强调,中国革命是长期的,上海基层党组织既要开展群众工作,又要注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打算,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地下工作也要善于积蓄力量,不能浪费力量。要不浪费力量,就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和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还要注意秘密工作。群众运动要有真正的群众参加,不能光是只有左派参加。秘密工作不是关在房子里,关在机关里,而是要隐蔽在群众里面”,“开展工作,不在乎追求参加的群众的数量多,而要稳扎稳打,逐步提高”,强调“具体工作怎么做,一定要由你们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决定”。^④

周恩来也对上海党组织的群众工作做出了具体指示:第一,群众抗日情绪是高涨的,国民党的政策是被迫敷衍群众,我们要依靠群众的力

^① 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905—906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③④}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辑。

量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把抗战变成真正的抗战；第二，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第三，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第四，要充分利用上层的合法关系，联系广泛的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第五，搞群众工作，不能离开隐蔽的原则，要注意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①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总结已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开展群众工作的具体理论及策略方面已经日臻成熟，从而为各地群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上海作为当时的救亡运动中心，群众工作的开展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格外关注。可以说，上海地区群众工作开展的效果，将很大程度上检验着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群众工作理论及策略的正确与否。

（三）上海党组织的重建与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前，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重要的政治中心，拥有 80 万产业工人^②，把上海地区几十万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对争取抗战的胜利具有重大的作用。同时，抗日战争的民族解放战争性质，也要求党把群众工作的对象由原先比较单一的以工人群众为主，扩大到更多种类的下层群众。

基层党组织是群众工作开展的重要载体，但在抗战前夕上海的基层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所以要想领导群众运动，前提之一便是要重建和发展上海党的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总体来说，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大体上分为五个阶段。

1936 年 4 月到 1937 年 7 月全面抗战爆发为上海党组织重建的准备阶段。

1936 年 4 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赴上海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了解上海各个系统地下党员的情况，为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做准备。1936 年 10 月间，中共中央设立上海办事处，以整理各系统的党组织和领导文化界及救国会中党的工作。由于前一阶段的白色恐怖，上

①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1979 年第 1 辑。

②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91 年版，第 55 页。

海地下党的情况比较复杂,因而中共中央指示在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时,应该选择真正够得上党员条件的革命者,经过审查,承认他是党员,重建党的组织,党员不宜多,但是要可靠,要比较隐蔽,不要过分暴露。^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了“个别审查,个别确认其党籍”的重建原则。根据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统计,1936年底,上海还剩党员约200人。^②到1937年5月,上海共有党员160人左右。^③

1937年6月下旬,刘晓到达上海全面主持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成立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刘晓在了解了党员的情况之后,立即着手重建组织。^④

1937年7月到1937年12月是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重建的起步阶段。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于7月15日发出《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各地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的,切实的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各地党部应立即派出适当人员出面,向当地党、政、军、警、学、商各界接洽,组织这类团体。……共产党员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的发起人,宣传者,组织者。”^⑤

上海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及上海的具体情况,决定把重建党组织与日益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设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和群众工作委员会以领导工人、职员、学生、妇女等各系统团体的抗日救亡运动。之后,“工委”、“群委”按各系统进行党员的审查和发展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联系或派出党员到各救亡团体和各系统中开展工作,待时机成熟后再在其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当时,各种救亡协会是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的一种特殊形式。救亡协会以公

^{①④} 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1期。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上海店员和职员运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201页。

^⑤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开的形式存在，便于少数基层党支部利用这个名义开展活动。党支部还把发展救亡协会会员作为发展党员的一种考察方式，即先将发现和培养的积极分子发展入会，进一步加以考察、了解，合格者即发展入党^①，然后根据条件成立党支部。

1937年11月上旬，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正式成立。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白区中心城市党组织“不以地区而以产业与职业划分工作”的有关指示精神，江苏省委决定上海不再按地区建立区委，而是按照系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实行垂直单线领导。省委先后设立了军事运动委员会、工人运动委员会、职员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等。

1938年到1939年上半年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快速发展阶段。

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不久，上海沦陷，租界的形势错综复杂。省委及时分析了上海的形势和特点，认为要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党的基层组织必须进行调整。所以省委于上海沦陷后作出了《关于上海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指出：“在工厂作坊、难民、农村、公司商行、学校、文化事业及市政机关，多要发展党的支部，作为领导各部门群众斗争的战斗单位，把工作重心放到支部中间去。”^②

根据省委指示，各系统党委对各级党支部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一是对已经建立支部或有党的点线活动的基层部门，要切实分析本单位群众工作状况，进一步制定发展新党员的计划；二是对没有党组织的重要工厂、企业、学校，指定党员利用招工、转学等途径，通过熟悉的社会关系、群众关系等各种办法去开辟工作阵地，争取在所有的重要部门中建立起基层党组织；三是基层支部中的每一个党员群众工作中，要物色、接近群众积极分子，团结一定数量的积极分子在自己的周围，通过一对一交朋友的办法，慎重考察其家庭情况、社会关系、本人的政治思想情况，推动他们在群众工作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使其加入党的组织中来。基层支部不仅要培养和吸收中青年积极分子，还要有计划、有

^①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63页。

^② 《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1934年12月29日），《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2辑。

重点地培养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老工人、技术熟练工人、中上层职员,通过长期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在他们达到党员标准后发展入党。

这种基层党建思想是正确的。不同阶层的人物吸收到党组织后,壮大了党的队伍,建立了一批新的党支部。根据1939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的统计,党员人数已从1938年3月的300人发展到2300人,其中上海市区党员1610人,外县党员760人,建立了基层支部169个。^①其中工委在76个重点企业和生产部门建立了党支部,有党员780人,从1938年秋开始,先后建立了交通工委、印刷工委、邮局工委、绸厂工委、沪西纱厂工委、沪西华商工委、沪东外商纱厂工委、沪东敌厂工委等产业工作委员会,之下又设立许多支部。^②其他系统如职委、学委等党员数量以及基层党组织都有大的发展。

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巩固阶段。

1939年下半年后,租界当局在欧战爆发和日本压力下步步退让,同时,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由全面进攻转向重点巩固占领区,国民党的政策重心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国内存在着分裂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形势,为避免革命力量不必要的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9年8月15日做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中心任务”^③。10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和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发出《关于精干和隐蔽党的组织问题》专电,强调地处敌占区的上海党组织,其基本方向应该是长期埋头苦干,积蓄力量,所以,党的组织求精不求多,不应大量发展。为此目的,应该做到“重要企业中,只有必须发展者,可以发展一些,但决不求多,亦不求快。”“工厂支部只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8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0页。

要有八、九个党员，在现在条件下，已经足够。已有二三十党员之厂，必须设法分成彼此不联系的几个支部，而且不要成立总支委”等具体指示^①。

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随即做出整理、严密、巩固基层党组织的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采取如下组织措施：“除指定的支部或部门外，一律暂时停止发展，而以整理、严密、巩固与加强同志马列主义教育为主，使每一个支部都能变成隐蔽在生产群众中坚强而有战斗力的堡垒。”“各大支部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成几个独立而且不相联系的支部。”^②1940年3月，汪伪南京政权粉墨登台，日伪气焰嚣张，不断在上海租界扩张势力，集中力量向共产党进攻。1940年3月8日中共中央电示江苏省委，指出：“上海市的工作方针应该是小心谨慎的蓄积力量”。“所有工厂、学校、职员中的支部均以短小精干为原则，应集中在那些有决定意义的大工厂和学校中建立党的精干堡垒和群众组织。”同年5月4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并专门强调，这一方针也适用包括上海、南京等日本占领区的大中城市和乡村。^③这“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诀，也就是党的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

由于省委的组织调整措施，使得党的各级基层组织进一步严密、巩固，并深深隐蔽和埋伏在生产部门和人民群众之中，党的组织得到了掩护，力量也得到了壮大。

1941年到1945年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隐蔽阶段。

上海全面沦陷后，中共党组织面对的是日本法西斯的直接统治，地下组织只要稍有不慎和暴露，就会遭到残酷的打击和破坏。同时，由于工厂企业的大量关闭歇业和职工人数的减少，一些团体被迫停止活动

^① 《中央关于精干和隐蔽党的组织问题给东南局和刘晓的指示》（1939年10月7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0页。

^② 《江苏省委对上海党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决定》（1939年10月22日），《党的生活》第8期。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757页。

或缩小规模,加上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撤往根据地,地下党人数一度减少,基层党组织的阵地缩小,开展活动的难度增大。根据上海各基层组织面临的新环境,中共中央于1942年2月发出《关于上海失业问题的指示》,指示上海党组织要“坚持长期隐蔽政策,用一切方法保持有生力量”,“说服一部分留沪的技术工人,应到敌方登记,转移到敌伪产业中去,以便利用合法地位,隐蔽自己,打下长期埋伏的根基”^①。同年7月,发出《关于取消秘密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指出秘密党内必须取消省委特委的组织,只保留县委,如某些县委也不能保留者,则只保留支部,县委及支部要长期的独立工作,支部每个党员的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②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江苏省委提出了“更深入精干隐蔽”的方针,要求各党支部把各项工作从适应于租界孤岛的环境,转变到适应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环境。根据“更深入精干隐蔽”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江苏省委机关撤离上海,全部转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江苏省委,在中共中央华中局下设立敌区工作部,继续领导上海和江苏重要城市的地下党工作。同年4月,华中局敌区工作部成立(翌年6月改称“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上海的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和警察特支6个组织系统,各在其具备长期隐蔽条件的留沪负责人领导下独立开展工作。

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根据新环境以及省委指示按照“勤学、勤业、交朋友”的工作方式,进行了组织调整和力量上的统筹安排。具体包括:在组织上,各基层党组织要减少联系,实行精干政策,建立预备关系,加强各级支部的独立性;在开辟新阵地时,各党支部要适度收缩工作阵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固定的特别是市政工业和敌伪军事工业中去;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各基层党组织应以生活福利、社会公益活动为主;从面上的、社会的群众活动,转变为深入基层进行

^① 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5—1949.5)》,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560页。

埋头苦干。

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三勤政策，使“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得以具体落实，地下党组织在敌人直接统治下，站稳脚跟，保存了力量，并且在斗争中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上海共有共产党员2623人（未含教委、文委系统的党员数，加上两委人数，当在2850左右）。其中工委995人，职委768人，学委784人，警察130人。^①上海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发展和健全，建立6个系统的党委，下属33个产业或地区党委，160余个基层支部。郊县党员达600余人，有7个县级工委。^②

抗战时期，上海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的开展以及策略的使用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同时，抗战时期上海基层党组织的重建方式，既决定了群众工作策略采用的必要性，也为群众工作的开展及策略的使用提供了可能性。

二、抗战时期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党组织所处的政治环境极其复杂，大体经历了淞沪会战、孤岛和全面沦陷三个阶段。要想让党的主张掌握群众，并转化成群众的实践，基层党组织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就必须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及时采用恰当的策略。这将直接决定党的群众工作的成败。毛泽东早在1934年就提出了开展群众工作要注意运用策略的观点，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③“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

①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60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能否实现”。^①

从前述上海基层党组织建立的历程可以看出，上海党组织在抗战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本身就是群众工作成功的重要标志。抗战时期，上海的基层党组织在漫长而艰苦的奋斗中，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策略。

（一）共产党员的“三化”、“三勤”

在缺乏民主政治资源的条件下进行社会革命，扎根社会不仅是党的组织赖以存在的重要方法，也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策略。^②扎根社会的关键，就是要求党员能够在外在的形象上和内在的感情上融入群众之中。

抗战时期，中共江苏省委对这一重要的工作策略进行了发展和深化，要求党员实行“三化”和“三勤”。“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省委认为，党员通过“三化”、“三勤”，就能以普通人的面貌接近群众，进而能够在“内在的感情上融入工农群众”，从而完成群众工作的第一步——接近、了解群众。这也就是刘少奇所要求的，“以群众中一员的资格，在群众中出现”，“而不是以共产党员或者自命为领袖的资格去命令和指挥群众。”^③党员通过“三勤”、“三化”，有的深入国民党政府、军队、党务、财务经济部门；有的深入教育界，掌握中小学领导权；有的活跃在文化界和科技界；有的甚至打入帮会组织，当上头目，从而开辟了群众工作的广阔阵地。

“三勤”、“三化”这一策略的得出，也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党员过着领取组织津贴的机关化生活，并不与群众共同生活，这也是他们难以切实融合到下层群众中，且机关一遭破坏较多党员被抓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化”、“三勤”是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扎根社会、深入群众的基本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5页。

^② 张亿军：《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基本经验探析》，《上海党史与党建》2004年第7期。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策略原则。它的具体要求有三个方面。

1. 深入基层，掌握生产、生活及学习上的本领

地下党员在以普通群众的面貌进入社会基层后，在工厂企业里，必须是兢兢业业、精通技艺的生产能手、业务骨干；在学校里，应该是读书用功、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钻研教学、关爱学生的好教师；在各种岗位上，都是忠于职守、诚恳待人的正派人。这样，深入基层的党员，既能巩固自己的职业地位，同时也因为自己的先进性，表现突出而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欢迎。在此基础上，通过多种方式广交朋友，团结积极分子，发展进步力量，使自己真正融入群众中。如新本女中党支部根据“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在课余时间，主动找同学一起温习功课，打球、唱歌；对低年级的同学，讲故事、做游戏等；对思想进步的同学，就秘密地向她们介绍进步书籍，例如《新生代》、《西行漫记》等，并开展读书会和议论时事看法的交流活动。由于党员和积极分子读书刻苦，成绩优秀，乐于助人，而且在文娱、体育活动上各人都有一手，同学都愿意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交知心朋友。这样，在党支部的周围，就一层一层地团结了一大批群众。^①内外棉一厂、二厂原来没有党的力量，地下党员范小凤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进入内外棉一厂工作。她很快以娴熟的技术、热诚待人的态度，取得群众的信赖。随后党组织陆续派几名党员打入该厂，与范小凤一起成立党支部。支部成立后，党员积极开展活动，与职工交朋友，到女工家串门，聊家常，帮做家务，从而使每个党员的身边都团结了一批群众。^②党员的积极活动，一方面把群众聚合在党组织周围，更重要的是党组织实现了扎根于群众土壤之中的目的，每个党员也成为与群众紧密联系并善于影响、推动他们的群众领袖。

2. 做好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关键性人物的工作，起以点带面的作用
基层党员在做好普通群众工作的同时，如能做好群众中关键性、有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公司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3 页。

^②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91 年版，第 117—118 页。

影响人物的工作,就能起到团结一个人从而带动一批人的作用,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有利于扩大和加深党组织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对此,曾有文件指出:“支部须经常审查周围群众,从这当中选拔出哪些群众是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分子,哪些是次要分子等,以便得到好的发展。”^①如在江南造船所冷作间的老工人金龙山,讲江湖义气,在苏北籍工人中较有影响,在他周围有许多群众。该所的党支部以金龙山为突破口,同他交朋友,经常对他进行思想工作,在党员的耐心教导下,他的思想认识明显提高,党组织看到金龙山的显著变化后,吸收他入党。此后在他的带动和帮助下,一大批积极分子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组织。而这些党员又通过活动带动和影响了一大批群众,就这样从发展一名群众党员开始,以点带面,党不仅实现了接近群众、扎根群众的目的,同时也扩大了群众工作的覆盖面。实践证明:做好了老工人、老职员等有群众威望的关键性人物的工作,就是架起了接近、团结广大中间群众的桥梁,更多的群众会向进步力量靠拢,党员的朋友会更多,工作会更加扩大。

3. 运用群众社会生活的习惯形式乃至传统形式团结群众,减少接近群众的阻力

虽然“革命”是一场翻天覆地、打破传统的变化,但历史上没有一场革命是可以完全摆脱传统而能成功的。成功的革命往往善于利用传统中最受人欢迎的习俗来赢得群众支持。这些传统习俗,早已深入人心,所以它们代表了浓厚的民族精神,更容易唤起民众情绪。^②正如古希腊诗人平德尔所言:“惯例和习俗是一切的主宰。”^③在近代中国,团结互助是城市移民的传统。这在上海尤其是下层社会表现得相当突出,工人中各种同乡、帮派组织的盛行。上海全面沦陷以后,民众直接处于日本人的统治之下,不仅生活上朝不保夕,生命也备受威胁,更有强烈的互助愿望。据此,活跃在基层的共产党员,为了接近群众、扎根群众,常常通过加入或发起组织慈善团体或带有传统封建色彩的、宗教色彩的

① 据《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页。

② 洪长泰:《生与死的节日:中共的通俗政治文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下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913—914页。

③ G. H.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4页。

同乡会、结拜兄弟姐妹、基督团契等群众所熟悉的形式来接近群众，团结群众。在这些组织中，党员及骨干以普通参加者的身份在其中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从而使团体在群众中逐步树立起威信，地下党员也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从而实现了深入群众，扎根群众的目的。如南洋中学党员费志融利用社会传统习惯，以结拜“十兄弟”的形式，深入同学之中，与同学经常在一起交流进步书籍，集体看话剧，并以此为核心，开展了全班的群众工作。^①

总体来说，抗战时期党员通过“三勤”、“三化”在社会扎根，一方面使党员能够在国统区隐蔽下来，保证了上海党组织在日军进占租界之后未遭到重大破坏，并且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市区中共党员已发展到二千八百余人，在他们周围团结了大批积极分子；另一方面则可以使党员利用可能获得的社会资源如公开的社会职业、广泛的交际网等，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开展党的群众工作。

（二）采用各种形式组织群众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党争取群众积蓄力量的成效，主要表现为党对群众的组织程度，只有通过合适的组织形式，才能把分散的群众团结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在组织群众的具体方式上往往根据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而变化，但注重公开合法是始终如一的指导性策略。

1. 公开合法：组织群众的基本方针

抗战爆发初期，上海地下党利用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承认群众可以公开合法进行抗日活动的有利条件，主要采用组织和参与各界救亡协会、抗战后援会、战地服务团、慰劳队、运输担架队、募捐队、义勇军、侦探队、抵制日货十人团、国防文艺团体等合法方式来广泛地组织群众。

上海沦陷后，原有的具有鲜明抗日色彩的组织名称已不再适合险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93页。

恶的形势,中共江苏省委发出《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要求党在组织群众的方式与形式上,实行转变。^①

首先,对于那些原来由党领导的抗日团体,一般均改变其组织形式与名义,争取其实质的存在,以依托这些组织去继续团结群众。而那些已经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的抗日团体,在组织机构严密化、灵活化的前提下,尽量维持原有的名称,并努力吸收更多的抗日积极分子,使之成为更坚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②

其次,对于散布于各地生产部门以及各群众集合场所的抗日积极分子及其自发建立的抗日小组织,地下党设法用各种名义、方式将之联合起来,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与领导。当时,这种积极分子与小组织为数众多,地下党通过争取他们,帮助他们去组织更广大的群众,从而建立起一批新的抗日团体。^③

第三,对于国民党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党坚持群众的立场与民主的原则进行下列工作:在同一产业部门,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与国民党的群众组织进行工作上的合作,以推动它,并扩大党在他们中的政治影响;在不被群众信任的国民党领导的社会团体中,党则发动群众对之进行批评或争取实行民主的改造,并说服其中一部分较好的干部与群众,实行工作的转变;在没有党组织的时候,则发动进步群众去参加,以充实、改善其工作。^④

第四,根据各阶层群众切身的要求和痛苦,用各种合法的形式与方式,大量建立以“友谊的、经济的、学术的、娱乐的、互助的、地方性质的、带封建性质的,以至宗教的形态”等当局法令和社会习惯许可的各种公开的、不带政治色彩的群众组织,以把群众最大程度地组织起来。^⑤这是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群众时最重要的策略创新。根据这一策略,上海党组织成功地开辟了群众工作新局面。职委系统运用业余联谊会、兴办补习学校的形式,成立了多个“联络感情,研究学术”或“提倡

①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70页。

②③④⑤ 《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1937年12月29日),《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2辑。

正当娱乐，改善业余生活，推行福利事业”等不带政治色彩的社团，将职员组织起来。如诞生于1938年2月20日的益友社，尽管开创时仅四十余人，活动场所狭小，但以“提倡正当娱乐，改善业余生活”为宗旨，办起了剧团、图书馆、诊疗所、理发室，尤其是花大力气开办业余补习学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店员入社，至1940年6月，社员达4000人之众。^①这一方法随即在工委系统得到推广。工委的党组织兴办了一批工人识字班，加强了在工人夜校中的活动，并在邮电、公共交通等部门广泛建立了储蓄会、福利会、互助会、消费合作社、同乡会、兄弟会、姐妹会等各种公开合法的社团，把广大群众包括大量中间的落后的群众直接、间接地团结在党的周围。^②学校中的党员则通过班会、级会、学会、团契、联谊会及有共同兴趣的爱好者集结起来的组织，如读书会、女同学会、参观团等合法的组织方式来团结同学。

可见，抗战时期，上海基层党组织在组织群众方面采用的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抓住团体的合法存在。因为党领导的团体如果不能合法存在，就不能公开号召活动，而有可以公开合法存在的团体，群众工作的局面就可以打开。

2. 组织群众的具体策略

要把群众组织起来，除了共产党员必须坚持扎根群众、了解群众外，还必须采用正确的组织策略。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具有创造性，并富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1) 争取中上层人士参加群众组织，以增加对群众的吸引力，并减少可能的政治或社会的阻力

地下党员在工作中认识到：争取让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参加群众组织或担任某一组织的领导者，可以使这些组织较容易取得公开合法的地位和当局对其活动的许可，还可以消除职工参加这些团体的顾虑。

^①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5—376页。

^②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62—64、77—78页。

职业界救亡协会的理事许德良即回顾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职业界救国会改组为职业界救亡协会之前，原来职业界救国会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即在本人原来所属团体中进行活动。一是发动各团体会员中与上层人士有交往者，设法与之联系，动员他们参加团体担任某种职务，如名誉理事、理事等；二是更广泛地发动群众参加团体为会员。这样做，一是有利于团体的公开，因为租界当局重视有社会地位和影响的人士，有他们参加团体才能得到掩护，便于开展活动。二是易于吸收会员扩大组织。反过来，会员人数越多，也越能吸收上层人士参加，有利于团结救亡活动。^①争取中上层人士最常见的方式是让社会名流、资本家担任团体的领导职务或名誉职务，如洋行华联同乐会安排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董虞洽卿、袁履登、江一平和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负责人王一亭、闻兰亭担任名誉理事。上层人物的号召力和他们所带来的保护色彩使联谊会里的“中上层职员成倍地增加，团体成员数以千计，最大的团体，会员超过一万人”。抗战时期长期负责中共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陆志仁总结说，“有了这些上层人士的参加和赞助，团体的社会影响扩大了，活动经费有了保障，也减少了下层职工参加社会活动的阻力，增加了团体的‘合法性’”。^②

(2) 根据群众的不同需求，分门别类地组织群众

要使群众组织具有实效性，真正起到凝聚、团结和教育群众的作用，必须切实根据群众的需求，按照分门别类的原则建立组织。“应着重于根据该生产单位中群众不同的环境、情绪、兴趣、生活习惯与政治觉悟，来组织各种不同形式的、带有广泛群众性的组织”。^③因为只有把群众组织在他们有共同旨趣的团体之中，他们才会有团体的归属感。如英汽售票员地下党支部成立后，根据大多数售票员家境贫困的情况，先后组织了友谊储金会、工信储金会和同济会，取同舟共济之意，参加者二三百人，规模较大；支部还结合青年工人丰富精神生活的要求，以

① 许德良：《抗战前期上海职业界的统战工作》，《统战工作史料选辑》1989年第8册。

② 《陆志仁文集》，陆志仁纪念文集编辑组1993年印，第122、282页。

③ 《真理》，《革命报刊资料丛编》第1辑，第105—108页。

捐书、捐款的形式，办起了小型图书馆，创办英语补习班，成立球队、演剧组等各种文体社团，既丰富了群众业余生活，又在寓教于乐中启发和影响了工人群众。通过这些多样性的生活互助与文化娱乐等合法社团形式，这个支部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把英汽的二千多名职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而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①

(3) 抓住重点部门，推动其他组织的建立

1939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印发的《支部工作纲要》指出，支部要做好群众的组织工作，首先要“抓住工作中心，无论发展党的或群众的组织，都是要抓住中心，支部不仅看发展对象是什么工厂，并且还要根据该厂各部门重要性及其发展情况，决定向哪个部门加紧发展”。^②这一策略和党为接近群众而采取的与群众中的关键性人物交朋友策略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做好某一关键部门的群众组织工作，就能够带动相关其他部门的群众。抗战爆发后，上海经营出租汽车业务的公司有二百多家，从业人员三万余人，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云飞汽车公司、祥生汽车公司、泰来汽车公司和银色汽车公司四家公司。为了把他们组织起来，地下党选择以党员较多，群众基础较好的云飞汽车公司为突破口，成立合法组织——“上海云飞汽车公司司机联谊会”。联谊会成立后，祥生、泰来、银色等其他汽车公司的司机受到启发，在党的指导下纷纷成立了自己的组织。1938年底，四大公司的司机组织又成立了“四行联盟”。四行联盟成立后，一些中小出租汽车的司机也纷纷要求加入，逐渐形成了全市性的出租汽车司机组织，从而把多数司机集合在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之中。“四行联盟”的建立，提高了汽车司机的地位，老板对司机的态度有了一些转变，随便罚款、开除的现象明显减少，与司机员工的矛盾有所缓和，因而对更多的群众产生了吸引力，加入的工人进一步增多。^③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2页。

^② 据《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出租汽车、人力车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7页。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群众组织体系,呈现出动态性。即在不同的阶段,变换不同的形式。活跃在这一组织体系中,直接引领广大群众的就是基层的党支部、党小组乃至单兵作战的共产党员。实践证明,这种公开合法、因地制宜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对于动员和组织群众具有重大作用。1937年群委的工作报告称:“8月底上海群众抗日团体逐渐由零乱走向统一,党的群众工作初步打开了局面。”^①从1938年春到1939年上半年,工委系统通过基层工厂组织生活互助性质的公开社团和创办工人劳动夜校等形式,在76个基层工厂建立了党组织,党领导下有组织的工人群众有2万人;^②据地下党领导人陆志仁提供的数字,战时上海的店职员达到27万左右,而在联谊会和补习学校下的职员就有5万人左右,约占四分之一,^③能将非常分散的各行各业职员如此广泛地联系组织起来,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是罕见的;学委通过学协及各校群众团体在全市90多所大中学校开辟了群众工作基地^④,基督教学校学委通过上海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及其相关学校的团体,在25所学校开展学生工作。

(三) 不拘一格的群众宣传工作

对广大群众进行有力的政治宣传,既能迅速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使党的主张深入人心,又能把他们基于切身利益或朴素感情的认识,升华为理性的政治觉悟,从而更加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听从党的号令,扩大党的政治基础和革命有生力量,也是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抗战时期,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群众进行抗日和反对汉奸教育,以“启发他们的民族思想、正义感(观)念和国格人格意识。”^⑤政治宣传是

^① 《群委工作报告》(1937年9月),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0页。

^② 《江苏工作报告》(1940年3月),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99页。

^③ 据萧小红:《抗战前后中共路线的转变与上海城市的社会团体》,《史林》2005年第1期。

^④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45页。

^⑤ 《关于新环境下上海组织工作的决定》(1937年12月29日),《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2辑。

群众获得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也是人们了解政治活动和政策的重要途径，“它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使得政治事迹引人注目”^①。通过有效的宣传工作，能增加群众对这些问题的关心，并强化他们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感。

1. 宣传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方式

中共江苏省委曾经就“支部怎样做宣传工作”，对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宣传工作做过专门的指示，其要点为：“确定把握着支部宣传对象，支部要切实了解，观察群众的生活与其对抗战认识的信心，情绪倾向，文化水准等”；“正确规定宣传目的，支部任务，观察群众情绪，规定宣传目的，或是提高抗战情绪增加抗战的认识，坚强抗战胜利的信心，或是了解和和平倾向，粉碎疑虑心理，又或是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等”；“配合周围实际情形，具体规定宣传内容，如扼要报告战争消息，重要政治事件解释和主张，打击汉奸荒谬言论，宣传群众当兵，群众生活如何改善等”；“适当的分配同志去宣传，分配善于讲话的同志到有组织的群众中会议上、公共场所去宣传。或讲演，分散同志在无组织的群众中进行个别宣传，推动被宣传的群众用各种方式宣传”等等。^②

当然，宣传效果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宣传的内容是否正确合理，宣传的形式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十年内战时期，党在上海领导的文化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文化战线的党员和左翼文化工作者有着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文协）首先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界团体。但是“有90%以上的成员是党领导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和救国会领导下的爱国青年”，^③共产党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党通过文协中的秘密支部，利用文协的合法地位以及广泛的社会资源，以各种形式开展声势浩大的救亡宣传。总的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对民众的宣传

①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② 据《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98—599页。

③ 夏衍：《周恩来对演剧队的关怀》，《八千里路云和月，演剧九队回忆录》（内部本），中共上海市文化局党史征集领导小组编印，第2页。

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

口头宣传。这是地下党在抗战时期采用的常见宣传形式。它多是以面对面的方式出现,具体有以下几种类型:演讲、游说、讲座报告、座谈讨论。它是一种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宣传形式。而个别谈心和对话活动,则是一种更为深入细致的宣传方法。它虽然只是向一个人或少数人进行的宣传工作,但它能起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沟通民众内部关系,从而起到影响一大片的作用。当时,许多上海警察的老家在山东、安徽的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解放区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口头流传故事很多,地下党就有计划地将之宣传出来,并用流行语的形式,向数量颇大的原籍山东、安徽的伪警察提出了含蓄的警告:“上海不见家里见,今天不见明天见”,意思是你做了坏事,总会在你家乡或今后进行清算。这种流行语,确实给伪警察以很大的震慑,也给人民增强了信心。^①

文字宣传。这可以使宣传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充分的发挥,是宣传工作的基本形式。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报纸、图书、期刊。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领导和推动创办了《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救亡周刊》、《救亡漫画》等大量救亡报刊。孤岛时期,《每日译报》、《文汇报》、《导报》等大批出版发行机构,先后出版了《鲁迅全集》、《西行漫记》、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以及大量进步文学读物,有效地建立起党的舆论阵地,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和提高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威望提供了重要的媒介。(2)决议、指示、文件。这些形式同社会现实和群众利益联系得比较直接,相当明确地告诉群众应该提倡什么、要求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具有文字简练、言简意赅的优点,具有较好的宣传效果。如抗战初期地下党到马路、里弄、学校、工厂等处宣传,散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而使民众对党的全民抗战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很好的了解。(3)黑板报、壁报、简报。这种形式短小精悍,民众可以在工作

^① 刘宁一:《历史回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娱乐和休息时间进行阅读，也可以发挥宣传教育的作用。

(2) 文艺形式的宣传

文艺形式的宣传是一种通过文学艺术的感染力进行的宣传。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十分注意避免生硬的政治说教，而是强调通过文艺形式进行宣传，以贴近群众，提高宣传的有效性。一个香港学者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深明宣传的力量，在争取民心方面，往往能从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下手，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把新的政治内容注入受欢迎的艺术形式中，吸引观众，赢得民心。^①因为通俗性的大众艺术如杂文、漫画、戏剧、歌曲等，能极大地调动起群众的感情共鸣，是提高群体凝聚力的重要手段，能激发群众强烈的义愤^②。为此，上海地下党主要通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富有感染力的戏剧、歌咏、诵诗表演、文艺通讯运动等文化活动，体现抗战的时代主题，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艺术的感染力中高扬起抗日救亡的爱国意识。如当时的一些剧团经常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难民生活》、《往哪里逃》、《大家一条心》、《报仇》、《再上前线》、《省一粒子弹》等等有抗日内容的剧目，激发群众抗日救亡的热情。有一些街头剧往往是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有的群众还作为剧中的角色参加演出，加强了演员与观众、台上与台下、剧中与剧外的心灵碰撞和感情交流，效果逼真，形象感人，有效地渲染了抗战的气氛。^③除了剧团演出外，歌咏活动也非常的普遍，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一些工厂、学校等基层部门纷纷成立了歌咏队进行抗日宣传，《五月鲜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长城谣》等都是群众最喜爱的歌曲。一些群众表示，唱起歌来往往使他们满怀激情，几乎忘了身处困境。

(3) 其他形式

展览。通过举办各种实物、图片等展览，吸引人们参观。这种宣传

^① 洪长泰：《生与死的节日：中共的通俗政治文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下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 年版，第 913 页。

^② 王海光：《旋转的历史——社会运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2 页。

^③ 朱敏彦、齐卫平：《上海抗战文化的发展与抗争》，《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5 页。

形式图文并茂,以事实说话,又比较含蓄,很受群众欢迎。如之江大学的商学会在1941年举办了中国经济地理展览会,宣传中国大好河山、丰富宝藏,既有地图图表,又有文字、模型,激励了同学们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

发传单标语。这种形式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宣传的内容、目的、任务,简单明了,使人一目了然。一个口号、一条标语,虽然寥寥数语,但它往往是一个观点、一条意见、一项主张,含有较大的信息量,利用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事例,来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通过工人夜校、读书会、读书小组等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教育,也是一种宣传方式。在抗战时期,工人夜校在宣传教育群众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如在孤岛时期,以各种形式创办的工人夜校不下二三百所,据不完全统计,将近六七千工人参加了夜校学习,^①而且上海各主要产业部门几乎都有工人夜校。一些工人通过夜校学习,既提高了文化,又提高了政治觉悟,成为党在基层单位的骨干力量和工运领袖。毛泽东曾经充分肯定了上海地下党举办职工夜校的做法,指出:“在敌伪统治地区,一个工厂办一所夜校,组织几百工人读书学文化、求进步,就等于办了一个工会。夜校工作值得提倡和推广,要继续办好它。”^②

2. 加强群众宣传工作的针对性

抗战时期的上海地下党特别注意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因为不同的群众在不同的时期,往往会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只能接受他们喜闻乐见和符合他们思想基础的内容,这就需要宣传工作加强针对性,因材施教。上海地下党宣传工作中的针对性,主要体现为“四个结合”。

(1) 结合现实开展宣传教育,激发群众的民族情感

党员在对基层群众进行宣传时,往往结合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上海的政治环境,民众的悲惨遭遇,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持久战路线,克服群众厌战情绪;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增强民众

^{①②}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06页。

抗战必胜的信心。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涌入大批难民，难民的主体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因而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对于党开辟群众工作有着重要作用。为加强难民教育，打入难民中的党员对难民进行了“谁养活谁”、“世界是工农造”、“人民是国家主人”等教育，启发难民的阶级觉悟。同时地下党在编写难民教育的教材时，常把难民自身的遭遇与日本的侵略联系在一起，如每当难民读到“家也烧了，东西当的当光、卖的卖光，几天尝不到饭的味道”，就联想到自己家破人亡的遭遇，忍不住声泪俱下，课文中“这都是东洋人害的！”写出了他们的心声。深入浅出的课文内容，通俗易懂的说理，激发了难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抗日到底的爱国激情。“参加新四军，打日本鬼子去”成了青年讨论的话题。^①地下党在难民中的宣传卓有成效。大批难民提高了政治觉悟，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难民委员会先后3次向皖南新四军输送了约一千二百余名青年，其中有党员八十余人；抽调党员、骨干约四五十人，赴浦东、青浦、嘉定和苏常太、苏北等地开辟抗日武装斗争；向上海市郊和苏南、苏中抗日游击区输送了二千余人。^②正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当中国民众“把对家庭的忠诚转化为对国家的忠诚，并下定决心，认为为国家而战是正当的时候，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生命的那种精神会使全世界感到惊讶”。^③

(2) 结合纪念日开展宣传活动，增强群众的自信心

利用纪念日来开展群众街头运动是上海地下党的传统做法。抗战时期，在租界孤岛开展以抗战为主题的这类活动，有一定的合法条件和强大的群众基础，因而地下党继续采用了这一做法，以振奋群众的抗日情绪。1937年，在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前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提出全市举行“精神国防运动”，地下党群委要求把“形式上的纪念变成扩大抗日救亡宣传”的实际行动。在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的当天，上海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8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3页。

^③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日记》，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地下党动员四十多个团体五千多人上街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奸淫烧杀的罪恶行径,并庄严宣誓:拥护政府,服从领袖,牺牲一切,抗战到底^①。宣传日使广大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抗日爱国教育,“宣传工作的效果超过前些年的任何一年”。^②是年纪念双十节时,文协、职协动员了三百五十多个宣传队和四十多个慰劳队上街宣传,上海抗敌后援会宣传股在事后的总结汇报中这样写道:“双十节虽斜风细雨,天容黯淡,而全市国旗飞舞,白日生辉,各商店对日经济绝交的标语,触目皆是。正午,各繁盛区域都被宣传队所占据,且有结队狂驰于马路中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如春雷振发。此时虽大雨如注,但民众皆冒雨鹄立两侧,欢呼鼓掌。这种情形,真使我们兴奋得热血沸腾。”^③

(3) 结合捐献劝募、救济工作等开展宣传工作,促进各项工作的互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注意把对民众的宣传教育与民众实际参与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激发了上海民众的爱国热情,而这种热情又在实际行动中转化为他们对爱国捐献、节约献金等活动的实际参与。在抗战过程中,上海地下党参与或发起了许多公开的群众运动,如对日经济绝交、劝募救国公债、慰劳前线将士、捐献慰劳品、义卖义演、安置难民、抵制日货、劝募寒衣等等,不断把党的宣传工作推向高潮。基层党组织经常采用的一种宣传方式就是把抗日歌曲与募捐等活动联系在一起,如当时有一首《抗敌募捐歌》,歌词是这样的,“你一角,我一毛,涓涓滴滴,积起江河,便成怒涛。只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众志成城,定把中国保”,^④这一宣传方式激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许多同胞解囊捐款。在抗日战

① 《立报》1937年9月18日。

② 《群委工作报告》(1937年9月24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49页。

③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78页。

④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公司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

争和各项工作的互动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成为民众爱国情绪的典型表达。到抗战爆发不久的1937年9月10日为止，全市已募得爱国捐款一百五十余万元，至10月9日累计发行救国公债一千九百余万元。^①各界民众捐献的各类食品、日用品、车辆等军需物质近200种。各团体组织的车辆运输队，源源不断地把物品运往前线。总之，上海地下党在开展宣传活动的过程中和其他各项工作的互动中，不仅在物质上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前线，更起着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4）用适当的宣传口号来引导群众

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的白区，地下党在开展宣传工作时，往往不顾上海的实际环境，提出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口号，如“拥护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等。其结果不仅使党的力量遭到破坏，也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对此刘少奇总结到，在白区群众工作的开展过程中要注意找出为群众所拥护的适当的要求与口号。抗战时期的上海地下党可以说是刘少奇这一结论很好的践行者，如抗战爆发后，为支援前线，争取抗战的胜利，上海地下党提出“节约救难”、“一分钱慰劳将士爱国捐”、“节约献金”等宣传口号。孤岛时期，面对日伪对海关的渗透、接收，党提出了“反英日协定，不与敌伪合作”、“保护海关主权”、“反对悬挂伪旗”等宣传口号；为了反对敌伪对上海教育界实施的所谓“亲善教育”，党提出了“师生合作”，“保护学校”，“保护教育主权完整”的护校口号；为抗议日军暴行，提出了“民族共愤”、“勿忘复仇”、“精神不死”、“遗恨必雪”等口号；为开展改善职工生活运动，提出“患难相扶”、“共存共亡”、“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维护工人生活，劳资互相互让”等口号。抗战临近胜利时，一些支部又提出“吃萝卜头”（指杀日本人）、“拥护共产党主张”、“要和平、要民主”等口号。事实证明，党组织在不同时期，根据上海的实际状况，提出适当的宣传口号，其结果不仅使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的行动，贯彻了党的政策，也使广大群众在口号的带动之下或多或少地实现了自身的经济或政治要求，从而更加凝聚

^①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14—515页。

在党组织周围。

综上所述,在抗战时期,由上海党组织领导和受党影响的宣传阵地,对上海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于宣传群众、团结群众,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功效。一方面,党的抗战主张更加扩大了,党的抗日救国政纲已开始逐步变成行动纲领^①,使中国共产党持久抗战、全民抗战的思想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艰苦抗战的辉煌战绩,深深扎根于上海人民的心中。另一方面这些宣传从不同的侧面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有力地批判了“抗战三月亡国论”,驱散了上海人民对抗日迷茫、彷徨,甚至绝望的低落情绪,加强了上海人民的抗战信心,为上海人民指明了一条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

(四) 机动灵活的群众斗争策略

领导群众开展政治和经济斗争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在旧中国,只有通过必要的斗争,群众才能实现其所要争取的切身利益,或获得表达其政治热情的机会,并在斗争中理解党的政治主张,提高政治觉悟。纵观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党领导的群众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党在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中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

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十年内战期间,地下党在白区开展群众斗争时,往往不从广大群众的要求与愿望出发,盲目地扩大斗争,要求斗争规模不断扩大,斗争形式逐步升级,从罢工、飞行集会、游行示威、总同盟罢工,直至武装暴动,甚至提出“不在运动的当天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就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②这些冒险行动,其结果是不仅不能积蓄群众力量,相反却导致党组织脱离群众,暴露自己的严重后果。

抗战爆发后,上海地下党鉴于以往的深刻教训,在领导群众运动中,坚持按照中央的指示,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

^①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页。

^② 郭德宏等:《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就是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适合群众的要求，使大多数群众都认为合理；有利，就是选择有利的斗争时机，采取的方式要有利于斗争取得胜利；有节，是指在一个具体斗争中，要根据形势和敌我友力量的对比、变化，在适当时候扩大斗争或结束斗争，积小胜为大胜。

这一时期地下党组织的群众斗争不仅实现了策略原则的转变，在斗争的具体内容和斗争形式上，也较十年内战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既有改善群众生活的经济斗争，也有以反帝接收、反渗透、护关、护邮、护校、抗议日伪暴行为内容的政治斗争。在具体的斗争形式上有“无头”斗争，即工人在生产中做慢工、懒工、磨洋工、制造故障，损坏机器、以次充好、以好当废等；还有“软性”斗争，即怠工、写信、磋商、请愿、谈判等方式。当然，在条件成熟时，党组织也不放弃罢工、游行集会等公开的、大规模的斗争方式。

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领导开展的群众斗争，使用了以下一些具体的策略。

(1) 采用合法手段，开展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

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认识到，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党获得群众信任的基本路径。抗战时期，走出了“左”倾思想的误区的上海地下党，已经相当熟练地在工作中运用这一策略，注意从群众觉悟、群众利益这一基本点出发来组织必要的经济斗争。针对“孤岛”时期经济畸形发展、广大工人生活因物价高涨而日益贫困的实际情况，中共江苏省委明确指出：领导群众的日常反日斗争“应密切联系到群众生活问题”^①。经济斗争一般巧妙地利用当局的法令，采取公开的合法斗争方式。刘少奇曾指出：国民党政府的工厂法、工会法“主要的还是国民党用以欺骗工人阶级的，因此，它就不得不规定一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如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与罢工，规定了比现在较少的十小时工作时间，星期日纪念日休息，对于工人疾病年老死亡的抚恤救济等）”。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利用工厂法、工会法上那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来组织工人群众的

^① 《真理》，《革命报刊资料丛编》第1辑，第110页。

斗争,要求实现那些条文上所规定的利益,并就此揭破国民党的欺骗,这样才实际有益于我们开展工人运动的工作。”^①

1938年3月,上海邮政局的外籍邮务长准备裁人减薪,邮局系统的黄色工会与资方狼狈为奸,引起职工的强烈不满,共产党人即动员数千职工起来反对,并与黄色工会的打手发生对抗,“由于这场斗争涉及每个人的生活问题,大家坚决抵制,坚持斗争”,当局最后被迫收回成命。共产党人乘机在邮局职工中成立了有四百多人参加的群众“互助社”,有效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邮局系统党的力量也从1937年10月的1个团小组5名团员,扩大到1939年的一百多名党员,建立了10个支部。^②同一时期,中华书局发生了一场长达9个半月的解雇与反解雇斗争。被解雇职工在该厂党支部的领导下,利用“资方不得任意停业,劳方不能任意罢工”这一政府法令,指出公司这次解雇职工的举动是违反政府法令的。因而提出增加维持费,补发公积金,工厂停工后四层楼空房借给同人居住、不收租金等合理要求。由于是合理要求,资方被迫表示可以考虑增加维持费等要求,但对借空房给工人一事却给予坚决的拒绝。在地下党员的指导下,职工们利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一切空房子要让给难民住”的指令,主动同慈善团体仁济堂联系,动员职工家属住进了工厂,从而解决了工人的住宿问题。^③

改良群众生活的斗争不仅体现在经济斗争上。在开展政治性斗争时,党仍然关注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日伪势力渗透工运的复杂局势下,为正确领导群众生活斗争,上海地下党采取的策略是:对日伪势力插手和操纵租界工运,进行正面抵制;同时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掌握斗争领导权,发展自己的力量。这样既维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又击破了日伪的渗透和破坏。1939年,浦东的英商纶昌印染厂工人自行发动了旨在改善待遇的罢工,资方态度强硬,形成僵局,日伪势力以为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6页。

② 刘宁一:《历史回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50—51页;沈以行:《从邮政组到互助社》,《上海邮政职工运动史料》第2辑。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中华书局总厂职工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1页。

有机可乘，想控制工人以打击英国人；上海地下党获知这一情况后，即按照上海下层社会的习惯，通过请“吃茶”的方式，与这些过去素无来往的工人建立了联系，并对他们进行了政治上的开导，告诉他们在民族存亡、大敌当前的时候，对于英国资方既要斗争，又要团结，对于想插手的日伪势力，则要表面上利用、实际上揭露。工人代表杨秉林等立即被这番雄辩的分析所折服，很快说服工人降低了斗争要求，而英国资方也看到了日伪插手的危险，决定让步妥协。工潮遂得到平息，而杨秉林等几位最早与共产党人接触的工人，随即加入了共产党，建立了党支部。未几，日伪又以领取“救济费”为诱饵，在纶昌厂的一些工人中组织工人同盟会，党支部决定利用登记后可拿救济费这一条件，让一些生活困难的工人去登记，并让一些积极分子打进同盟会去掌握领导权。不久，纶昌厂的同盟会分会成立，但领导权却掌握在工人积极分子手中，工人领取了日伪妄图收买人心的救济费，却从不参加日伪所组织的反英示威之类的活动。^①

可见，上海党组织通过开展合法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性的经济斗争，实现了争取群众生活改善的日常利益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根本利益的有机统一。

(2) 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推动和掩护群众斗争

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推动群众起来斗争的同时，上海党组织十分重视上层统战工作，强调：“只要是反日，不管他本身社会关系若何，我们均争取他到统一战线之内。”^②江苏省委在《关于维护与改善上海人民生活的决定》中专门强调，在斗争中“应尽量争取公开与合法方式，吸收社会上有地位的中外名流参加号召或赞助，取得与当地当局的某种联系或谅解，更为重要的是广泛群众的发动与参加”。^③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通过各种星期聚餐会、联谊团体、文化团体等渠道，加强与社会

^① 刘宁一：《历史回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8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276页。

^② 《真理》，《革命报刊资料丛编》第1辑，第110页。

^③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维护与改善上海人民生活的决定》（1939年6月18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3页。

各界上层人士的沟通联系,争取他们支持、参与群众团体活动和抗日救亡斗争。如当时规模最大的“星期二聚餐会”,汇集了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工商金融界、宗教界上层人士以及工部局高级华员约四十余人,他们均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号召力,与英、美、法租界当局又有密切关系,地下党即通过这个聚餐会,提出“节约救难”的口号,发动公开合法的捐募运动来募集支援新四军的款项、物资;并以“移民垦荒”、“安置职业”等公开合法的名义,将大批难民和党员骨干输送到新四军和根据地。此外,在进步书刊的出版集资,支援护关护邮,改善群众生活,借用地方协会国际电台开展国际宣传,以及与国民党驻沪代表的周旋等斗争中,共产党人所联系的上层人士都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

在政治形势最黑暗的1942年以后,党在领导群众经济斗争的时候,还注意对资本家的某种照顾。如提出劳资合作、共渡难关;在确实困难的企业中,职工运动提出可适当减薪、但不能裁员的合理要求,即既不致企业倒闭,又保障了职工的就业。对此,许多资本家很感动。^①可见,基层群众工作与上层统战工作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深入基层的群众工作激发了广大下层民众的抗日情绪和爱国热情,不断发展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促进了上层人士走向抗日进步,而上层人士的支持和参与为群众运动提供了合法性和保护色,掩护和推动了群众抗日救亡斗争的顺利发展。^②

(3) “无头”斗争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租界后,上海工人运动的一种主要斗争方式。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殖民统治下,为积蓄力量,长期隐蔽斗争的需要,上海党组织提出要“采取有组织的斗争和无组织的形式结合起来的方式,使敌人找不到破坏的线索,方式要灵活多样,切忌刻板、一律,积小胜为大胜,‘得到风,就转蓬’,一点一滴地积蓄和发展力量”。^③根据

① 《陆志仁文集》,陆志仁纪念文集编辑组1993年印,第204页。

② 陈丽凤:《略论抗战时期上海党组织领导能力的重大提升》,《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这个策略，党发动日本企业中的工人群众普遍开展了有组织、有领导却又没有组织形式的“无头”斗争，给日方制造麻烦，其中包括各种慢工、懒工、磨洋工、制造故障，损坏机器、以次充好、以好当废等。如原东华纱厂和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转为生产军工产品后，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采取了几种斗争形式：“拖”就是在工作时间内，借口找材料、找工具，外出溜达，拖延时间；“磨”，就是在工作岗位上，手中拿着工具装出干活的样子，日本工头过来就干一下，走后，大家又停下来；“转”，就是把工厂里一些技术高的老师傅介绍到非军工生产、工资又高的厂里去；“传”，就是在积极分子中，传阅复写关于解放区情况的传单，然后再由积极分子用聊天的方式在工人中传播^①。这种寓政治斗争于经济斗争中的巧妙形式，既给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以打击，满足了群众抗日情绪，又使党员、工人积极分子在领导这种特殊的斗争中与工人群众融为一体，建立了自己的威信，为坚持对敌斗争、教育培养群众、发展积极分子，壮大党员队伍等党的重要工作创造了条件。

（4）利用租界当局与日伪的矛盾，开展公开的政治斗争

抗战时期，上海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交织着多种力量的角逐和较量。由英美法主导的租界当局虽然对日本持所谓的中立态度，既不愿与日本正面冲突，但也决不甘心百分之百地执行日本的每一个意旨。实际上，他们还希望利用中国人民的抗战情绪，与日方讨价还价，利用中日矛盾来延缓日本对租界的扩张，以保证其权益。因此，孤岛前期，租界当局对界内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派抗日力量及群众性的抗日运动和各种报刊发表抗日言论，基本上采取“默许”和“放任”，适时干涉一下的态度。这客观上为孤岛群众抗日救亡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屏障。对此，中共江苏省委强调，“应注意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来改善我们自己的工作环境，创造工作机会”，“对英美法各国在原则上还应以争取为主，把斗争中心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应防止对英美法各国过分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的摩擦”^①。1938年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纪念“一二八”活动就是利用矛盾开展群众斗争的一次典型事例。当时，上海地下党为稳定孤岛各界群众的情绪，坚定长期抗战的信念和决心，决定充分利用租界当局既害怕群众过火的抗日斗争，又希望以市民“适当的”抗日行动与日军较量的矛盾心态，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念日举行全市性的悬挂国旗运动，以振奋民气。经过各基层党支部的动员，1938年1月28日上午，孤岛内几乎所有的工厂、商店、市政机关、学校和部分里弄民宅都主动挂起中国国旗，汇成了上海沦陷后第一次群众抗日爱国的誓师行动，活动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5) 适可而止、以退为进，保护斗争力量

刘少奇曾经指出，领导群众必须“从争取胜利(即使是最小的胜利)的观点出发。要使用一切方法争取这些斗争之具体要求的胜利。对于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在斗争延长对于工人不利时，应该在某种相当条件下，‘适可而止’地暂时停止战斗。”^②上海沦为孤岛后，基层党组织转入隐蔽精干，调整巩固的阶段，这就决定了党在开展群众工作时，不能过分暴露自身力量，要适可而止，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孤岛时期，日军力图夺占租界内国民政府留沪的重要企事业单位。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抵制其“以华制华”的阴谋，中共江苏省委把反对日伪渗透接收的斗争列为孤岛政治斗争的中心，在各条战线上，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对日伪的斗争。为反对日伪接收海关，海关党支部决定发动员工以罢工形式开展护关斗争。这一斗争虽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却遭到海关当局的反对，党的力量在斗争过程中也有所暴露。对此，周恩来指示中共江苏省委把护关斗争作为地下党“退兵之一战”，千万不能搞过头。^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共江苏省委指示海关党支部：护关斗争浩大的声势，已达到扩大抗日运动在孤岛上的影响的作用，也打击了日伪的接收气焰，伪旗暂时没有在江海关挂起，为保存力

^① 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95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③ 《新华日报》1940年1月5日。

量,准备长期斗争,必须“适可而止”,护关斗争就此告一段落,从而有效地保存了实力。但不久即发生了日军对海关人员的绑架活动,面对暴力与压迫,绝大部分关员均表示“继续努力,集体发动伟大有效之护关运动”^①。对此,毛泽东、张闻天指示:“护关斗争必须立刻设法结束,不然会受到极大摧残。”“说服自己同志不要为群众中抗敌情绪的高涨,拿无望的冒险的行动来代替对于当前环境的具体分析。”^②根据中央指示,海关职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护关斗争是孤岛时期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与发动的第一场反对日伪接收的政治斗争,影响甚大,不仅给正处于低潮的孤岛群众的抗日运动以极大的推动,也震撼了全国,而且由于实行了“适可而止”的斗争策略,党和群众的力量没有遭受过大的损失。

(6) 城市群众工作与农村武装斗争相互配合

抗战爆发后,上海围边地区抗日武装林立,鱼龙混杂,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及时领导和依靠其中进步势力,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周边地区就有可能沦入日伪之手,这将对城市群众工作的开展非常不利。因而党在开展市内群众工作的同时,也努力开展农村抗日游击战争,把城市群众工作的开展与农村敌后武装斗争有机结合起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上海近郊外县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步打开局面,到1939年下半年,已在浦东、青浦、嘉定、崇明、京沪线东路地区创建了若干抗日游击区。上海周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有效地消耗、牵制了日伪力量,为配合新四军东进北上,创造华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同时,这既对日伪在上海的统治构成一定的威胁,也有有力地鼓舞了上海的群众,并为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全,提供了一定的回旋余地。上海地下党对周边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给予了有力支援,上海先后有二千多名党员骨干奔赴市郊外县,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的有生力量。这样,上海地下党就开创了党的中心城市工作与

^① 《文汇报》1938年5月12日。

^② 《关于立刻结束护关斗争的指示》(1938年5月14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8页。

外围农村敌后抗日游击战相互支持、互为依托的格局,由此形成城乡工作相互支持、互为依托的格局。

综上所述,中共上海党组织遵照党中央的敌占城市“应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藏力量,准备将来决战为主”的方针,深入基层,依靠群众,并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在开展各种抗日活动的过程中,培养和培养了大批先进分子,把大批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党建立了强大的政治基础。

三、基本经验：秘密斗争模式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群众工作的秘密斗争模式。它主要由以下因素构成。

1. 党的社会化

这里的社会化是指地下党要求自己的成员尽量取得合法的社会身份来掩护自己,能够以社会普通一员的面貌来开展政治活动。但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地下工作的技巧,而应该将之视为党力图通过自己的成员广泛渗入社会、融入群众,以此获得群众认可和支持,并对群众进行组织和动员的路径。

在十年内战时期,党的社会化探索并不成功,群众工作遭到很大挫折,自身的组织屡遭破坏,党的群众基础也受到严重侵蚀。经过痛苦的反思,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整了方针政策,党员的社会化日臻成熟,可以说是成功的典型。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党员普遍地实行了“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应该说,这是关键性的环节。通过“三化”,党员不仅能更好地在群众中隐蔽下来,发挥其群众政治核心的凝聚、引导作用,而且能就此而更加充分地掌握群众的情绪和要求。这既有效纠正了过去党员依靠领取党的津贴为生、与群众诸多隔阂,甚至凌驾于群众之上发号施令的倾向,也使党的领导机关能更准确地掌握群众的动态,判断政治斗争的局势,从而对群众实施更有力的领导。

第二，党的群众工作范围明显扩大。党在抗日战争时的任务，要求地下党最大限度地扩大群众工作的覆盖面。因而，上海的基层党员在实行“三化”的过程中，群众工作的对象，也突破了原先比较单一的工人范围。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对象，不仅包括工人、学生、一般市民，还一定程度上包括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社会上层人士。党的基层党的触角也相应地深入到上海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在吸收党员方面，地下党根据实际情况，努力吸收各方面的优秀分子，包括个别资本家入党。上海保险业同业公会主席、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胡咏骐就因表现积极，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于1939年初被批准入党。如王长江所说，“属于‘工人阶级性质’的政党，在和统治阶级进行对决时，也往往把除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劳动群众’都纳入自己的依靠力量。”^①吸收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既有效地壮大了党的队伍，又有利于党的团结更多的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基础。

2. 组织群众

“各种群众组织是我们党联系群众的必要的纽带”。^②群众可能体现出来的积极性，必须由正确的领导者来引导，并通过适当的组织来领导。而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对群众的组织工作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党组织对群众的组织程度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首先，党组织自身建立了合理的领导体制。抗战期间，上海党组织从重建开始就意识到要把党组织的重建与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为此建立了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和工人工作委员会。群委主要领导职业界、教育界、妇女界、学术界、街道里弄的党群工作，工委重点负责工厂产业系统的党群工作。在群委、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各系统设立了支部干事会，各救亡协会都建立了秘密党团，实现了从组织上对群众抗日运动的领导。1937年11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后，即设立了军事运动、工人运动、职员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文化界运动6个委员会，以后又根据形势与任务的需要相继设立了难民运动委员

^①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

会、外县工作委员会、教育界运动委员会。在各个委员会下又设立其他组织，一级一级地把群众组织起来。

其次，善于利用一切合法的空间，争取群众组织的公开化，并根据不同人群的利益需求、偏好，建立各种组织，产生对群众的吸引力。只有建立了组织，才有可能对群众进行有效的政治教育与动员。当“个体被纳入到某一个团体或组织中，被要求履行作为团体一分子应尽的责任，被要求行动一致、思想统一。在这种因组织评估而形成的集体舆论中，个体如同置身时刻受到评判与监督的‘压力场’，受到来自集体网络的制约。身在其中的人不得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并不知不觉走进这一场域，为它所吸引，进而改变着原有的行为习惯、交往方式与行为规范。”^①

以学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工作为例。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在开辟学生工作的阵地时，十分重视组织领导，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组织系统。为领导学生工作，地下党专门成立了学生工作委员会以负责指导各校的地下支部。在建立地下支部时，出于安全考虑，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建立了几个平行支部，由支部的负责人分别联系若干党员，每个党员又分别联系其他党员或进步分子。同时，在党组织外围有各种以共产党为骨干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如学生自治会、系会、社团、全市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学生党员和进步分子通过这些外围组织，实现了同群众的结合。而在每一个外围组织中，党组织团结群众的一般模式是党员在深入各个群众组织以后，以党员为核心，团结一部分积极分子（进步骨干），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在此基础上党员和积极分子分散到群众之中，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党员和进步骨干，在组织和推动群众喜爱的活动中，去潜移默化地向群众进行教育，扩展影响，努力发现在群众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他们谈心，交朋友，进行个别教育。经过考察，把他们吸收入党或党的外围组织中去，使这些力量成为各种群众组织的领导核心，并从他们之中选拔一批

^① 张孝芳：《陕甘宁边区的民间启蒙和政治动员——由〈日用杂字〉说开去》，《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3期。

骨干，到新的单位或新的团体去开辟工作或加强工作，扩大组织力量。

3. 政治动员的利益兼顾原则

政治动员的利益兼顾原则是群众工作运行机制的动力源泉。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工作要想得到群众的拥护，就必须善于把党的政治主张与群众的现实利益密切结合，努力维护并实现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着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陈云，在1939年就曾详细阐述了这一原则。他认为，要想把薄弱的狭小的群众工作变为真正广大的群众工作，关键“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斗争，把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①他还认为，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不在于发动多少次斗争，也不在于组织多少群众团体和吸收多少会员，而在于“党员去做许多有益于群众的社会公益事业。各种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公益事业，到处可以做，到处可以取得社会的援助”，“只要做几次公益事业，就不仅能够社会上被劳动大众所拥护，而且可以获得中上层正派人士的同情”。^②

就抗战时期上海基层党组织群众工作而言，维护群众切身的生活利益始终是基层党组织制定政策及开展群众斗争时最为关注的问题。如针对抗战时期上海民众生存条件恶化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基层党组织采取了安置难民，开展生活互助合作，抚恤救济，赈灾救荒，移民垦荒，安置职业等各种改善生活的政策。这样就把政治动员引入经济生活中，使政治动员与民主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即使在开展群众斗争时，也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吴克坚在《上海工人改善生活斗争》一文中说：“去年一年（指1939年——作者注），上海工人争取生活改善的事件中，是达到147次之多，人数约为20多万人，在时间上去年下半年为中心，以12月为顶点，斗争所包括的部门，首推织绸业工人，共进行斗争16次，印刷业11次，纱厂10次，各大百货8次，面粉、烟业各7次，服装业6次，造船、纱织业各5次，印染、橡胶、水电各4次，汽车、筑路、邮电各3次，电车、装订、制革、码头、袜业、人力车、报业各2次……”，

① 《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99页。

② 《陈云文选》（1926—1949），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而在这 147 次斗争中，“获得胜利占多数，失败的占极少数”，^①战后被扣的工资“全部恢复，有些厂并加入 10%、20%、30% 的工资或米贴等”^②。当然，基层党组织关注的不仅仅是广大工人的利益，为了顾全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基层党组织也非常注意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护，要求各工厂与民族资产阶级“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尽快帮助资方医治战争的创伤和恢复生产。

在组织群众斗争时，尽量利用合法手段，并在策略上注意斗争的适可而止，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以保护群众的利益。在当时的共产党人心目中，群众的切身利益始终占有中心的地位。因为群众利益在党发动的斗争中受损，也就意味着党的政治威望遭到损害。

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正是始终坚持利益兼顾的原则，从而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群众的信任，打开工作的局面。

4. 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与献身精神

党员的人格魅力及献身精神是地下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最重要基础。党员既然以社会普通成员的面貌出现在群众中，他们能否被群众接受、能否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素质。党员的人格魅力及由此而带来的良好社会形象，是他们接近、团结、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前提条件。

1935 年瓦窑堡会议以后，党把造就共产党人先锋模范形象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从理论与实践上具体地解决了做什么样的共产党人，怎样做共产党人的问题。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详细地论述了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意义，提出共产党员应当成为实事求是的模范，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学习的模范。1939 年 5 月陈云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具体提出共产党员应当终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

^① 吴克坚：《上海工人改善生活的斗争》（1939 年至 1940 年 8 月），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74 页。

^② 《中共江苏省委工作报告》（1940 年 3 月），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74 页。

不挠地执行决议、群众模范和学习等六条标准。同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提出：共产党人成为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应当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

上海党组织非常重视共产党人模范群体形象在群众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如中共江苏省委曾经强调：“每个同志在救亡运动中必须是积极的模范工作运动者，多数群众利益的拥护者，应该不疲倦的教育落后群众，同时，又虚心的向群众学习”^①；“支部是群众组织中最积极最有远见的一部分，只有经过支部在群众当中的积极模范作用，才能推动群众组织的发展”。^②当时坚持白区斗争的地下党员，冒着随时随地被捕、杀害的危险，同日伪作殊死的斗争，不畏艰险，不计较个人利益，为挽救民族的危亡竭尽自己的全部心力。因此党员都具备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严守组织性和纪律性，百折不挠地去执行党的决定，服从党的分配，积极而有创造性地去完成党的任务。以学校系统为例，为了部署党的力量或开辟新的阵地，许多学生党员多次转换学校，有的党员服从党的需要自动留级、转校；已经暴露的党员和支援根据地的党员，为了组织安全和组织的需要，毫不犹豫地离开家庭和年老的父母，奔赴抗日前线；有的自觉服从党的决定，瞒着家庭，忍受屈辱和误解，打入敌伪机关工作。在党与群众的关系上，党员始终以自己的品德和工作业绩来赢得群众的信任，勤勤恳恳地为群众服务，勇于牺牲自己，坚定而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从而取得了群众的信赖和爱戴。如启秀女中的党员诸咏芬和王美春，一个功课好、体育好、待人热情诚恳；一个耐心细致，善于做思想工作。她们通过发挥自己的模范作用，达到了团结全班同学的目的。张孝慈回忆说：“她（诸咏芬）常常借进步小说给我们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新生代》、《大众哲学》等。她还细心介绍书的内容，引导我们阅读。星期天，在她家阳台上研究时局，分析形势，或讲革命故事，加强了对抗战胜利

① 据《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00页。

② 据《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94页。

的信心,向往新社会的到来。在日本统治的困难时期,把一批单纯的青年,从踢毽子、做游戏逐步引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①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党的组织体系处于秘密状态。人民群众认识共产党的渠道,除了党公开的政治纲领和宣传口号,就是共产党人贯彻党的政治主张的模范形象,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形象的塑造,运用模范形象来开展党的群众工作。如果说群众工作是党的基础性工作,塑造共产党人先锋模范形象,把党建设成先锋模范群体则是这项基础性工作的前提。

正是因为形成了这套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基本模式,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壮大了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上海地方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力量;也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运动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抗日战争时期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93页。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

一、历史背景

(一)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政治环境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政治环境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1945年8月到1946年6月是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阶段。在这一阶段,以胜利者自居的国民党政府在接收上海时,表现出了不可救药的全面腐败,并导致上海的经济全面凋敝;而其不顾人民愿望,坚持反共内战的基本方针,更令其政治威信急剧跌落。刚刚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上海人民,因陷入了严重的生活痛苦之中,又担忧内战的爆发,对当局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由于这时国共合作尚未破裂,国民党虽厉行特务统治,但表面仍维持着虚伪的民主姿态,如允许成立工会,一般不对群众运动,特别是因劳资冲突而引起的工潮实行公开镇压,而是试图通过官办团体、特务监视之类的办法,把群众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因而,这一时期上海的各种群众组织和媒体,仍有着一定的活动和言论的空间。这也就给共产党通过秘密方式掌握群众团体、领导群众运动、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带来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这时,经过八年抗战和地下党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群众中的政治威望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上海地下党充分利用抗战时期打下的坚实群众基础,坚持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和联合社会各

界进步力量,经过灵活的斗争,挫败了国民党当局对上海群众运动的压制和控制企图,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1946年六二三反内战运动,就是这一阶段蓬勃发展的上海群众运动的高潮和力量的大检阅。这一时期的力量积聚,为全面内战爆发后,迎接人民革命新高潮,开辟紧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1946年7月到1948年下半年是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经历了惨重的军事失败,政治上、经济上的危机全面加深。这时,统治当局彻底抛弃了所有的“民主”面具,以所谓“戡乱”的名义,在上海实行全面的白色恐怖,疯狂捕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同时,他们实施了一系列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对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因此,这一时期人民群众与国民党政府的矛盾空前尖锐。上海地下党抓住了这一基本形势,采取机智灵活的策略,领导群众展开了尖锐、激烈而又非常巧妙的大规模斗争,使上海成为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主要战场。

1948年底到1949年5月是迎接解放的阶段。这一阶段是迎接解放的最后胜利阶段,也是黎明前的黑暗、斗争十分复杂、紧张和艰苦的阶段。在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进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疯狂挣扎、分崩离析,上海人民渴望解放。党领导下的上海民众,坚持积蓄和保存力量,广泛发展,巩固核心,深入地团结群众,扩大统一战线,开展争取生存、反对破坏、护厂、护校等应变活动,建立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抓紧地区调查和策反、情报工作等,为迎接解放、积极配合解放军入城和协助接管,作出了贡献。

(二) 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学生的思想情况

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和受到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影响,加上共产党人有力的组织引导,这一时期上海工人的思想比战前及抗战期间都有明显的进步。具体表现在:

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一般工人群众的基本信念。工人在受到各种不合理的待遇时往往挺身而出,不平地质问:“你知道今天要

讲民主吗？”“你这人怎么不讲民主？”在有工会组织的厂里，会员间发生争论时，大家通常会说：“到工会去开个会，评评理！”工厂老板和某些职员，假如神气活现用过去一套办法对付工人时，工人往往会让他们碰钉子：“现在是民主时代啊，怎么你们还是用日本法西斯的一套手段！”从中可以看到，不管工人对民主的了解程度如何，民主确实已成为一般工人的口头语，并和自己的利益互相结合起来。同时，工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也比从前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各界群众对政治民主的要求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正如国民党和某些资方所说的：“现在工人不好对付，天天讲民主、民主，害死人的民主！”^①

工人的斗争情绪不断提高。抗战胜利之初，罢工、怠工、请愿、游行、开群众大会，已成为工人的家常便饭。遇到任何不平之事，工人都有可能起来抗争。为工资、工时、待遇而斗争，为发米、发布、发赏金而斗争，厂方开除工人或添人也会引发斗争，有时候端午节、中秋节赏吃月饼也要斗，而且此斗彼应，此落彼起。工人的团结、组织及纪律性也明显增强。这主要表现在：各主要产业和手工业，包括理发、浴室等行业均有了工会组织；工人在群众大会、请愿、游行示威中，均能迅速地集合排队，写标语、呼口号、唱歌等等，秩序井然，队伍雄壮整齐。

虽然从整体上说工人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许多人在政治上仍存在不少模糊意识。一个比较重要的表现就是他们虽对国民党失望，但对中国共产党尚有怀疑。许多工人说共产党的办法是好的，对内战基本上是反对的，但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打不过国民党，所以抱着一种中立态度，既不愿被国民党利用，也怕受共产党利用。

抗战胜利后，工人阶级思想状况的进步对上海学生思想觉悟的提高也产生着有力的影响和支持。上海学生长期在日伪压迫下，深受苦难，对抗战胜利感到鼓舞，希望能有一个和平建设和安定读书的环境，要求实现和平民主，振兴国家。同时抗战八年也培养了上海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再加上他们热情、单纯，有正义感，生长在大城市，因而见闻较多，政治敏感性较强，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也相当广泛。

^①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91 年版，第 321 页。

他们对于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如贪污腐败、歧视压迫沦陷区职工、学生,物价飞涨,严重的失学失业威胁等等,反应强烈,对国民党经历了从失望、不满再到寻找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答案的心路历程。

但同时,由于长期生活在沦陷区,除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对共产党有好感外,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思想上对国民党政府持有正统观念,对美国有幻想,其思想状况还处于中间落后状态。同样,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大学与中学、国民党控制的学校与开明派掌权的学校之间,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相对来说还有一定差距。

工人群众和学生群体中的这种思想状况,给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也对党的群众宣传、组织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 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抗战胜利初期,上海地下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1945年8月9日成立、以刘长胜为书记的中共上海市委。下辖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教育界运动、文化界运动、近郊工作6个委员会,还有警察特别支部。到1946年,上海地下党组织由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对内称呼,简称“上海工委”)和中共上海市委分别领导。上海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委的组织系统和工作范围严格划开,彼此之间不发生组织关系,但在工作上则相互默契配合。从1947年到1949年5月,上海党组织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中共中央为了全面部署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决定在上海另设上海分局,直属中央领导。上海分局与上海工委之间仍按原规定不发生任何关系,工作范围的划分亦依原规定不变。1947年5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和调整国民党管区的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决定将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自上海分局成立后,上海市委的工作即由上海分局及其后的上海局直接领导。

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力量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党员数量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抗战胜利之初,上海地下党根据上海的经济形势恶化,全市绝大多数

数工厂停工，失业工人在 50 万以上^①的情况，领导组织工人进行了要求复工、增加工资及检举汉奸等一系列斗争。如在 1946 年春节前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上海的广大职工开展了要求改善生活待遇、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这场斗争以争取年奖，要求调整工资底薪和实行以生活费指数计薪为主要内容。斗争的涉及面非常的广，广大工人、职员、教师、学生，都加入了斗争的行列。1946 年 5 月，共产党人在上海发动了群众性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大规模斗争。6 月 23 日，上海各界群众 5 万余人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并举行了全市性的争取和平示威游行。全面内战爆发后，上海人民的政治热情日趋高涨。上海地下党的各个系统，又广泛发动全市工人、职员、学生、教师、文化界和科技界广大群众，积极投入规模巨大的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内容的斗争中去。通过领导上述一系列的斗争，一方面维护了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教育、团结了更多的群众，另一方面也锻炼培养了一大批新的积极分子，从而发展了党的组织。

到 1946 年底，党员人数从抗战胜利初期的 2 000 多人发展到 5 000 人左右。^②

1947 年上半年，国内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军事上，国民党的军队虽然在几个地方继续向我解放区进攻，但其攻势已经减弱，解放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至 1946 年底上海的臧大咬子事件和北平的沈崇事件后，反美浪潮逐渐高涨，最终在 1947 年形成了全国性的反美抗暴斗争的高潮。中共中央认为，上海在这次群众运动中“产生大批新的积极分子”，上海党组织应把运动中产生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作为核心”^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上海地下党把一部分在反美抗暴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吸收进了党组织。反美抗暴斗争之

①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91 年版，第 143 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90 页。

③ 《关于加强对蒋管区学生运动的组织与领导的指示》（1947 年 1 月 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3—384 页。

后,中国共产党相继发起了抵制美货,解冻生活指数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斗争。1948年上海地下党又领导了同济斗争、申九斗争、银行行员罢工以及“六二八”斗争,涉及学生、工人、店职员、教师等各个层面。通过领导广泛的群众斗争,党员队伍得到了一定的壮大,截至1948年8月,上海党员人数达到8500名左右。^①

1948年的下半年,处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在上海的白色恐怖。1948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②同日,中共中央城工部给上海局、香港分局发出关于《应付蒋匪大批逮捕各地学生》的指示,指出:“蒋匪已在各地大批逮捕,且将继续疯狂进行。请即进行紧急措施,即将工人、学生及其他方面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尽量撤退,无法撤退的,即将设法疏散,切勿犹豫。”^③根据中央的指示,上海共有1700多名党员撤退到解放区。^④

大批党员的撤退,虽然一度使党的力量有所削弱,但从现有资料看,上海党员的数量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因为,在大撤退以后,一些党支部因缺乏骨干而难以组织,一些党委也因部分干部的撤离而加重了负担,而整个革命形势正在迅速朝胜利的方向发展,亟需加强党的组织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刘长胜于1948年9月在党内作《集中力量争取第三年对全局决定意义的胜利,发挥第二条战线的作用》的动员报告,强调要在总结两年来斗争的基础上,着重扩大组织,发展

① 根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第1960页的记载,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市委共撤退1700名党员到解放区,而这1700名党员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上海党员总数的20%左右。可见到1948年8月为止,上海党员的数量应该是8500名左右。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58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59页。

④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0页。

革命力量，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①同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定》也指出：为了夺取全国政权，必须有大量的干部做准备，“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的地位”，为完成干部的准备工作的，“有计划地大量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便成为各区各级党委当前的重大任务。”^②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结合上海自身的实际，上海局与上海市委确定了“以巩固力量，重点发展，训练干部为主”的组织工作思想，在开展群众运动的过程中发展了一批党员，这不仅补充了因撤退、输送而减少的人数，而且还使党员人数有较大的增加。以学委系统为例，复旦、交大、同济分别发展100人左右，约大（即圣约翰大学——作者注）发展40余人，大同、大夏等6所私立大学发展140余人，男中方面南模、沪新、复兴、麦伦等10校发展200余人，女中方面各校共发展约150人。^③

1949年初的上海已处于解放的前夜。为迎接上海解放，中共中央上海局确定了“积极地、广泛地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与具体准备对京沪的接收与管理而奋斗”的基本方针。^④中共上海市委通过各级党组织在全体党员中进行认真讨论，明确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已取得绝对优势，上海解放不需要采取内部武装起义的形式，上海地下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破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1949年2月上旬，中共上海市委对全市地下党组织作了全面调整。把原来按产业划分的党委改为按地区划分，成立沪东、沪西、沪南、沪北等9个党的地区委员会。在全市党组织机构实施全面调整的同时，中共上海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5—1949.5）》，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715页。

② 《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④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412页。

市委按照中央关于在大城市的工人及学生中“应采取多吸收积极分子入党的方针”的指示^①，抓紧进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在重点工厂、学校，积极、谨慎地吸收了一批新党员。至上海解放前夕，上海共有党员9400多人，其中工委系统3500人，职委系统1900人，学生系统2000人，教卫系统700余人，郊区580人，警委系统500余人，科技系统70—80人，文化系统150人。^②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开展以及策略的使用提供了组织上的有力保障。

二、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基本方针与策略

抗战胜利不久，中共中央就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党在大城市交通要道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凡我不能切实占领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必须仍作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以待将来……应尽可能留下不暴露的力量，并须派遣大批干部，潜入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机关和铁路、工厂、矿山、市政、银行、学校里边建立工作，利用合法团结群众，以便将来更有力的进行民主运动。”^③

对于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在1946年4月做出了具体的指示。中共中央认为，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在政治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在一个长时期里，国民党在上海仍将占有优势，力量对比基本上是敌强我弱；因此，上海地下工作将是长期的、坚韧的，必须注意积蓄力量，扩大群众组织，争取中间分子，造成深厚坚固的社会基础，以待决战时机。中共中央强调，上海地下党在工作作风上切忌犯急

^① 《关于在新解放区域及待解放城市必须谨慎地发展党员的指示》（194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5—1949.5）》，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761—762页。

^③ 《中国关于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进行合法斗争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性病，只顾眼前利益；对国民党的各派系要进行调查研究，利用矛盾，利用合法，采取斗智，善于斗争；必须注意隐蔽党的组织，明确秘密工作的原则。^①1947年2月，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提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②。1948年8月，中共中央又下达《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强调“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并特别严肃地告诫说：“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③

无疑，坚决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诀，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为上海地下党规定的基本策略方针。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其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市委，始终坚决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并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不同的具体条件和形势，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

（一）利用合法条件组织群众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曾设想由新四军和上海地下武装里应外合占领上海。上海地下党为此组织了一支以工人为主的地下军武装，还在郊区的一些地方贴出了“欢迎刘长胜任上海市长”的标语。但时局的发展很快表明，占领上海的条件并不成熟。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放弃这一计划，而以利用合法条件将各界群众迅速组织起来，作为上海地下党的首要任务。

1945年8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关于停止上海武装起义的紧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1页。

急电报中要求：“宜改为群众组织各种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当天深夜的另一份急电中又指示：“保存我们在工人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能够进行民主运动，目前应该组织工会及其他人民团体。”^①华中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8月24日给刘长胜等人的电报中指出：“今后的方针应广泛发动群众（首先是工人、店员、学生），组织群众，普遍广泛的建立工会和各种群众团体，开展广大群众性质的反汉奸运动和改善生活的斗争，这种群众运动、群众组织发展得愈多愈大就愈好”，“必须在群众运动基础上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秘密工作”。^②

抗战胜利初期，上海工人群众自发地掀起了一系列以维持生活为目的的经济斗争。先是部分日资企业的工人，因企业停工而要求获得生活维持费；随后，这些日资企业被国民党接收，被停工的大批工人进而要求复工；最后，是几乎所有行业的职工为改善待遇而斗争。上海地下党工委认为，这种形势比较有利，党“应该积极主动、利用合法，着重于把工人组织起来，进一步开展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福利待遇的斗争，以不断壮大力量；要把壮大力量与改善群众生活的斗争结合起来，与民主运动结合起来，与组织建立工会结合起来，与揭露国民党内战、独裁、卖国结合起来。”^③在共产党人的积极领导和推动下，这场经济斗争迅速呈现出了强盛的势头。1946年1月至5月，参加此类罢工斗争的人数达到45万。^④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经济斗争中，共产党人在组织工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时，根据国民政府1943年11月修改公布的《工会法》，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但国民党始终希望通过政权力量，包括其党部的力量和对工会注册登记的权力，把工会控制在自己手中，进而控制广大群众。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确实维护群众利益，完全可以把这些合法的工会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这一时期共产党在

①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3页。

②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66页。

③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49页。

④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页。

组织工人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同国民党争夺合法工会的实际领导权。说起来或许令人难以置信，在争夺工会实际领导权方面，处在地下的中共组织与执政的国民党相比，反而具有很大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在八年抗战时期，通过有效的地下工作，已积累相当的力量，在群众中享有确实的威望，具有扎实的群众基础。而国民党虽然也想力争控制工会，并也有一批黄色工会领袖出身的工运干部，但因为工会的“油水”远比党政职位“油水”逊色，其许多工运骨干忙于钻营更高的官职，这个业已全面腐败的执政党竟无法有效动员其主要的骨干力量来同共产党争夺群众。这样就给中共基层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广泛争取工会领导权提供了良机。

争夺工会的斗争首先从筹备工会开始。

战后上海的第一个企业工会是中共领导的日资大康纱厂工会筹备会。抗战胜利后，自1938年以来从未停止过活动、在群众有很高威信的大康纱厂党支部接到上级要求发动群众、保护工人生活权利的指示后，即于1945年8月19日领导群众宣告成立该厂工会筹备会，要求资方发给工人生活维持费。资方被迫答应了工会的一些要求，发给每名工人2斗米、1斤油和1匹布，并承认工会有权派纠察队到厂值班，由厂方供应伙食，还向工会提供了1辆自行车。首战告捷，工人欢欣鼓舞。接着，大康纱厂的党支部又帮助附近的裕丰纱厂、公大纱厂、中国毛绒厂等建立起了工会。^①在许多民营工厂，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抢先在厂门口或工房里摆起台子，将工人登记编组，选出代表；也有一些企业采取组织庆祝抗日胜利筹备会的方式，先把群众组织起来，然后把这些组织转变为工会筹备会。通过地下党员的积极活动，各工厂工会筹备会之间又迅速地形成联合组织。如沪东的轻、重、纺联合工会，以平凉村为中心，以机器业为主，包括纱厂、烟厂、化学厂等计有63个工厂单位，共5万工人以上。沪西的失业工人联合会，在闸北平民村的空房里设立了联合办事处，以纱厂、铁厂为中心，包括其他各种产业，计有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322页。

35 个工厂单位,人数也在 5 万人以上。

国民党也曾通过其执政地位,发起组织了一些工会。但由于他们严重缺乏群众基础和有威信 of 工人骨干,许多表面上由他们领导的工会,最后还是被共产党人所掌握。如国民党人在沪西组建“三区棉纺织工会整理委员会”时,找到的一些工人骨干,竟都是地下党员或工人积极分子,18 个委员中,地下党员有 13 名。同样由他们组织的“四区(即沪东区)机器制造业工会筹备会”,也基本被地下党员所掌握。^①

一些原由汉奸操纵的工会,地下党则发动群众进行改组,如法电、英电等大企业。在改组这些工会时,共产党人把民主选举作为主要的斗争武器。这既是因为当时“民主”口号相当流行,也是因为共产党人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完全有条件通过选举掌握工会的领导权。如英电党组织提出的口号是:“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应该民主选举”,并在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中对选举做了充分准备。结果,原来准备操纵工会的国民党分子,大量落选,与共产党接近的工人掌握了工会领导权。^②法电的工会也因实行无记名投票,在全公司选出了 102 名工人代表,其中绝大部分是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由这 102 名代表选举出的工会理监事会,共产党员占半数以上。^③

国民党在组织工会筹备会上未占得上风,便宣布已建立的工会必须按照《恢复地区人民团体总登记办法》到社会局登记,否则视为非法,予以取缔。针对国民党的这一做法,地下党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合法,到社会局去登记。正如刘长胜所说:“不要怕去登记,应该利用国民党虚伪的民主,去社会局登记,同意它派人来‘指导’,这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热心为群众服务,团结群众,手里有了群众,工会领导权别人是夺不走的。”他还具体地指出:“可以假称我们愿意接受他们的领导。表面上也不要与国民党的人过分对立,以争取群众,迷惑敌人,取得合法的掩护。”^④

①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36—437 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英电工人运动史》,中央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8—150 页。

③ 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49—451 页。

④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91 年版,第 166 页。

工委的意见，很快通过党内传达到各个产业或工厂工会筹备会，绝大多数都按照这个精神贯彻了。

国民党曾试图利用“登记”的机会抓住工会的领导权，如有些工会不予批准、有些工会则要“派员指导”，安插爪牙。上海地下党采用的对策：一是不正面反对国民党塞人进工会，而在群众中做工作，说明哪几个候选人是我们原来选的，哪几个人是国民党塞进来的，底牌全部摊给群众，使那些塞进来的人落选。二是依靠有觉悟的群众，不等国民党批准，就正式成立工会，并公开大造声势，邀请各业各厂工会代表、社会名流、包括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派人到会，争取做到除了取得群众一致拥护外，再得到舆论上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①这样国民党也就无可奈何了。

在教育系统，共产党人同样抢得了先机。抗战胜利之前，在上海中小学系统工作的地下党人就已开始考虑战后建立公开的教师组织的问题，并在申报馆义务学校举办了教育讲座。抗战一胜利，国民党的接受大员还没有到达上海，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小教联）就宣告成立。为了隐蔽这个组织的政治背景，其负责人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参加了国民党，并吸收了国民党分子参加该组织的工作。^②后来，国民党建立了御用团体上海市小教职员联谊会，说是要保障教师的职业，却严禁教师举行集会活动。但参加这个组织的地下党员却仍能抓住机会，在其中建立了中层组织——教师代表会，由教师代表会出面开展保障教师职业的公开活动。掌握这个联谊会的国民党人最后竟只能通过强行拉来大批非会员参加选举投票的无耻手段，才能继续“当选”。接着，共产党人又利用广大教师对于国民党操纵选举的愤怒，另行建立了上海市教师福利促进会。^③甚至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较高的大学和中学教师中，共产党人也成功地建立起了自己领导的群众组织，即上海市中等教育研究会和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中等教育研

①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91 年版，第 166 页。

② 《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6—167 页。

③ 《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90 页、194—195 页。

究会最初以基督教青年会所属团体的名义出现,会员仅百余人,1946年6月底脱离青年会,到1947年9月,会员增加到六百多人。

利用合法的正确策略使党在组织群众方面迅速取得重大成果。各业工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8月15日止,上海已成立的产业工会有153个,职业工会有108个;在筹备会中的产业工会有37个,职业工会有27个;在整理中的工会有4个;其他未被承认和批准的或被认为非法的工会未计算在内。工会会员总共有近30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工会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所领导。^①另据《上海工运志》的记载,到1946年8月,全市已成立的三百多个工会(包括产业工会、工厂工会),多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影响,即进步力量大体上保持了优势。也有些工会上层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但是共产党在其基层仍有很大影响。如邮务工会上层由国民党人把持,但所属的补习学校、图书馆、消费合作社等群众活动阵地,为进步力量所掌握,主持工作的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在教育、金融等部门中,联谊性质的职工团体,也几乎完全被共产党人所掌握。^②

上海地下党通过合法手段掌握的群众组织,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党在上海发挥政治影响、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斗争的坚实基础。

(二) 合法而有节制的群众斗争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斗争可分为三个阶段。

1945年8月到1946年春是第一阶段,主要是争取改善群众生活的经济斗争,地下党相继发动了有一定规模的“清算日伪,要求复工”,“检举汉奸,反对甄别”等斗争。1946年春节前后,开展了要求改善生活待遇、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

1946年春到1948年下半年为第二阶段,以政治性的争取和平民主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为主,并最终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这是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持续时间最长,群众参与程

①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69页。

② 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

度最广泛、规模也最大的群众政治性斗争，并以学生的抗议运动为主。

1948年底到1949年5月是迎接解放的斗争。党领导下的上海民众开展争取生存、反对破坏、护厂和护校等应变活动，建立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抓紧地区调查等群众工作。

在这三个阶段的群众斗争中，第二阶段的斗争最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群众工作的策略也最具有代表性。由于篇幅限制，本节主要对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第二阶段的群众斗争进行一些分析。

1. 坚持“合法”的斗争原则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忙于经济上的“劫收”，一下子还来不及在上海恢复严密的统治。同时，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的种种压力，国民党还不敢断然抛弃“和平、民主”的面具。特别是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后，国民党当局对于群众性的政治抗议活动还不敢赤裸裸地进行大规模的血腥镇压。这些客观的形势条件，使得共产党有可能比较放手地利用合法的形式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并派马歇尔作为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马歇尔来华的第一站是上海。上海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通过合法斗争表达人民的力量和意愿，要马歇尔公平调停内战，促使中国国内和平，建立民主政权”^①的指示，决定以“迎接马歇尔来华调停”的名义，组织大、中学生采用合法的形式举行全市性的请愿活动，以显示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并通过斗争把大、中学生组织起来。“迎接马歇尔”是抗战胜利后上海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的第一次全市性的政治斗争，也是学生力量的一次显示。由于党组织利用了“迎接马歇尔”这一合法的名义，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镇压学生运动的种种伎俩，暴露了国民党要内战，反对和平的面目，既锻炼了参加斗争的众多学生，也教育了广大的群众。

利用合法的形式组织群众斗争，能使共产党人更广泛地发动和教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5—1949.5）》，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11页。

育群众,把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也使党的组织能更好地隐蔽在群众之中,而敌人对于群众的这种活动和斗争也难以取缔和镇压。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围攻中原解放区。接着又向华东和华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上海的政治环境随之全面恶化,白色恐怖笼罩。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及时调整了策略。如工委确定的对策是:紧密团结和依靠工人群众,不屈不挠地继续进行反内战和平民主运动。一方面在敌人的残酷压迫下,坚决要求实行工会的民主选举制度,反对国民党包办工会;另一方面发动合法的经济斗争,保护工人利益,以推动群众运动波浪式地发展。工委并对群众的经济斗争,制定了严格的策略原则,即:凡群众斗争,都必须与群众生活密切联系,以工会为中心开展活动,利用合法,不着重政治色彩,避免与国民党当局发生正面冲突;同时要注意与民族资本家合作,反对官僚资本,共同挽救民族工业危机。工委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都必须充分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懂得在客观不利的情况下,应该适可而止,知难而退。假如控制不住,说服不了群众,就找群众中有威信的人去做说服教育。总的来说,要同敌人坚持斗争,但策略上不硬拼,不作最后决战。^①

新怡和纱厂失业工人工会的成立可以说是坚持合法方针的一个典型事例。抗战胜利后,新怡和纱厂没有马上开工,失业严重,工人的生活难以维持。厂内的地下党员和工人骨干便建立失业工人工会筹委会,以尽快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为工作宗旨,开展失业工人的登记工作,由此受到群众的拥护,进而正式成立了合法的新怡和纱厂工会。这就给党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局面。

1946年初,年关将近,失业工人急需救助,这时恰有一批国际慈善机构的救济物资运抵上海,却被当局扣住不发。地下党即发动工人进行和平请愿,取得了胜利。该厂的失业工人又进而开展了争取“胜利费”的运动。地下党仍然坚持采用和平请愿的合法形式,及时阻止一些

^①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205页。

工人的过激行为。由于始终坚持合法斗争，争取“胜利费”的斗争最终也取得了胜利。^①

1947年6月17日至25日，江南造船所以“造船经费困难”为由，先后裁减309名工人，工人非常不满。中国共产党组织获悉，这次裁员是所长马德骥与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当即决定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开展合法斗争，反对裁员。因马德骥从不承认这次工潮是共产党领导的，反对进行镇压，共产党人即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桂永清，把被裁工人要求和解决造船经费结合起来。地下党一方面成立全体被裁工人和平请愿团，广泛宣传“今天拆篱笆，明天就会拆墙头，今天裁我们，明天就可能裁你们”，争取未被裁人员的支持；另一方面由地下党员向马德骥说明工人的态度，对其处境表示谅解，并告诉他被裁工人拟向政府要求拨给外汇、拨还修舰费用和补助造船费用，以缓和所内的经济困难，同时解决工人复工问题，以取得马德骥对工人运动的支持。不久，江南造船所利用举行接受日本赔偿军舰仪式的机会，发起和平的示威活动，把被裁工人的复工斗争推向了高潮。最终江南造船所工人的反裁员斗争获得了胜利，所有被裁工人分批复工。

2. 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

上海地下党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是党领导群众运动的基本原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应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觉悟程度，从经济斗争开始，把广大群众吸引和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进而开展适当的政治斗争，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这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疯狂劫收和发动内战，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异常困苦。因此，上海地下党在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始终紧紧扣住经济目标，不仅使群众消除了因涉及政治而产生的恐惧，而且使群众在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能得到实惠的利益，从而发动和团结了几乎所有的工人群众。^②如抗战胜利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第一毛条厂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148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页。

初期在工人群众中开展的要求救济、要求复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以及1947年上半年全市范围的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斗争。同时在全市和学校中,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助学运动和尊师运动,解决了4000名学生的学费困难,募集尊师款10亿元,解决了许多教师的生活困难。

这些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的经济斗争,事实上却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因为它打破了广大工人群众和学生对国民党自诩的“抗日英雄”的某种幻想,使他们看到了政府的腐败无能及自己团结斗争的力量。而频繁的工人斗争又使刚刚接管上海的国民党市政府和社会局焦头烂额,疲于奔命,并凶相毕露。蒋介石即由此命令国民政府司法部“严办奸宄及鼓动工潮者”。^①斗争既给当局以沉重打击,又给了广大群众经济上的得益。这对稳定和保持群众队伍的战斗力的作用,为以后从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由一个斗争高潮进到另一个斗争高潮做好了准备。

1947年2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有关白区工作的指示,特别指出,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地下党要注意把群众斗争联系和转移到经济斗争方面,“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②接着,中共中央又专门指示上海局负责人刘晓,进一步强调:“蒋管区的民主爱国运动应多从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口号着想,以利群众斗争的发动、深入和继续,一切带全国性的政治斗争,应从参加这一斗争的群众本身的生存问题着想,有计划地转到带地方性的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基础。”^③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上海局认真分析了上海社会的情况,认为解决生活问题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符合群众切身利益的口号,发动群众进行合法的生活斗争,可以抓住敌人的弱点,成为全面开展运动的突破

^① 1946年2月6日蒋介石给国民党司法部的电报,转引自《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口。因而，上海局于1947年4月做出决定：从生活斗争入手，突破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并使斗争不断发展，逐步与政治斗争相结合。^①正是根据上海局的这个决定和有关具体部署，地下党人发动了以南京为起点、上海为中心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其最初的斗争口号，就是国立大学学生的要求保障生活、增加公费、抢救教育危机。

虽然经济斗争非常重要，但在革命战争的年代，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工作毕竟不能游离于党的最终政治目标。把生活斗争或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的轨道上，始终是共产党人的主要目标。由于当时人民痛苦的最直接的根源是统治当局的反共内战政策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他们踊跃参加的生活斗争或争取生存的斗争，锋芒必将最终指向政治方面。参加1947年五二〇运动的广大学生，正是在最初的“要吃饭”过程中，认识到了没饭吃的根源是内战，从而进一步喊出了“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反饥饿运动由此升级为反内战运动，从而把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升华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并使两者获得紧密的结合。

实际上，按照当时地下党领导干部的看法，仅仅为了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必须开展必要的政治斗争，而不能一味退缩，否则同样是脱离群众。如1948年初，上海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民不聊生的地步，而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则变本加厉。地下党领导人认为，在广大群众基本生存已受到威胁的时候，领导群众开展争取生存的斗争是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就会脱离群众，使群众受到更多的迫害，因此，必须更好地组织力量，找寻机会同国民党当局较量。教育系统的共产党人，建立了教师、学生、家长、校长的统一战线，发起了一场“抢救教育危机”的政治性斗争。1948年2月，一千多名教师宣布建立上海各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会，前往市议会请愿，当局如临大敌，竟派警察包围教师队伍；共产党人即将队伍带出包围圈，在南京路举行了抢救教育危机大游行。结果，当局被迫答应发放私立学校的教育福利金，大批教师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接着,地下党又在6月组织私立小学教师五百多人去市教育局请愿,要求政府发给教师贷金和配给实物,坚持了27个小时,震动了全上海。经过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地下党在上海的中小学教师中建立了扎实的政治基础。到上海解放前夕,全市有中小学教师党员七百多人,全市三万多名大中小学教师中,有六千多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种进步教师团体。^①

发动经济斗争是群众的迫切要求,体现了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国共产党勇敢地领导群众开展这类斗争,既易于获得群众的支持,也易于取得合法形式,获得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同时,因为群众的生活痛苦是国民党统治、掠夺和剥削的直接后果,经济斗争的矛头也必然最终指向政治。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有机结合,不但保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有效地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3. 扩大统一战线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和孤立极少数反动势力,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的发展也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②

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时,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货倾销”、“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口号,实际上也是能够获得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同情甚至支持,这也使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范围更为广泛。当大批美国剩余物资涌入上海市场,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当时,因美国牛乳罐头的价格比上海生产的鲜牛奶还低,资本家被迫准备杀牛停业。工人便与资本家联合起来牵着奶牛上街游行示威,牛头上挂着“救救我吧”、“我要活命”的牌子,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

^① 马飞海:《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教师运动》,《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②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289页。

学生运动中也普遍实行了统一战线策略。一是学校内部的统一战线，就是努力争取教师和校方的支持；二是社会的统一战线，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重视联合上层民主人士和社会各阶层知名人士，扩大对敌斗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瓦解敌人。上海学生历次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生活自救性的助学活动都与尊敬师长，帮助和保障教师生活相结合。如1946年尊师运动中的收入，首先用来预发教师的几个月薪金，使教师免受物价飞涨的损害，保障教师生活。1947年5月在中学生反对会考制度的请愿示威中，也提出了提高教员待遇的要求，使学生的斗争得到教师的广泛同情，积极支持。为了扩大统一战线，争取社会支持，学生始终积极倡导爱用国货运动，还举办过劝用、销售国货的助学活动。1948年，大批日货进入上海市场，对已备受美货压迫的民族工业来说是雪上加霜。有的市民流着眼泪说“去了矮子来了长子，现在长子矮子一道来了”。上海学生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反对美帝扶植日本。1948年6月5日，全市学生举行了大规模“反美扶日”游行，反对“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反美扶日”运动，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社会著名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又使更多的校内教师、教授站到学生方面，如上海各大学校长、教授347人联名致电美国总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一些著名学者和交大、复旦等校教授表示“爱国无罪”、“学生坐牢我们一起去”，有的说：“我愿同大家一起去吃爱国官司”。社会上的统一战线与校内的统一战线相互结合，互相促进，使斗争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敌人更加孤立。

4. 分散斗争与集中斗争的交替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基于白区工作的隐蔽精干的原则，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十分注意掌握群众斗争的节奏，实行了分散斗争与集中斗争相互循环交替，从分散到集中，再从集中到分散，波浪式推进的策略。其要点是：在条件还不完全成熟的时候，只发动群众进行分散的此起彼伏的斗争；在形势有利，统治当局的弱点暴露，群众的情绪高涨时，就及时地把分散的斗争集中起来，采取突发式的进攻；而当统治当局醒悟过来，试图进行严厉镇压时，中国共产党人又化整为零，分散到群众中去了。

如1946年六二三争取和平反内战大游行以后,地下党及时引导各校开展分散多样的群众活动,做艰苦的深入细致的工作迎接新的斗争。1946年底,美国兵强奸沈崇事件发生,解放军则接连告捷,群众政治热情有所高涨,地下党就在1947年元旦集中开展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全市性运动。接着又进行了一系列分散的经济性斗争。当1947年5月1日新华社发表《全力准备大反攻》的社论,国民党统治区恶性通货膨胀加剧、国立院校学生一天伙食费只等于两根半油条时,上海地下党又开始酝酿集中的斗争。在全市中学毕业生举行反对毕业会考、沪江大学等学生要求校政革新和交大反对合并系科的斗争后,终于在5月19日爆发了国立和部分私立大专院校学生七千多人示威游行,喊出“向炮口要饭吃”、“到南京去要饭吃”的口号。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随后,各校又转入分散的生活自救性活动。1947年底,解放军大举反攻,而上海物价飞涨,人民到了无法生活的境地,地下党又集中开展了全市学生大规模的社会救饥救寒活动。紧接着于1948年1月17日开展了全市学生抢救民族危机、抗议港英当局九龙暴行的斗争。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分散活动的酝酿,又发动了全市集中的“反美扶日”运动。

上海地下党在这样的分散、集中相互循环交替的斗争中,不断积累和壮大自己力量,在发展中求巩固,在巩固中求发展。在集中性的运动中善于发展力量;在转向分散深入的斗争时,很好地把集中斗争中所取得的成果巩固起来,利用斗争的间隙进行群众性的休整提高,提高党员的斗争策略水平和广大同学的觉悟,扩大和提高积极分子队伍,发展党组织。

同时,地下党在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始终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见好就收,绝不冒险蛮干。党的领导机关始终十分清醒,即敌强我弱是上海的基本形势,决不可能通过一个运动、一次斗争就取得胜利;地下党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每一次斗争,每一个运动,达到提高群众的觉悟、密切党和群众联系的有限目标。因此,在斗争达到一定目的、形势有可能恶化之前,就要适可而止,果断收兵,不给当局以还击的机会,更不能让群众遭受严重的损失。解放战争时期的上

海地下党领导机关，对于这种斗争艺术的掌握和运用，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在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中，一些学校的学生由于激愤，通过了实行无限期罢课的决议。中共中央上海局立即看出：这种缺乏弹性的口号，不利于利用敌人矛盾，反而容易遭受打击，中间群众也会对旷日持久的罢课产生厌倦，从而使积极分子陷于孤立，因而立即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说服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动员群众做出休止罢课的决议。^①在1948年6月5日的“反美扶日”示威中，国民党当局已用装甲车、机枪、特务包围了交通大学等学生运动的主要基地。尽管一些学生情绪激昂，主张不顾一切冲出校门，显示自己的力量，但交大的党组织却相当冷静。他们在校内装上扩音器，向周围市民和包围学校的军、警、特务进行宣传，散发大量宣传品。结果，不仅不少市民深切同情学生，一些警察也受到感动，从墙外投进写有“我们同情你们”的字条。在学生向军警宣传时，负责指挥的警官竟进退两难：撤退，学生要冲出去游行；包围着不散，又怕军心动摇；不得不用“立正”、“稍息”和命令唱国民党党歌等办法来转移军警对学生宣传的注意。^②同年6月28日开始，坚持了27个小时的私立小学教师请愿斗争，在当局被迫答应部分要求并准备进行镇压的时候，也及时收兵，从而避免了可能的损失。

当然，在那种非常残酷的环境中，也不可能每次斗争都万无一失。1948年初，鉴于上海棉纺织业资方实行年终奖打八折，引起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上海地下党工委便决定组织工人进行反击，并由申新九厂带头发难。因为该厂规模最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亦较雄厚，有两个支部近30名党员，且在群众中有一定基础。这时当局已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镇压，该厂的斗争也未获得其他厂的响应。工委领导人见势不妙，于2月1日做出了收缩斗争的决定，但未能及时通知到该厂支部。第二天，一千多名配备着装甲车的军警包围该厂，工人在共产党人的带领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3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57页。

下,拒绝出厂复工,军警发起攻击,造成3名工人死难,二百多人被捕。^①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申新血案。

(三) 对群众的政治宣传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由于长期生活在沦陷区,相当一部分群众仍对国民党的本质认识不清,对中国共产党还抱有疑虑心理。因此,开辟党的舆论阵地,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更多的群众了解时局真相,破除他们中间对国民党的幻想和对共产党的疑虑,从而团结起来,投身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始终是上海地下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时期,由于地下党的领导吸取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教训,始终坚持白区斗争的十六字原则,充分依靠群众,利用一切机会,在政治宣传方面同样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1. 利用报刊等合法形式宣传群众

为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上海地下党成立了宣传委员会。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伪在上海的统治顷刻土崩瓦解。在国民党的统治尚未严密起来之前,上海出现了一段短暂的“言论控制真空”。上海地下党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公开的报刊,向群众进行宣传。上海地下党组织主要利用了三个方面的报刊。

一是由党直接领导创办的报刊。这方面的报刊主要有,《新生活报》(后改为《时代日报》),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份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报纸;《联合日报》,这份报纸以民间报纸的面目出现,借用美国新闻处的名义发行;还有《建国日报晚刊》、《联合日报晚刊》等。除了上述报纸外,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上海还创办、领导了多种杂志,如《文萃》、《经济周报》、《新文化》、《时代》、《文摘》、《消息》等等。

二是支持、影响并争取中间或中间偏左的民办报刊。这方面的报刊主要有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周刊;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此外1945年8月复刊的《文汇报》以及1945年5月创刊的《新民报晚刊》

^①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226—228页。

都是属于此类性质的报刊。

三是打入和利用国民党控制的部分报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上海掌握的报纸，无论从数量和发行量上都远远超过进步报纸。因此，打入并利用国民党御用的报纸，也成为共产党开辟舆论宣传阵地的一个重要方面。如顾祝同的《前战日报》、吴绍澍的《正言报》、孔祥熙的《时事新报》、汤恩伯的《改造日报》等，先后都有中共党员或接受党领导的进步人士在其中担任编辑和记者，甚至连《扫荡报》、《东南日报》也有进步力量渗透进去。

2. 利用群众文化活动开展政治宣传

随着国民党加强新闻控制和对进步报刊的迫害扼杀，公开的政治宣传越来越困难，上海地下党便充分利用群众组织的力量，在各个行业努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用群众文艺的形势传播革命思想。如通过工会、学生自治会及职工联谊会等群众团体在工人、职工、教师学生中建立歌咏队、戏艺组等文艺组织，召开各类文艺演唱会，大唱进步歌曲，演出各种活报剧。许多工厂的地下党员利用夜校上课的机会，秘密地教唱《山那边呀好地方》、《别让他遭灾害》、《团结就是力量》等解放区歌曲，教跳《秧歌舞》、《农作舞》等。许多学校组织学唱《我们的队伍来了》等歌曲，排练秧歌、活报、《人民翻身胜利舞》，画宣传画。由于群众性的文艺宣传活动，与现实生活、现实斗争紧密联系，既丰富了广大群众的业余生活，又传播了进步思想，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从而使更多的群众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此外，电影、戏剧、漫画、木刻、音乐等等都是党开展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比如，组织工人到杜美路杜美大戏院（今东湖电影院）观看苏联电影，从苏联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得到鼓舞和力量；还组织了一些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一起到外滩苏联领事馆门前去看屋顶上飘扬的苏联国旗上的镰刀斧头。通过这些活动，大家憧憬着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

3. 开展秘密宣传活动

在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的上海解放前夕，任何公开的政治宣传或进步群众文化活动都已丧失了活动的条件，上海地下党动员广大党员

和进步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秘密宣传活动。

许多撤退到解放区的党员写信回来,把解放区的情况告诉本厂的职工,鼓励大家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上海电话公司的一些党员来信在职工中秘密流传,把信纸都磨破了。法电党总支以朱俊欣的名义刻印500份给法电全体职工的信,要求大家“加强团结积极护厂,保证水电交通不停,迎接上海解放!”有的工人接到信后还贴在车站上,使人人都能看到。^①许多党员晚上在家里收听解放区电台的播音,把解放军的捷报和新解放城市恢复生产等消息记录下来,印成传单,在工厂、商店里散发,把喜讯带给更多的群众。江南造船厂的共产党员、“工协”会员以及团结在党的周围的积极分子一起出动,广泛散发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并动员工人行动起来,保护工厂,迎接解放;各种机器上、工具箱里、仓库的门缝里、办公室里的写字台上、抽屉里、厕所里到处都散发了传单,宣传了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揭露了国民党种种欺骗伎俩。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地下党的这些宣传是非常有效的。有些群众说:“共产党我们虽没有见过,但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种政府非垮台不可,我们再也不受他们的欺骗了;也有人说共产党从东北一直打到了长江边,消灭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国民党只会逃跑,说明共产党得民心,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失了民心。得民心的一定是好,失民心的一定是坏。我哪里也不去,就在上海等共产党……”^②

在高校中,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群众,通过个别漫谈、读书小组等社团的活动、举办辩论会等方式,宣传解放战争形势、解放军战果和党的政策。各校的地下党员普遍组织了读书活动,有的学校参加读书活动的学生高达70%—80%。^③交通大学的一次辩论会在教室举行,屋外草坪上还有许多群众通过扩音器收听;复旦大学的一次讨论会,有五百多位同学和十多位知名教授参加,发言踊跃,情绪

①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267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90页。

热烈，效果都很好。^①同时，地下党还在学生中传阅进步报刊，进行文字宣传，如将香港《群众》周刊的报道和评论、新华社的新闻和社论等，翻印后组织传阅。在积极分子中，则着重组织他们秘密学习《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件，加强思想武装。学生中的宣传工作往往非常有针对性。如当国民党散布“第三次大战将爆发”、“上海可能国际化”、“将发生第二次西安事变”等谣言时，地下党员着重宣传“第三次大战目前不可能爆发”、“和平的先决条件是蒋政府的投降和国民党统治的垮台”等观点，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解释，揭穿谣言，澄清某些混乱思想。^②当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党逼人太甚”、“国军负隅死战，吃苦的还是老百姓”等论调时，中共党员着重向群众宣传党提出的和平八项条件，区别真假和平，澄清思想，提高认识。^③

三、基本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党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坚决执行中央确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行动路线的指导下，才有这样伟大的成就。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党的政治主张正确合理，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

纵观这一时期，政治上已高度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基本政治主张都是符合国民党统治区一般民众的心理与要求。“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这一时期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成就非凡的最根本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88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73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86页。

原因。如抗战胜利初期,人民普遍希望迎来国内和平,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自然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国民党顽固坚持内战和武力消灭共产党,就等于自动站在与民为敌的立场上,倒行逆施,自然要被人民唾弃,尽管它拥有合法政府的正统地位。解放战争中后期,国民党为了支撑内战而滥发纸币,疯狂搜刮民间金银外汇,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将人民洗劫一空,并厉行特务统治,血腥镇压民众的抗议;而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还及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这无疑是最准确地道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不久以后,连一份经常为国民党张目的刊物都明目张胆地写道,国民党已到了“国人皆曰可×”的地步。^①

上海地下党在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政治号令时,善于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上海社会的特点和不同阶段群众的情绪和要求,进行创造性的发挥,提出一系列深得人心的行动口号,实行正确的决策。例如,当因国民党当局对日伪产业腐败的接收而导致上海企业大量停产、大批工人生活极度困难时,地下党领导群众开展了要求救济、要求复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当通货膨胀严重降低了工人群众的实际工资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要求解冻生活费指数的斗争。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蒋管区民主爱国运动方针的指示》,曾提出“在蒋管区的这些城市民主爱国运动,应暂保持平静状态……而多作防御性的合法斗争”^②。但上海分局全面分析了上海的形势,认为从当时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上层民主人士的思想状况来看,仍有开展大规模合法斗争的可能。因而决定发起从群众的经济斗争入手的五二〇运动。如刘晓所说,在这一群众运动中,“由于我们提出了符合广大群众要求的口号,团结了广大群众,使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取得了各方面民主人士和许多大学教授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工人运动的大力

^① 据苏智良、朱华:《民国史上最丑恶的一章》,《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4期。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5—1949.5)》,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589页。

支持，使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结合起来。这就使国民党政府陷入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①

第二，始终坚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党的白区工作基本方针。

上海地下党的领导机关和各级组织始终遵循秘密斗争的原则，高度隐蔽，即使在群众政治热情急剧高涨、斗争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仍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骄不躁。地下党的领导机关不断教育提醒基层组织和党员，要防止被胜利冲昏头脑，碰得头破血流。既要防止和克服消极隐蔽，为合法而合法，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思想，也要反对急躁、暴露，脱离广大中间群众，为斗争而斗争，把斗争硬化的“左”的冒险思想。因此，尽管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群众的政治热情还是地下党的力量及其在群众中的威信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却基本没有因领导机关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惨重失败。即使前述惨烈的申新血案，也没有造成该厂党组织的瓦解，相反，到上海解放，全厂又有二十多名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这与土地革命时期企业工潮一遭失败党的工作即一蹶不振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时，地下党始终坚持了严格的党员发展标准，确保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地下党在发展党员时始终强调质量重于数量。一般都是先在群众运动中发现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然后加以严格的考察，坚持成熟一个，吸收一个的慎重方针，稳妥地积蓄革命力量，而不再像十年内战时期那样搞突击发展，贪图数量。严格的吸收党员的政策，虽然在一段时期内不能使党组织得到大的发展，但严格的发展标准保证了党组织的稳定性和战斗力，而这正是这一时期群众工作辉煌成就最有力的组织基础。

第三，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决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页。

^②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230页。

奋斗。由于党的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党员都生活在群众之中,对群众的疾苦、需求和情绪,了解至深,因而能够及时提出符合群众心理的各种口号,做出符合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决定。几乎所有的经济斗争要求,都是从群众中来,由中国共产党集中起来,再成为群众的斗争目标的。从复工斗争,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到反饥饿反内战,一直到确定国统区群众斗争的基本口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都是如此。以反饥饿斗争为例,这个口号本身就是来自群众,工人为冻结生活指数所困,喊出:“向炮口要饭吃”,党组织将群众中来的呼声,集中起来,形成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基本口号。五二〇惨案发生,学生遭受残暴殴打,又补充了“反迫害”的口号,这都是广大群众在求生存斗争中的切身感受。因而这些口号能不胫而走,传播到了全国。

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把他们的呼声集中起来,提炼成斗争的行动纲领,组织他们为自身的利益,也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这就是上海地下党、也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在最险恶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动员和领导群众,不断走向胜利的秘诀。

结论与启示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城市群众工作的意义

政党是基于利益代表性而指向权力的政治组织。政党获取执政权力的方式大致有两种：其一，革命斗争。即通过革命推翻旧统治，建立新政权，从而获得合法性权力；其二，民主选举。即在政党制度下通过民主竞选赢得多数支持，从而获取政权。如果旧政权、旧制度不允许新的政党运用民主手段、和平方式夺取政权，新的政党只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去推翻旧统治。这种诉诸革命方式的政党就是革命党。

对革命党来说，其主要任务即是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础，积蓄力量，最后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旧的统治，从而夺取政权。革命党建立政治基础，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即建立武装力量，通过革命战争来组织和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二是群众工作，把千百万的人民团结在自己的政治纲领下，并将之组织起来，参加推翻旧政权的革命斗争。事实证明，对于成功的革命党来说，这两者均不可偏废。所以，革命党都有将群众动员、组织到自己政治纲领下的活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群众工作。

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就为新社会的建立而不懈努力。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基本没有合法地位，它在军阀政治环境中产生，继

而被掌握了政权的国民党污蔑为“匪党”，遭到严厉镇压，即使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它也没有可靠的合法地位。所以，中国共产党要推翻旧政权，必须充分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无疑是革命的根本道路。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群众基础，武装斗争并不可能维持。当然，通过农村的土地革命，把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动员、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但同时，它在城市中的群众工作也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城市的群众斗争往往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城市工作有助于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甚至国际影响；第二，城市的群众工作，为中共动员城市中的人力、物力资源以支持革命战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第三，城市中的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坚实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共的城市群众工作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基础环节之一。

由于缺乏合法地位，城市中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利用自身的特性资源和城市社会的特点建立特殊的群众工作模式。其一，建立、发展城市中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依靠集合在基层党组织中的党员，去影响、团结和凝聚广大群众。其二，用有效的方式去动员群众，其中包括对群众的组织、开展政治上的宣传、发动群众的斗争，及适应秘密工作原则的策略方针。通过有效的城市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才能不断扩大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政治影响，建立深厚的政治基础，从而给革命战争和新政权的建设提供巨大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先进性，决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独断，而是必须非常具体地体现在其全部政治实践活动中。因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来就不是虚幻的远景或空洞的断言，而总是表现为他们大量的切身利益、实际利益，这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广大人民群众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践，切身感受到党的主张、实践与他们利益的一致，才会摆脱统治阶级铺天盖地的诋毁、攻击的影响，承认它的先进性，从而接受、拥护其领导。没有党代表群众利益的具体实践，没有群众的切身体验，连合法地位都不具备的中

国共产党,即使有最高明的宣传或理论证明,也决不可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本质上也就是用自己的具体行动来代表群众利益、服务群众需求、动员群众斗争、赢得群众支持的过程。在白区,这一过程也就是处在地下的党组织获得非权力性权威的过程。这种权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群众中所享有的崇高威信与实际的号召力,建立在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也就是党组织能够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党员高尚的精神风格基础之上。正是依靠着这种权威,处于地下的党组织能把广大的群众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成为有效地凝聚群众和组织指挥群众行动的政治核心,使中国共产党受到群众真诚的信任与爱戴,党的政治主张获得普遍的拥护,并使旧政权成为全民公敌。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白区群众工作是夺取政权的重要基础。

二、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

上海是近现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重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直在这里坚持不懈地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在这28年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失败教训,但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可以说是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根据本项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功主要可归结为四个基本经验,它们构成了党获得非权力性权威的群众工作模式。

(一) 党的纲领路线切实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归根结底表现在它的奋斗目标代表了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能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代表人民群众现实利益、因而必定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具体奋斗目标。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但是,要让城市中的广大群众理解这个正确的纲领,空洞的说教毫无意义,因为普通群众不会理解,也没

有理由相信。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也不掌握大规模政治宣传所必需的资源或条件。它必须通过具体的、群众可以实际感受到的主张、行动,来证明自己政治纲领的合理性。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不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领导人民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能够使群众获得实际利益,包括与他们实际生活休戚相关的政治利益、民族利益;这样,群众才会信任、尊重并追随党的领导。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在大部分时间是正确的,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正是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成功的最深刻原因。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致力于发展工人运动,争取工人阶级的基本权益,政治斗争的锋芒,始终指向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权。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主要任务,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在总体上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中国共产党未能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对上海的群众工作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党的许多具体主张严重脱离群众,不仅所提出的许多政治口号、政策是错误的,如“武装保卫苏联”、“反对改良主义”之类,开展斗争的许多策略也是荒唐的,如赤色工会的关门主义、飞行集会、强行给经济斗争抹上政治色彩等。在这种错误路线指导下,中共党组织只会给群众带来惨重的损失,因而必然会被广大群众所抛弃。这也正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惨遭失败、党的组织虽然讲究秘密工作技术却难免丧失殆尽的根本原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实行着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方针和政策,因而得到了群众真诚的拥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中国共产党坚持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以领导人民群众坚决抗战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在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建国的主张,坚决反对内战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

又及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白区工作方针，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高度重视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和指挥艺术，以保护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决不允许轻举妄动，急躁冒险。这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策略思想，恰成鲜明的对比。

长期担任上海地下党领导工作的陆志仁曾深有感触地写道：“正确的路线就给党的各方面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党的主张得到群众的支持，就使党不脱离群众，就创造了开展党的工作的更多的有利条件。”^①显然，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就是群众工作成功的前提。换言之，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最好的试金石。

（二）努力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斗争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经济利益的冲突。因而，脱离群众实际利益的政治活动，很难指望群众的积极参与。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民众的政治参与心理受人们的个人利益、个人享有权利的支配，当个人享有社会赋予的权利，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并只有通过社会利益的实现才能实现个人利益时，人们就会以积极的、热情的态度去对待、维护和发展一定社会利益的社会政治活动。^②从群众的基本利益入手，开展经济斗争，并在斗争中唤醒群众政治觉悟，进而吸引群众参加维护其根本利益的政治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基本策略。毛泽东曾精辟地概括说：“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

^① 《陆志仁文集》，陆志仁纪念文集编辑组 1993 年印，第 176 页。

^② 蒋云根：《政治人的心理世界》，学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8 页。

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①从根本上说,对敌斗争取得胜利,也就是群众利益的实现。因为在革命时代,群众利益几乎都须通过斗争得来,没有胜利,群众很难获得实际的利益。

通过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取得群众的信任与拥护,灵活地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就是上海地下党在这一策略中的具体经验。

1. 在不同政治环境中开展维护群众利益的经济斗争

如前所述,上海地下党曾建立了两种适合于不同政治环境的群众斗争模式,即公开斗争模式和秘密斗争模式。而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以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凝聚、组织和动员群众的主要路径。在可以开展某些合法活动的政治环境里,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斗争模式是,通过组织正规的工会、合法的社会团体,充分利用合法、公开的手段方式来组织指向经济利益的群众运动,如领导工人向资方发起维护工资、工作条件、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斗争,从而有效地建立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运用公开斗争模式所组织的政治斗争,多数也与群众切身的政治利益密切关联,如争取建立工会组织的权利,抗议残杀工人,反对镇压群众运动,维护民族尊严等。在秘密斗争模式中,地下党更以关心、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作为工作基点。基层党组织的成员首先必须生活在普通群众之中,靠普通职业谋生,与普通群众同甘共苦,随时掌握群众的动向;然后,采用合适的、往往是非政治的形式将群众组织起来,启发、引导他们开展维护自身权益的活动或斗争;这些活动或斗争一旦获得成功,基层党组织或党员就会获得群众的信任与尊重,从而可以开展政治宣传或教育,逐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让他们感受到共产党与自己利益的一致性,相信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利益的真正代表;最后,则是把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培养成党员,发展党的组织。

没有对群众利益的真实关切,党根本不可能接近群众,组织动员群众更是无从谈起。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3页。

2. 以经济斗争推动政治斗争

经济斗争的直接目标是实现群众的现实利益，这一目标的实现，却能有效提高群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意识，进而有力促进政治斗争。上海地下党在群众工作中，善于根据不同层次的群众利益要求，以经济斗争为突破口，有力地激起群众的政治热情，从而为政治斗争扩展了社会基础。如，抗战时期上海党组织针对邮政当局的工资打折，领导邮工进行反减薪斗争，由于支部维护职工切身利益，深受群众信任，群众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助社，为其开展政治斗争提供广泛的社会基础。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学生“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就是从学生“要求保障生活、增加公费、抢救教育危机”开始，引导群众认识到饥饿的根源是国民党反人民的内战，进而开展了以“向炮口要饭吃”等为口号的群众性政治斗争。

正是由于群众性政治斗争的目标并非来自群众难以理解的抽象理论或空洞说教，而是其经济利益的必然升华，因而，这些斗争很容易获得群众真诚的支持与参与。这就是上海地下党以一个秘密而人数有限的政治组织，屡屡掀起整个城市政治生活中惊涛骇浪的根本奥秘。

3. 政治斗争必须注意保护群众的实际利益

开展政治斗争，以动摇乃至推翻现有政权是革命党的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了最终完成这个任务，即让群众在维护自己切身权益时，逐步认识到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上海地下党的经验表明，群众在经济斗争中感受到政治斗争的必要性时，确实会勇敢地参加。但是，由于中国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反抗历来实行极其残酷的镇压，群众参加政治斗争，往往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而普通群众参加政治斗争，一般却以自己的利益不遭受太大损失为限度；如果斗争失败，或群众遭受过大的牺牲，他们的情绪就会受到严重打击，甚至对中国共产党这方面的号令望而生畏。因此，地下党组织在开展政治斗争时，必须始终关心群众这方面的切身利益。

上海地下党成功领导的群众性政治斗争，一般都相当注意这个问题。大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在动员工人开展政治性罢工时，总是设法为工人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否则根本无法坚持长时间的斗争。从抗

战开始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在发动群众性斗争时,始终注意避免群众的牺牲,尤其在上海沦陷后和解放战争后期的最黑暗时期,中国共产党基本停止了锋芒直指统治当局的政治斗争。这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群众斗争时,特别强调胜利的原则,强调策略上的机动灵活,见好就收,避免硬碰,也主要是出于保护群众安全及其斗争积极性的考虑。土地革命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的群众斗争策略,则提供了反面教训。当时地下党片面强调政治斗争,要把一般的罢工变成政治罢工,把政治罢工扩大到武装暴动,没完没了地发动飞行集会、街头斗争,几乎根本无视群众的利益要求与觉悟程度,甚至不考虑他们的安全,包括基层党员的安全。随着这类斗争的一再失败,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及单一的政治斗争便产生了严重的厌倦甚至恐惧的心理,党也就此失去了多数群众的拥护,党的群众工作陷入了最低谷。

(三) 群众组织的有效利用

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群众(民间)组织作为团结、凝聚群众的工具、手段或路径,甚至利用包括既有的或落后的群众组织形式,如帮会、结义等,是上海地下党成功聚合群众支持的重要经验。当代政治学理论认为,社会是支撑国家发展的基础,政党要想取得国家政权,必须赢得社会的支持和认同。社会中的各种群众组织或民间组织是政党控制和整合社会的重要资源。特别对革命党来说,能否有效利用社会团体等资源,直接关系到它能否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能否取得革命的成功而夺取政权。革命时期的上海地下党就广泛依托各种群众组织,在秘密斗争环境中打开了群众工作的局面。

1. 依托工会开展合法斗争

工会是党直接动员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组织工会、促进群众性的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在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上海,地下党一直将工会作为组织、动员广大工人群众的主要依托和突破口。其主要经验是:第一,建立公开的或秘密的工会与招牌工会、黄色工会、反动工会等相抗衡。上海地下党主要通过开办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进行初步的宣传教育,进而

吸引工人参加各种工会。如大革命时期中共党校建立的上海总工会及其下属基层工会，几乎涵盖了整个上海的工人阶级。解放战争时期，通过实际掌握基层工会的领导权，地下党把多数工人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第二，通过工会用合法方式开展维护群众权益的工作。第三，正确处理党组织与工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不能包办工会、替代工会，也不能不闻、不问、不管工会的具体工作，而是努力引导工会，通过党员或工会党团或积极分子对工会的领导来指引工人斗争。土地革命时期，上海地下党就因领导的赤色工会过于政治化，从而出现包办工会与脱离群众的困境，致使党失去了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2. 充分利用各类社团

各种民间社团也是地下党团结、联系群众的重要载体。上海地下党一直重视筹建、组织、指导这些社团，通过社团结成的社会网络，围绕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来吸引、动员各阶层的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具体做法有：

第一，通过建立社团团结群众。上海地下党公开建立的社团，大都指向经济目标，并采取与群众关切度高的活动方式来吸引群众参与，从而起到联络和动员的作用，并在其中扩大了党组织的影响力。如抗战时期上海工委系统建立储蓄会、福利会、互助会、消费合作社等各种公开合法的社团，通过为工人生活解决困难、开展经济互助等方式，把广大群众包括大量中间的落后的群众直接、间接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职委系统运用业余联谊会、兴办补习学校的形式和成立不带政治色彩的社团，将职员联系起来。当然，也有一些社团是政治性的，如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些团体。但由于政治环境的局限，这类社团的生存期都很短。

第二，利用社团引导群众开展斗争。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引导社团的活动内容和方向，并领导社团进行有序的斗争，是上海地下党社团工作的重要方式。比如，1937年1月，中共云飞汽车公司地下党支部领导广大司机，通过联谊社召开各方面代表会议，提出了确立联谊社地位、保障司机职业、提高职工福利待遇等条件，与资方进行坚决斗争，迫

使云飞汽车公司资方签订《劳资条约》。^①

第三,运用社团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工人夜校、读书会、读书小组等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集中教育,成为沟通群众的有效方式。如,在抗战孤岛时期以各种形式创办的工人夜校不下二三百所,工人通过夜校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为中国共产党面向生产、深入工厂,培养了骨干力量和工运领袖。

3. 注意利用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

在近代中国,很多社会群体内部都有一些传统的内部维系方式,如帮会、同乡会、结义等。这种内部维系方式虽然形式上是落后的,却有着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了团结尽可能多的群众,上海地下党从不拒绝利用这类社会资源,而是积极借此来拓展联系群众的渠道,甚至用以组织群众。主要表现为:第一,借助于同乡关系、裙带关系等个人关系渗入有群众、有影响的传统组织中,以此接近群众。利用帮口或帮会,或与群众骨干拜把结义,曾是上海地下党在开展初步的工人运动时普遍采取的方法。第二,利用传统纽带组织群众。基于普通群众的思想水平和对于传统纽带的偏好,中共党组织往往通过派遣党员打入,甚至自己发起组织等方式,对这类组织所联结的群众进行沟通、动员、教育。如上海全面沦陷以后,许多基层党员利用所掌握的慈善团体、同乡会、结拜兄弟姐妹、基督团契等群众所熟悉的形式接近群众,吸引群众加入该组织,从而获得团结、教育群众的机会,进而扩展党组织的影响力。事实证明,这种灰色组织和传统关系有时确实有强大的凝聚力。但总体来看,此种模式的群众工作具有不稳定性,一旦斗争失败或处于政治高压下,传统组织和力量便微不足道了。

利用群众组织来凝聚社会力量,不仅是上海地下党秘密斗争模式的明确选择,还是党扩大社会基础的重要方式。而中国共产党在运用这一模式中也注意到了要通过形式不同的群众组织开展工作,并对不同的群众组织采取不同的工作策略。

^① 《上海出租汽车、人力车工人运动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8页。

（四）共产党员的人格力量

上海地下党之所以能成功开展群众工作，并逐渐为广大群众所拥护和爱戴，一个主要原因就在共产党人在群众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的人格力量，始终发挥着强大作用。这也正是基层党组织获得非权力性权威的重要基础。总体说来，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表现为三个层面。

1. 坚定的政治信仰和高度的献身精神

在白色恐怖之下入党的共产党员，普遍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他们对共产主义高度忠诚，有愿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而且意志坚强，英勇无畏，不怕艰难险阻，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坚持为党工作。这样的党员，自然有特别强的战斗力。如上海工运早期的活动家李启汉，在1922年1月、2月，就因组织工人运动而两次被租界警方拘留、传讯，但李毫不畏惧，继续活动，直到当年6月被判刑入狱；李启汉的献身精神，竟使一个审判他的法官也感到震惊，说：他对很有学问的被告（李启汉）表示同情；被告应为国家做些有益的工作，何以对煽动工人罢工和引起纠纷感到兴趣？^①共产党员茅丽英，原是上海海关的英文打字员，收入较高且职业稳定，后来又有多家企业请她出任公关经理，但她情愿按照党的要求，从事艰险的抗日救亡工作；当她被汉奸暗杀后，引起全上海群众的愤怒，冒着危险前往吊唁的民众多达数千人。并不仅仅李启汉、茅丽英这样的著名先烈具有这种高尚的献身精神。一些默默无闻的共产党人，同样如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份档案显示，沪南区市政工委会委员长是个黄包车夫，穷得晚上只能睡在弄堂里，还欠了几十元高利贷，却按照组织的要求成功地发动了一次车夫的罢工。^②一个身为学徒的青年党员，仅仅为了争取单位里一个有影响的职员以打开群众工作局面，就每天花时间为他的两个孩子补习功课，最后取得了老职员的信任连同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的理解，这位老职员后来成为这个单位群众斗争的领导人。^③

①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② 《江苏省委关于黄包车问题的报告》（1934年11月21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85页。

③ 《陆志仁文集》，陆志仁纪念文集编辑组1993年印，第174页。

在有很大风险的群众斗争中,尽管组织上严禁党员暴露身份,但党员却往往是最勇敢的冲锋陷阵者。在1947年1月的同济大学学潮中,地下党学委书记吴学谦、同济大学党总支书记乔石等一直在现场亲自指挥;在当局武装镇压申新九厂工潮时,党员个个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许泉福用卡车抵挡军警的装甲车,产假后上工才三天的何宇珍左腿中弹,仍坚持带领群众,杨光明被捕后竟被判处无期徒刑。^①

这样的献身精神,在任何时候都将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更不用说当时围绕在他们身边的群众了。

2. 高尚的道德操守和出色的职业素质

同时,地下党员也普遍有着高尚的人格、职业上的敬业精神和出色的能力,因而,即使不暴露政治面貌,也会在群众中享有自然的威望。没有大学学历的青年党员顾准,依靠自学成才,二十多岁就成为上海著名的会计专家,兼任两所大学的会计学教授,月收入三四百元,当他因工作需要放弃合法职业时,他的雇主、著名会计师潘序伦受到极大的震动。“潘看到顾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不拿,却到新四军去拿三元钱的津贴,认为共产党员真了不起”,解放后,潘对顾的领导讲起此事,还潸然泪下。^②地下党员范小凤以一名普通工人的身份打入内外棉一厂,就以娴熟的技术、热诚待人的态度,取得群众的信赖。正是靠着自己的人格魅力,范很快就团结了群众,打开了工作局面。^③实际上,具有良好的道德情操和职业能力,享有群众威信,既是党组织对党员的要求,也是发展党员的重要标准。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领导机关曾明确要求基层组织:“选拔出那些群众中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分子……以便得到好的发展。”^④这样一批在职业生涯中就表现出良好的德才素质、群众公认的优秀人士进入党内,自然会相当有效地提高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望与号召能力。

^①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228页。

^② 《陆志仁文集》,陆志仁纪念文集编辑组1993年印,第126页。

^③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17—118页。

^④ 转引自《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5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页。

3. 对群众利益的深切关切

绝大多数地下党员，就其社会身份而言，都处在社会底层；他们贴近下层群众并了解社会。抗战时期要求基层党员实行“三化”和“三勤”以后，更多的党员生活在群众之中，感情和切身利益都与群众休戚相关。因而，他们始终能够很好地了解群众的需求、情绪。抗战时期，每个基层支部都按照领导机关的要求，对自己单位和周围群众的情况不断作深入的调查了解，并往往采取分散的、个别联系的方法，就群众最关心的生活问题、职业问题、抗战形势与国家前途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用自己的语言、群众能够接受的水平，进行生动的宣传。许多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还特别注意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如带头推动群众之间的互助；有的职工家里断炊，党员拿出了自己仅有的粮食；群众跑单帮，党员或是一起去，或是帮助他们完成单位的工作。党员对群众生活的帮助、对群众利益的关心，直接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群众对于党所开展的革命斗争和运动自然也会产生认同。

而地下党的领导机关，更是始终把听取群众呼声、为群众谋取实际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抗战初期，中共江苏省委即明确指出：领导群众的日常反日斗争“应密切联系到群众生活问题”。^①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几乎所有的经济斗争要求，都是从群众中来，由党集中起来，再成为群众的斗争目标。实际上，党绝对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对群众的利益负责，已是许多干部的强烈信念。如1948年1月，由官僚资本主导的纺织行业资方决定“年终奖打八折”，地下党工委经研究后认为，这“损害了工人群众的利益，是国民党官僚资本向工人进攻，如果在年终奖问题上让步，是脱离工人群众的”，随即由申新九厂带头发动工潮。^②虽然这次工潮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血腥镇压，当局并公开发出了“游行示威者格杀勿论”的暴虐威胁，地下党教委仍认为，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群众的生存已经相当困难，“如果我们不去领导群众的斗争，就

^① 《真理》，革命报刊资料丛编第1辑，第110页。

^② 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226页。

会脱离群众,使群众受到更多的迫害”,^①仍决定组织教师争取生存的斗争。

有这样一支感情与群众息息相通、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员干部队伍,地下党自然始终能够把握群众的情绪,掌握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战无不利。

三、有益的启示

在革命年代,上海地下党从最初的默默无闻、鲜为人知,到被群众熟悉、接受,再到大批群众集合在党的旗帜下,听从党的号令,英勇战斗,这就是群众工作彰显效力的过程。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和宝贵的经验,能给现实的工作以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 基层党组织必须善于建立自己的权威

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实际上是尚未掌握政权的革命党获得权威的过程。

在政治学中,对权威有不同的界说。这里说的权威,仅指一种独特的关系,即“它不同于任何强制性的关系,因为要求遵从的话语依赖于说话者先前已有的权威,而并不取决于其随后出现的造成不必要效果的权力;它也不同于说服和劝告的关系,因为要求遵从的话语并不依赖于求得听众同意说话者所要求的而使用的那些论据”。在政治上,这种权威的本质,就是要求的提出者在政治方面有比他人更多的知识、洞察力或经验,被公认为能做出合理的决定,或者说,他所做出的决定被公认为反映了共同体的共有价值。^②这种权威,并不建立在权力基础上,没有强制的成分,而是群众的一种自愿服从、遵从。所以,如果遵从广义,把权威界定为对于他人意志的服从,包括对权力的服从,则本书

^① 马飞海:《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教师运动》,《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156页。

^② 据戴维·米勒、维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所提到的权威，可以称为非权力性权威。毫无疑问，上海地下党在获取非权力性权威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对于所有的政治系统来说，政府或执政党都希望增加自己的权威或非权力性权威，以便减少获得民众服从所付出的代价，加强系统范围的稳定与秩序。^①今天，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本质上也可以说就是权威性缺失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基层党组织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党组织同过去战争年代相似，并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而主要是通过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来团结和凝聚群众，从而保证党的决定的贯彻落实。例如，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张友渔回忆说，市政府的党组只决定大政方针，而不干预行政部门的具体执行问题；就是党组的决定，也不是直接对政府发号施令，而是通过政府中党组的成员来实现，有些政府官员是非党人士，则通过党员的工作来加以引导、影响，而不是命令他。^②在基层，同样如此。刘少奇在195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有一二百名党员以上的工厂、矿山、机关、学校中的支部，才配备一个或几个脱产的党的工作人员。^③按照后来的标准，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也足以说明其时基层党组织的职能比较有限。

中共八大前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国有企业开始统一实行党委领导制。此后，基层党组织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单位的行政权力，甚至曾出现过党总支或党支部乃至党小组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④尽管196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工业七十条（草案）》明确否定了这些极端的做法，但党政不分的趋势已无法扭转。绝大多数的基层党组织在制度上成为各级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直接掌握着基层单位主要资源的支配权力。

① 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② 张友渔：《十年京兆》，《北京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

④ 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63—965页。

正是凭借着这种由制度赋予的掌权地位,所有基层党组织都可以名正言顺,并极其有效地在绝大多数的基层单位发挥领导决策及凝聚群众的作用。

这种直接掌权的地位,决定了基层党组织对群众的巨大权威性和凝聚力。计划经济时代事实上的劳动者单位所有制,使得单位掌握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绝大多数资源。例如,住房需要单位分配,结婚需要单位证明,邻里纠纷需要单位出面调解,变更职业需要单位同意。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更完全取决于单位:获得单位领导欣赏的人可以得到提升,与其生死攸关的政治结论由单位做出。因此,人们的个人利益高度依赖单位,依赖单位的行政权力。既然单位的行政权力,直接由党组织掌握,党组织成为权力的同义语,其权威性自然不言而喻。

同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利益关系比较简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位的利益,可以等同于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因此,基层党组织以本单位的工作任务为中心开展工作,从本质上说,都符合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易于为群众所接受。

因而,这时的基层党组织完全能够依靠自身的权力地位,对群众进行非常充分的政治动员,并能十分有效地围绕着单位的工作任务开展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起到单位中的政治核心的作用。正是主要依靠这种实际上来自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加上广大基层干部党员的努力,基层党组织能够顺利地行使党章规定的功能,并形成了一整套符合这种环境条件、行之有效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

当然,在劳动者单位所有制的情况下,基层党组织这种看似强大而且有效的凝聚力和政治动员能力,有多少是属于群众的真心拥戴,又有多少纯属行政权力对于个人私利的吸引力,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至少在“文革”前夕,党内对于基层组织状况的估计,已存在着分歧。尽管主要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发动的“四清运动”,存在着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错误,但运动所揭示的许多基层干部存在的作风问题,脱离群众问题,甚至一定程度的腐败问题,恐怕难以否认。而从目前腐败现象来看,可以肯定,主要为着私心而非政治理想才靠拢并加入党组织的投机分子也为数不少。这种人未必真的拥护或理解党的宗旨和政治

路线，仅仅是因为接受党组织的号令，积极服从、靠拢党组织，认真工作，可以获得个人的利益。这作为一种工作态度本身当然无可厚非，但它的思想基础，却不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种真正的政治觉悟。因而，这种“非革命的革命者”一旦掌握了失去制约的较大权力，就很容易私欲膨胀，走向滥用职权、损公肥私，甚至鱼肉人民的犯罪深渊。

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党组织的地位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农村村民自治的稳步发展，党政分开在不断推进，国有企业及农村基层党组织直接掌握权力的功能日益弱化。另一方面，在日益壮大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及社区等新成长起来的社会基层单位、领域中，党组织更基本上已没有制度化的行政权力。至少，在那里的基层党组织已不能再直接提供人们切身利益。而且，可以预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及农村村委会直选的日益推广，大多数基层党组织不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同时，随着劳动就业形式的多样化和福利事业的社会化，单位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掌握着多数的个人利益资源，人们对单位的依赖大幅度下降。最明显的事实，就是离开原来意义上的工作单位，不少人同样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进而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甚至达到人生辉煌的境界。例如，自己创业，供职外资企业、私人企业，从事自由职业等。因此，即使基层党组织能够掌握单位的行政权力，也不会对群众产生过去那种巨大的吸引力。这是一个彰明的事实。

不言而喻，目前的基层党组织如果继续指望依靠法定权力发号施令，或者沿袭计划经济时代以行政权力为依托的工作原则与方法，根本不可能获得过去那样的权威性，从而也无法承担起党章规定的许多功能。这也正是目前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最大困难。

因此，学会在不掌握行政权力的情况下获得权威的能力，应该是当前基层党组织最迫切的任务。这就是，今天的基层党组织能够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善于通过自己的有效工作，而不是依赖制度赋予的权力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尊重，建立起自己的威望，从而成为群众真正的政治核心，能够引导群众，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合法地位的解放前,上海地下党就能做到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执政的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就更有充分的理由做到这一点。

(二) 党员必须切实保持先进性

历史的经验表明,民主革命时期的地下党组织能够成为群众的政治核心,除了党的政治主张、政策深得民心外,党员切实地保持着自己的先进性,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党员的先进性并不是空洞的口号或自我标榜,也不仅仅是能够口若悬河地进行政治理论的宣传和鼓动,而是突出地表现为他们普遍具有高尚的道德操守和人格魅力,即无论在职业生活中还是社会生活中,都能成为群众公认的优秀分子。地下党员普遍怀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愿意为自己信仰的崇高事业而献身,因此能够不计个人得失,忠诚为党工作,并始终保持着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自觉地把群众利益与党的政治使命完美地结合起来。正是通过他们的身体力行和先锋模范作用,群众看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信服共产党的主张。

当前,某些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党员或党的干部未能很好地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不能发挥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有的党员不能表现出比一般群众优秀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操守,有的则因为过多的利己考虑,丧失了对群众利益的关怀与尊重。个别基层领导岗位甚至被以权谋私或称王称霸的腐败分子所占据。在党员个体不具人格魅力,甚至被群众鄙夷的情况下,缺乏行政权力依托的基层党组织肯定无法建立在群众中的威望。

因此,基层党组织必须有效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使党员无论在单位里还是社会上,都能自觉执行党的号令。从上海地下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党员必须强化两个意识。

第一,政治意识。这就是:党员不仅要成为职业工作中的模范,还必须能自觉承担宣传党的主张、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团结和引导群众的责任。共产党本来就是政治组织,加入党组织就意味着拥护党的政治主张,愿意从事相关的政治活动,在实践中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奋斗。因此,党员仅仅在本职工作中表现积极、发挥模范作用是远远

不够的。他们还必须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在职业生活以外也积极主动地为党从事引导、教育、团结群众的政治工作。^①而政治工作的核心，应该是围绕群众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按照党的方针政策，为他们排忧解难，或进行说服引导。随着新成长的社会空间不断扩大，党员的政治意识对党的群众工作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关心群众利益的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宗旨，而关心周围群众的切身利益，正是为人民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只有切实关心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才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政治基础才会不断巩固和扩大。因此，党员在对群众进行教育、引导时，必须始终注意关心他们的利益诉求，这也是群众工作的最有效方法和路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②

同时，在党员的发展工作中，我们也应该学习历史的经验，注意吸收那些有良好道德情操、出色业务能力并享有一定群众威信积极分子，并坚决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只有切实保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才能通过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而获得非权力性权威，成为真正的政治核心，从而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

① 参见冯小敏：《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38—139页。

(三) 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基层党组织最核心的功能

上海地下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关注并切实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也包括基本权利、社会正义等政治利益,是党的基层组织获得群众拥护、建立起权威的最重要条件。这条基本经验,仍然适用于今天。因为政治的本质问题,就是利益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必须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利益从来就是具体的。基层党组织能否通过维护群众的利益而获得他们真诚的拥护,也是关系到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是否牢固的重大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利益多样化的格局。即单位的利益并不等同于国家的或集体的利益,也不等同于劳动者的直接利益。不仅新经济组织如此,国有企业亦存在这个问题。例如,企业违法经营可以为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地方保护主义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但这利润或收入的受益者,却未必是企业的全体员工或当地的全体居民;同时,这也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神圣性,并直接危害社会,从而也违背了国家的最高利益。同样,降低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能提高企业的利润,但这就意味着直接损害职工的切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基层党组织继续恪守过去的经验,简单地把维护、保证单位利益例如利润、产值、形象之类作为自己事实上的主要工作目标,就有可能直接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不仅得不到群众的拥戴,甚至会处在群众的对立面,从而失去了联系、团结、凝聚群众的基本条件,这就会严重削弱党的政治基础。不幸的是,这种状况现在并不罕见。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群众中的利益分化现象也日益突出,我国还出现了引人注目、数量可观的“弱势群体”,他们迫切需要得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

利益的多样化,就意味着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整合,成为执政党所面临的重要政治任务。这就是要通过政府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调解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形成共赢的局面,以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应该准确而又及时地向党的上级机关反映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以便决策层切实掌握情况,做出正确

的、合理的政策决定，实现多种利益的协调、整合。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应该在可能的范围内，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动员各种资源，公平、公正地解决基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化解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只有做好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工作，让绝大多数群众感受到基层党组织是自己利益的有力维护者和忠诚的代言人，基层党组织即使不掌握直接的权力，也一定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从而真正成为群众公认的政治核心，发挥团结、教育和动员群众为党的纲领而奋斗的作用。

必须指出，今天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没有必要也决不准许采用革命年代的斗争方式，更不能片面强调部分群众的利益而损害其他方面的利益。掌握好这个分寸，就需要一定的政策水平和政治智慧。群众切身利益可以定义为合法权益，即群众根据国家法律、法令、政策的规定所应该享有的权益。目前，群众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切实维护，国家的意志未能得到落实，正是许多地方干群矛盾、劳资矛盾激化和群体性事件突发的根本原因。如果党的基层组织长期处在瘫痪、半瘫痪状态，或者不仅不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反而侵犯群众的合法权益，甚至损公肥私，颠倒是非，必然会造成非常恶劣的政治影响。虽然某一处或几处基层党组织的问题不会立即危害全局，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党的领导机关或多数基层党组织忽略这个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看，前景将相当可怕。

根据这个分析，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应该是基层党组织的最核心的功能，也是落实依法治国的迫切的要求。只有大多数基层党组织通过有效的活动，切实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神圣性，从而维护了群众的合法利益，最广大的群众才会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怀，党的执政基础才会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使社会和谐成为现实。

（四）基层党组织要善于利用民间组织凝聚群众

政党要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必须有效地借助于各种民间组织的沟通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单位人”的消亡，我国已生长出了一个计划经济时代基本没有的巨大的社会空间，兴起了大量的民间组织。各种民间组织对于丰富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维护他们

的切身利益,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完全可以预言,今后的民间组织还将有更大的发展,包括在数字空间中的发展。执政党必须有效地渗入这个空间,通过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来进一步联系、教育和凝聚群众,并引导它们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目前,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已经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社区党建、民间组织党建的工作正在日益深入。但是,党组织如何与民间组织处理好领导与合作的关系,党组织在通过民间组织动员群众时应怎样实现工作的有效性,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学习前辈的宝贵经验,即以群众的利益为工作出发点,有助于拓展今天的实际工作者思路。

上海地下党的历史经验表明,民间组织是利益多样化社会中党开展群众工作最有力的依托。而在民间组织中,成功开展工作的关键,首先就是对群众利益、意愿的尊重,而不能以先知先觉者或当然领导者自居,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甚至包办代替。只要党的基层组织、党员个体都能真正地想群众所想,以对群众利益的关怀、尊重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党完全可以在这个社会空间发挥出政治核心的作用,把群众有效地凝聚在自己的周围。

其次,这要求党员有高度的政治意识,能自觉主动地在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发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①在民间组织、特别是比较松散的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党员个体的主动性、自觉性,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共产党没有合法地位的民主革命时期,上海的地下党员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今天执政党的党员们,拥有往昔无法想象的丰富资源和优越条件,更应该做到这一点。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页。

后 记

本书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地下党基层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与启示》(批准号 03BDJ004)的最终成果。我指导的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的几名硕士研究生,承担了课题的主要研究工作。王小莉、杨成龙、杨艳生分别以抗战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及 1934 年前上海地下党党员数量变化作为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现在的书稿有关部分,均系我对这些学位论文的改写。王小莉并承担了本书第一章、第五章的初稿撰写工作,李春峰承担了第六章的初稿撰写工作。鉴于他们付出的巨大努力,我觉得他们理应获得署名权。当然,本书任何学术上的错误,责任仅仅在于我本人。

多位评审专家对本成果提出了一系列非常细致、中肯的批评和改善意见,使本书得以避免许多将令人汗颜的讹误。我谨在此表示特别的感谢。

朱 华

2009 年 7 月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获得权威: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朱华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661 - 6

I. 获... II. 朱... III. 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群众工
作—史料—上海市 IV. D23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8560 号

责任编辑 毕 胜 苏莉莉
封面设计 傅惟本

获得权威: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朱 华 王小莉 杨成龙 李春峰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661 - 6/D · 1567

定价 25.00 元